

#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2022年第5期(总第215期)

## 编辑委员会

顾问 毛昭晰

主任 叶菁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建军 仲建忠 刘晓清 汪东波 陈红

吴建中 李国新 柯平 胡海荣 徐益波

章云兰 鲁东明 程焕文 褚树青

主编 褚树青

副主编 赵继海 屠淑敏 郑秀花

## 编辑部

编辑 李芳 王晓琳 孙晓清

编务 徐越人

英文编译 鞠婧

刊名题字 沙孟海

封面设计 黄海晶

主管单位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单位 浙江图书馆

协办单位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编辑出版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地址 杭州市曙光路73号

邮编 310007

电话 (0571) 87988086

在线投稿 <http://bjb.zjlib.cn>

编读往来 [lsrw@zjlib.cn](mailto:lsrw@zjlib.cn)

刊号 ISSN2096-2363  
CN33-1398/G2

定价 22元

印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2-5-10

#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目录 2022年第5期(总第215期)

---

■ 学术论坛 -----		
公众影像史学的学科发展与思想渊源*		全根先 5
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韩迪 12
■ 图书馆学史 -----		
会员制模式在民国私立图书馆的运用*		
——以上海通信图书馆为例		郑爽 19
图书馆视角下民国时期《中国教育年鉴》的学术价值探析	梅影	刘劲松 28
浙东抗日根据地报刊探析		丁若时 34
■ 探索与创新 -----		
基于遗传神经网络的图书采购推荐模型研究		蔡丹丹 38
基于BERT的《中图法》文本分类系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姜鹏 43
学术类微信公众号运营与服务特征解析及启示*	牛晓菲	白雪 49
■ 工作研究 -----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研究*	黄红梅 盛思远	任广慧 56
智慧服务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流通馆员转型发展的实践路径	刘敏	王晓翎 62

同行评议期刊

A Peer Reviewed Journal

---

---

## ■ 异域采风

美国公共图书馆课后服务实践调查及启示 邱景怡 68

SCCR报告对完善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立法的启示\* 高可森 73

## ■ 文献学研究

《四库》本《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校勘探微 徐梦瑶 80

方苞集外诗文六篇考释\* 任雪山 85

## ■ 书评

信息分化研究的新图景:评《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与分化研究》的研究贡献  
刘姝贤 91

---

本刊载文已被中国知网系列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平台、博看网收录,凡作者向本刊投稿并同意发表论文,均视为作者将该文著作权授予本刊,其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不再另行支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

#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 CONTENTS

No.5 2022 (Serial No.215) Monthly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nd Ideological Sources of Public Historiophoty	Quan Genxian	5
Ancient Reading Thoughts of China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s	Han Di	12
On Application of Membership Mode in Private Libra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1912-1949): Taking Shanghai Communication Library for Example	Zheng Shuang	19
On the Academic Value of <i>Chinese Education Yearbook</i>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brary	Mei Ying Liu Jingsong	28
Analysis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the East Zheji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Ding Ruoshi	34
Book Purchasing Recommendation Model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 and Neural Network	Cai Dandan	38
A Case Study of the BERT Model Based on <i>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i> and Influence Factors	Jiang Peng	43
Analysis and Inspiration of the Operation and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Niu Xiaofei Bai Xue	49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Subject Service in the Context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Huang Hongmei Sheng Siyuan Ren Guanghui	56
Path of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Circulation Librarian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Services	Liu Min Wang Xiaoling	62
Investig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After-School Services of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Qiu Jingyi	68
The Enlightenment of SCCR Report on the Improvement of Library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 Legislation	Gao Kemiao	73
A Study on the Emendation of <i>Chun Qiu Hu Zhuan Fu Lu Zuan Shu</i> based on <i>Si Ku Quan Shu</i>	Xu Mengyao	80
A Textual Research on Six Articles of Fang Bao besides Fang Bao’s Collected Works	Ren Xueshan	85
New Prospect of Digital Divide Research: Comment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i>Research o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Digital Divide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i>	Liu Shuxian	91

· 学术论坛 ·

## 公众影像史学的学科发展与思想渊源\*

全根先

(中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摘要:**任何一门学科的诞生与发展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公众影像史学的诞生,既有坚实的学科发展基础,又有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更有迫切的现实生活需求。影像史学、图像史学、口述史学、公众史学为公众影像史学的诞生与发展作了必要的学科建设准备,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民史观”、近现代西方史学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则是公众影像史学的主要思想渊源。

**关键词:**影像史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公众史学;民本;西方史学;人民史观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nd Ideological Sources of Public Historiophoty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have their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it continuously emerges and develops with the changes of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public historiography emerges with a solid foundation for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profound academic sources, and urgent needs of real life. I believe that historiography, image history, oral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y have prepared the necessary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historiography. Moreover, the "people's view of history" represented by Liang Qichao and Marxism, together with moder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thoughts are the main ideological sources in the public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historiography; oral history; image history; public history; people-oriented; western history; people's view of history

## 1 引言

任何一门学科的诞生与发展都不是偶然的、凭空产生的,都有其变化的历史条件,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人类通过记忆而实现文明传承,而记忆的外化或记录历史的手段主要有四种,即口头传统、文字、图像和实物。在文字发明以前,口头传统是最主要的记录方式。自从有了文字,文字便成为记录历史、文明传承的主角。另一方面,图像作为记录历史的一种手段一直存在,只是未能发展为独立的图像史学,更不可能有影像史学。无论是东方还是西

方,传统史学基本上都是书写帝王将相,广大民众处于社会边缘,当然也处于史学边缘,姑且称为精英史学,不可能有公众史学。笔者认为,研究公众影像史学,有必要梳理其学科发展脉络,探究其思想渊源。影像史学、图像史学、口述史学(Oral History)、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为公众影像史学的诞生与发展作了必要的学科建设准备,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民史观”、近代以来西方史学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则是公众影像史学的主要思想渊源。

## 2 公众影像史学的学科发展脉络

\*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9ZAD1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公众影像史学无疑属于历史学范畴。历史学体系庞大,分支众多,公众影像史学与哪些学科最为接近?笔者以为,影像史学、图像史学、口述史学和公众史学是公众影像史学学科建设的必要准备,公众影像史学是这些学科发展融合的必然结果。

## 2.1 影像史学

尽管图像作为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出现较早,然而作为历史学分支的影像史学却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摄影技术的发明和电影的诞生是其发展的首要条件。电影出现于20世纪初,其不仅是一门艺术,也是记录与反映人类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是现实生活的客观反映。1988年12月,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一文,标志着影像史学的正式诞生。这篇文章中,海登·怀特正式提出了Historiophoty(影像史学,或译为影视史学、视听史学)这一概念。在他看来,所谓影像史学,就是“以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来表现历史和我们历史的见解”<sup>[1]</sup>。1993年,台湾学者周梁楷先生在《当代》月刊发表了该文译文,对怀特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同时对影视史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996年,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发表了《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一文,是内地学者发表的最早介绍影像史学的论文<sup>[2]</sup>。

随着摄影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影像史学日益引起学界重视,成为史学领域的一支生力军。影像史学改变了传统的文字书写历史方式,借助于现代摄影、摄像手段,甚至日常所用的一部手机,人们可以方便地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加以记录,历史书写不再是精英阶层的一项特权。不仅如此,影像史学在记录历史方面还具有一项独特的优势,因其生动形象,而使原本枯燥乏味的历史知识变得鲜活生气起来。黄朴民先生说:“用现代意识对历史进行生动鲜活的解读,让历史从历史学家营造的象牙之塔中走出来,走入千家万户,走入每个人的心里。”<sup>[3]</sup>可以说,影像史学是“亲民的”史学,为公众参与历史书写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不过,由于影像史学只是部分地记录与展示公众生活,公众影像史学又有其独立发展的学术价值。

至于影像史学是否包含摄影技术产生以前的各类图像,就是说,“影像”到底指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看法不尽一致。笔者比较赞同“大影像”说,即影像史学的研究范围,包含了摄影技术产生以

前的各类图像。周梁楷先生在译介Historiophoty一词时,认为影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任何影像视觉符号”<sup>[4]</sup>。张广智先生亦赞同此说。近年来,钱茂伟教授又提出了“声像史”<sup>[5]</sup>这一概念,注意到口述史与影像史的密切关联,同时又认为将一些老照片收集起来做成动态影像志是影像史的一个类型。公众影像史学应当因袭影像史学的研究范围,并更加关注公众的日常生活与史学实践。

## 2.2 图像史学

不可否认,图像史学有其独立存在的学术价值。中国传统史学中,素有“左图右史”、图史互证之说。南宋学者郑樵在《通志·年谱》中说:“为天下者,不可以无书;为书者,不可以无图谱。图载象,谱载系,为图所以周知远近,为谱所以洞察古今。”<sup>[6]</sup><sup>[405]</sup>在《通志·图谱略》中,他又说:“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sup>[6]</sup><sup>[837]</sup>图像可以传递丰富的历史信息。岩画、壁画、绘画、造像等,都是重要的文献资料,应作为历史研究的考察对象。

在西方史学传统中,由于图像史料较为丰富,学者对图像史料的运用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1939年,德国学者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在《图像学研究》一书中,把对图像的解释分为三个层次,即图像的“自然意义”、图像的“常规意义”和图像的“本质意义”。图像的“自然意义”是由可识别的物品和事件组成;图像的“常规意义”是对图像的具体分析;图像的“本质意义”即对图像的深度解析,揭示图像所反映的国家或民族在特定时代的宗教或哲学倾向<sup>[7]</sup>。图像正是在最后这个层次上为史学家提供了确实的必要的证据。英国学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图像证史》一书中说,图像可以印证历史,同时认为图像中有不真实的内容、图像比文字更有想象的空间<sup>[8]</sup>。虽然他没有提出图像史学这一概念,人们仍视其为图像史学的创立者。

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呼吁关注并致力于图像史学研究。陈仲丹先生说:“将图像更广泛地用于史学研究,不仅用来证史,还可以图像为主体开辟新的研究领域。”<sup>[9]</sup>韩丛耀先生认为,图像是历史事实的记录,图像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事实。他在文中写道:“独特的历史图像叙述结构和由此展开的整体形态是图像史学区别于传统历史研究以及其他学科史研究的学科特质。”<sup>[10]</sup>图像不仅可以证史,还可以传

史。对此,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中也有所讨论。笔者以为,公众影像史学应因袭图像史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并可利用影像制作手段编辑影像志,使传统图像更加生动形象,并能更好地保存和传播。

### 2.3 口述史学

影像史学与口述史学关系十分密切,口述史采访往往运用影像手段进行记录,公众影像史学也不例外。

口述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民间传说或口头传说。然而,作为历史学分支的口述史学却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才诞生。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A.内文斯(Allan Nevins)提出了口述历史科研项目,并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口述历史研究室。实际上,早在1938年,现代口述史学的创始人A.内文斯就出版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主张开展口述历史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口述史学论著在美国陆续问世,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OHA)正式成立。不久,口述史学研究开始由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一批口述史学者与研究团体,很快发展成为新兴的“热门”学科。在中国,口述史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却发展十分迅速,如今已俨然成为一门“显学”。

与传统以文字为主要书写手段的史学相比,口述史学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具有显著的特点。张广智先生说:“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实际上是通过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技术,对某一个特定的问题获取第一手的口述证据,然后再经过筛选与比照,进行历史研究。”<sup>[11]</sup>概括说来,口述史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口述史学的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口述史访问,而非源于已有的历史文献;第二,口述史采访运用录音或录像手段,这是传统史学所没有的;第三,在传统史学中,主要是书写帝王将相和精英人物,没有百姓的地位;最后,通过口述史采访,获取新的文献资料,不仅是方法的创新,更是内容的补充和完善。当然,口述史采访成果还可以视频形式呈现。

至于口述史学与影像史学有什么区别,笔者认为首先是侧重点不同,口述史学更关注口述者所说内容,影像主要是作为记录的一个手段,在口述史采访中只起辅助作用;而影像史学中的影像就是记录的重点,即便没有或只有少量影像记录中的人物出现,没

有什么受访人的口述内容,影像本身具有独立的保存与研究价值。至于公众影像史学,自然离不开口述史学方法的运用,然而采访对象更加关注普通民众。

### 2.4 公众史学

在世界历史上,在传统史学中,人民群众是没有地位的,即便在史书中偶有出现,最多只是一个陪衬。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弊”,第一个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认为从来史书都是为君臣而作,没有一部为国家与国民而作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很少有个人写自传的,第一个写自传的是司马迁,著有《太史公自序》。在西方,第一个写自传的是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著有《忏悔录》。启蒙运动时期,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作《忏悔录》以后,西方个人自传才开始多起来<sup>[12]</sup>。实际上,公众参与历史书写是现代社会发展产物。

公众史学(或译为公共史学、大众史学)这一概念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凯利(Robert L. Kelly)在1978年出版的《公共历史学家》创刊号上提出的。在他看来,公众史学是“历史学家的就业(方式)和在学术体制外——如在政府部门、私有企业、媒体、地方历史协会和博物馆,甚至于在其他私有领域中——(所使用的)史学方法”<sup>[13]</sup>。这一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就业问题。事实上,美国公共史学的产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主要用于博物馆、历史遗址、历史剧制作等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几个领域,在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制定等领域也有所应用<sup>[14]</sup>。国内学者对于公众史学的理解以及名称翻译不尽一致。

笔者比较赞成钱茂伟教授给公众史学下的定义,即:公众史学是“研究公众历史的知识学问体系”<sup>[15]</sup>。

“公众”对应“组织”,尤其是“国家”<sup>[16]</sup>。在2015年出版的《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一书中,他对公众史学的学科进行了重新规划,将公众史学分为六个组成部分,即:通俗普及史学、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影像史学与公众文化遗产。他认为,公众史学应该“要求历史学为大众服务,成为大众的服务工具,记录大众、写给大众看”<sup>[17]</sup>。这样,公众影像史学就相应地成为公众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 3 公众影像史学的学术思想渊源

公众影像史学既然是公众广泛参与的史学形态,公众自觉地记录历史,传播历史,自然有其思想渊源。当然,学术思想也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想,反映不同的社会状况。在传统社会,由于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技术手段等限制,公众不可能成为历史记录与研究主体,更不可能直接参与历史书写。这种状况到了近代才有所改变。笔者以为,公众影像史学的学术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民史”观;二是近现代西方史学思潮;三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

### 3.1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民史”观

中国自古就有“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尽心下》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大略》:“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不过,这些“民本”思想,其实都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说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和实现“君本”“官本”的最终目的,作为民来说,只能希望有一个“好皇帝”。中国古代也有面向公众的通俗史学形态,如话本、历史演义、传统戏剧,然其内容主要是描写帝王将相,广大民众只是个陪衬。在中国古代,只有“君史”,没有“民史”,历史书写更是少数精英的一项专利,未经政府同意,不得私自撰写国史,《汉书》作者班固就因被举报“私修国史”而遭逮捕,民间记录即便有,也不可能得到重视<sup>[18]</sup>。

近代以来,受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潮影响,民众力量开始得到重视,一些有识之士还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之于广大民众的愚昧无知,主张“启民智”。1896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说:“吾中国谈史裁最尊,而号称正史、编年史者,皆为一君之史,一国之史,而千万民风化俗尚不详焉。”<sup>[19]</sup>梁启超明确提出了“民史”理论。他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说:“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sup>[20]</sup>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过是“记述人间一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此种撰述是“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sup>[21]</sup>。

梁启超认为,历史撰述当以人民为主。他在《变法通议》中说:“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

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sup>[22]</sup>因此,他主张普及历史知识,“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sup>[23]</sup>。在倡导“史界革命”的同时,他还将自己的史学思想付诸实践,撰写了多种史学著作,如《新史学》《中国史叙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等,为中国近代史学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晚清维新运动中,不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徐仁铸、唐才常等人也都加入到了批判“君史”传统行列。谭嗣同认为,历代所谓“正史”,不过是“二十四家之撰述”,“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于民之生业靡得而详也”<sup>[24]</sup>。在当时,批判“君史”,倡导“民史”,已成为新史学家群体的一种共识。近代新史学“君史”“民史”观念的提出以及新史学的尝试,为公众成为历史考察对象、进入历史研究视野、参与历史书写提供了思想源泉。

### 3.2 近现代西方史学思潮

西方近代史学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其特点是摆脱了神学色彩的中世纪历史观,代之以崇尚理性和人文主义。进入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创立了兰克学派,主张“如实直书”,史学家在运用史料批判方法获得准确无误的材料之后,要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叙述史实,这样历史学就能成为一门科学。与此同时,他还继承了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创立的政治史、军事史传统,认为历史研究者通过探讨这些内容,能够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的主要脉络和发展方向,从而更好地理解整个历史。在兰克学派的著作中,人始终是关注的焦点,体现了人文主义传统。

除了兰克学派,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所倡导的“新史学”,对于西方乃至中国近代史学有着重要影响。事实上,“新史学”运动并非起源于鲁滨逊,可以追溯至英国史学家巴克勒(Henry Thomas Buckle)和格林(Richard Green)、社会学家斯宾塞(Edmund Spenser)、德国史学家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等人。鲁滨逊于1912年出版了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开宗明义提出“历史也需要一个革命”<sup>[25]</sup><sup>20</sup>。他认为,“我们有许多所谓史学名著,其中专门叙述的往往只是君主和教皇、朝臣和政

客、争夺领土和王位的战争、君主和国会所制订的法律”<sup>[25]</sup><sup>14</sup>。因而史学必须进行改革，应当关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多个学科角度加以研究。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或许正是受鲁滨逊的思想影响。

进入20世纪后，正如1914年秋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所说，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使“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西方文明遭到严峻考验，而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进一步驱散了其现代文明的优越意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剧增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逐渐体现，冲击着人们对于社会进步的乐观信念<sup>[26]</sup>。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开始逐渐弥漫，从哲学、建筑学直至各个领域。法国学者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在《现代性的五个悖论》中写道：“后现代，20世纪80年代的这个新的老一套，侵入了美术——如果还能说美术的话——文学、造型艺术，也许还包括音乐领域，但首先是建筑，还有哲学等领域。”<sup>[27]</sup>在这种思想大潮下，后现代主义史学开始蔓延。

后现代主义史学家认为，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对于同一个历史对象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的。要找到历史事实，必须借助于文字、符号和文字信息，经过分析、判断、想象才能体现出来。无论是史料还是史实，都只不过是不同的文本，没有什么区别<sup>[28]</sup>。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史学家还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历史研究开始转向，逐渐从精英转移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从宏观历史转移到微观历史、从社会史转移到文化史”<sup>[29]</sup><sup>3</sup>。当然，这种“微观史学并不是否定先前的历史学，而是对它的一种补充，微观史学家为研究过去的历史增添了一种具体感”<sup>[29]</sup><sup>36</sup>。

影像史学的创建者海登·怀特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话语的比喻：文化批评论集》《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表现》等著作，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代表作。他说：“历史学家的论证是对他认为是真实故事的东西的阐释，而他的叙述则是对他认为是实际故事的再现。”<sup>[30]</sup>在他看来，不存在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历史可以任人解释。此后，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波兰学者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主编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历史编纂：历史研究方法论文集》、英国学者凯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编的《后现代历史学读本》、荷兰学

者安克斯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的《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等。

后现代主义史学拓展了历史学研究对象，使历史研究更加多元化，丰富而又生动，应该说，对于突破以往僵化的历史研究模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这方面，公众史学可以借鉴其某些治史理念，关注社会现实，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拓展史学研究视野，使其更加丰富、生动与客观。不过，后现代主义也给现代史学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它否定历史的客观性，淡化历史研究中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有益探索，一味地追求所谓“小人物”的日常记忆，描写社会边缘人群，甚至偏爱带有猎奇性质的秘闻野史，难免解构历史，使历史学陷入碎片化的尴尬境地，成为一种非体系化的历史学，这是其流弊所在。

### 3.3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英雄人物，不曾有过“英雄崇拜”。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说：“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sup>[31]</sup><sup>11</sup>“世界历史不过是伟人们的传记。”<sup>[31]</sup><sup>47</sup>事实上，英雄史观几乎是东西方传统史学的普遍现象。近代以来，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注意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在其著作中有所体现，但是他们都没有根本上确立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人民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的最具原创性的重大理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形成过程中，1844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本合作著作《神圣家族》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神圣家族”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曼坦尼亚(Andrea Mantegna)一幅名画标题，画面是圣母玛利亚抱着耶稣，旁边围着一群天使和神甫。马克思、恩格斯把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比作耶稣，把他的兄弟(埃德加·埃格伯特)及其追随者戏称为“神圣家族”。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对鲍威尔等人蔑视群众的唯心史观进行了批判，而且在批判其英雄史观的同时，提出了人民史观理论，指出人民群众不仅在物质生产实践中，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概括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史

观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认为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起主要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sup>[32]</sup>恩格斯在其晚年对人民史观有更精确、更直接的表达。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sup>[33]</sup>正是这些广大群众的、整个民族的、整个阶级的行动“引起重大历史变迁”<sup>[33]</sup>。

其次,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英雄人物的创造者。英雄人物对于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固然重要,往往比普通人要大得多,但是,英雄人物不是凭空产生,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场景,所谓时势造英雄,而不是相反。普汉列诺夫(Plekhanov, Georgii Valentnovich)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归根到底不是杰出人物的愿望和思想,而是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发展,是生产方式的变更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杰出人物的思想和愿望不能与社会经济发展背道而驰,不能与先进阶级的要求背道而驰,否则,他们将一事无成。只有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先进阶级的要求,顺应时代发展的方向,杰出人物才能有所作为,真正成为杰出人物。

第三,不能不论普通人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普通人与英雄人物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两者相互依存。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普通人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对此,列宁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为了为群众服务和代表他们正确地意识到的利益,先进队伍即组织必须在群众中开展自己的全部活动。”<sup>[34]</sup>列宁十分重视普通人的作用。他说:“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sup>[35]</sup>他认为,决定历史最终结局的是人民群众,具有优秀精神

品质的总是少数人,“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sup>[36]</sup>。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sup>[37]</sup>这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高度概括。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倡公众史学,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就是因为一门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归根到底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史学不再是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不再为达官贵人摇旗呐喊,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必然要求。面对蓬勃发展的公众史学,拥有越来越便捷的历史记录手段,我们从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公众史学的重要意义,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记录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挖掘其脑海中的历史记忆,不仅有利于历史学的健康发展,更是在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另一方面,记录普通人的生活,让更多的人参与史学实践,还有利于公民社会建设,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公众的人文素养,还原史学的正本清源。

#### 4 结语

正如上文所述,公众影像史学的提出,既有坚实的学科发展基础,又有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更有迫切的现实生活需求。我们认为,“公众影像史学要以公众为本位,书写公众,公众参与,服务公众。其基本任务,就是要帮助公众进行历史记录,通过影像进行记录”<sup>[38]</sup>。在这方面,与学科母体影像史学不同,它不是以影像分析或影像研究作为主要目标,重点在于影像史学实践。另一方面,它又不能脱离影像史学的基本规范和基本方法。其记录内容,大致可分为人物影像和事件影像两类。而我们现在要做的,便是帮助公众掌握记录历史的基本方法,将历史的书写权、解释权还之于民,真正做到美国史家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所说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sup>[39]</sup>。当然,从学科建设来说,公众影像史学的发展道路依然漫长,需要不断地探索,反复地实践,不过我们相信,在这个公众积极参与的“图像时代”,公众影像史学一定大有作为,其前程将一片光明。

#### 参考文献:

[1] WHITE H.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8, 93(5): 1193-1199.

- [2] 张广智. 影视史学: 历史学的新领域[J]. 学习与探索, 1996(6): 116-123.
- [3] 黄朴民. 历史的第三种读法[N]. 光明日报, 2007-05-18(09).
- [4] 周梁楷. 影视史学: 理论基础及课程主旨的反思[J]. 台大历史学报, 1999(6): 445-470.
- [5] 钱茂伟. 作为活人历史研究的口述史[J]. 浙江社会科学, 2019(10): 141-151.
- [6] 郑樵. 通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7] 孙琳. 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符号学知识溯源[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1(3): 12-22.
- [8] 唐宏峰. “历史—图像”: “历史3”何以可能——对图像证史的反思[J]. 探索与争鸣, 2020(3): 108-115, 195.
- [9] 陈仲丹. 对图像史学的界定和思考[N]. 光明日报, 2014-04-23(16).
- [10] 韩丛耀. 建立中国图像史学的理论体系[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01-30(01).
- [11] 张广智. 西方史学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331.
- [12] 杨正润. 现代传记学[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91-292.
- [13] 王希. 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J]. 历史研究, 2010(3): 34-47, 189.
- [14] 杨祥银. 美国公共史学综述[J]. 国外社会科学, 2001(1): 33-37.
- [15] 钱茂伟. 中国公众史学通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8.
- [16] 钱茂伟. 公众史学读本[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10.
- [17] 钱茂伟. 公众史学的定义及学科框架[J]. 浙江学刊, 2014(1): 80-86.
- [18] 钱茂伟. 国家视野下的传统史学[J]. 史学月刊, 2010(10): 105-115, 122.
- [19] 康有为. 日本书目志[M]//康有为全集: 第3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763-764.
- [20] 梁启超. 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M]//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59-60.
- [21] 梁启超. 中国史叙论·史之界说[M]//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六.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1.
- [22] 梁启超. 变法通议·论译书[M]//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70.
- [23] 梁启超. 新史学·中国之旧史[M]//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九.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7.
- [24] 谭嗣同. 谭嗣同全集[M]. 蔡尚思, 方行, 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419.
- [25] 鲁滨逊. 新史学[M]. 齐思和,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 [26] 马瑞映. 整体性研究: 反对后现代主义史学[J]. 历史研究, 2019(6): 18-24.
- [27] 贡巴尼翁. 现代性的五个悖论[M]. 许钧,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22.
- [28] 赵世瑜. 历史学即史料学: 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J]. 学术研究, 2004(4): 12-15.
- [29] 伊格尔斯.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M]. 何兆武, 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 [30] 怀特.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 陈永国, 张万娟,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127.
- [31] 卡莱尔. 英雄和英雄崇拜[M]. 张峰, 等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88.
- [32] 韦建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87.
-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55-256.
- [34] 列宁. 列宁全集: 第2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41.
- [3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27.
- [3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79.
- [37]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31.
- [38] 全根先. 让公众历史记录成为普遍现象: 建立公众影像史学成为必要[N]. 社会科学报, 2020-10-08(005).
- [39] 贝克尔.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论历史与政治[M]. 马万利,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95.

**作者简介:** 全根先,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资源建设总审校, 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目录学史、口述史学、影像史学。

**收稿日期:** 2021-10-09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学术论坛 ·

## 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韩 迪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中国古代有着极其丰富的阅读思想和方法, 传承和借鉴这些优秀的阅读思想和方法, 除了对全民阅读的发展和人们阅读方法的改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外, 对当今人们学习、工作、生活, 以及价值观的转变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将中国古人的阅读思想和方法归纳出五个方面, 即经世致用、读书立志、勤奋钻研、读有所序、以学为乐。中国古代文人士积累下来的阅读思想与方法在当今人们为学致用的阅读目的、为人处世的方法、读书治学的态度、全民阅读的推进等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阅读思想; 读书治学; 中国古代

**中图分类号:** G250.1      **文献标识码:** A

## Ancient Reading Thoughts of China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s

**Abstract** Ancient China is home to extremely rich reading thoughts and methods. Inherit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se excellent reading thoughts and methods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reading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reading methods, but also serves as an important guide in people's study, work, lif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valu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ncient Chinese reading thoughts and methods into five aspects, namely, practical application, reading determination, diligent study, orderly reading and learning for fun. The reading thoughts and methods accumulated by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of letter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people's reading purpose for learning, the method of dealing with the world, the attitude of reading and scholarship,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reading and so on.

**Key words** reading thought; study and scholarship; ancient China

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 人们物质需要逐渐得到较大的满足, 并开始对精神文化的满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今, 我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十分重视社会文化建设, 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在全国大力推动全民阅读, 支持建设各种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阅读是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 人们通过阅读可以学习知识、立志奋斗、修身怡情等。同时阅读也是传承文明、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如今, 越来越多

的学者深入挖掘中国古人的阅读思想, 并将其运用于当今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自古以来, 中国的文人士就十分注重读书治学, 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内容丰富且极具价值的阅读思想。因此, 本文借古鉴今, 在总结和分析中国古代阅读思想的基础上, 着重提出其在指导或者改善当今人们的阅读学习、为人处世、思想态度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为当今人们面临的诸多难题给出价值引导。

\* 本文系黑龙江大学2021年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全民阅读保障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YJSCX2021-135HLJU)的成果之一。

## 1 中国古代阅读思想探析

### 1.1 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是我国古人读书治学之重要表现和目的,也是古代阅读思想和理论的一种重要体现,贯穿中国古代阅读文化发展的始终。在封建社会,“修齐治平”是文人志士一生的读书治学追求,也是经世致用观的集中体现。具体来说,经世致用总体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实用之意和修养之意。实用之意强调解决实际问题,即“外王之用”;修养之意强调自我人格的完善,即“内圣之用”。

经世致用的实用之意强调解决实际问题,这里的“用”,小到能作为谋生的本领,大到能治国、平天下。“学而优则仕”就是经世致用的一种突出表现。在古代,读书人可以通过“入仕”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也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颜之推的阅读功能论十分强调经世致用,他将读书作为谋生的手段,肯定读书以求功名的现实功用,反对学无所用的行为。他在《颜氏家训》中阐述了他对读书功能的认识,其中一点是读书应当“施之世务”。“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末苏已来不复尔,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sup>[1]166</sup>阅读只拘泥于章句、背诵师言没有用,应当“济功业”,即读书要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经国济世,为政以德。《颜氏家训·勉学》载有:“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犹为一艺,得以自资。”谚曰:“积财万金,不如薄伎在身。”<sup>[1]157</sup>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在此,颜之推将读书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科举制度确立以后,读书入仕几乎成为每个文人学士一生的目标和追求,读书也变成了社会任何阶层的人出人头地、谋求富贵的重要之路,“学为经世”的阅读观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但时人对这种“学而优则仕”的目的的变化也是褒贬不一,但其终究体现的是一种致用的观点。清代汪辉祖主要的阅读思想也是读书致用的功能论,坚持读书以有用为贵。他认为:“所贵于读书者,期应世经务也。有等嗜古之士,于士无一分晓。高谈往古,务为淹雅。不但任之以事,一无所济……不则迂阔而无当于经济,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sup>[2]</sup>读书贵在适应社会干一番事业,而不是只好古、只会高谈阔论,要经世致用,通达事务,有益于国家治理。另外,

他还认为读书的目的也不能只在于科举做官,要以治儒业为崇尚,读书治学的功用在于泽被当今和后世,这也正是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的确,中国古代有很多文人读书是为了治学、明道,无关乎功名利禄。

修养之意表明读书可以明德修身,促进自我人格的完善。“修齐治平”是每个读书人的远大理想,但并非所有人可实现治国和平天下的远大政治抱负。因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成为许多读书人的追求,坚持学以修身,一心读书治学。孔子对阅读修身的意义十分看重,他强调一个人如果不读书学习,即使有良好的修养,也有可能形成愚、荡、贼、绞、乱、狂的不良品行。要不断读书学习,才能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才可能如其自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sup>[3]</sup>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也指出,读书可以“增益德行,敦立风俗”,“修身立行”,“行道以立世也”,而不读书将成为“小人”。也正如徐幹在《中论·治学》中所云:“人不学则无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经人伦,为美观,故可以供神明。”这里的“懿德”就是通过修身而实现“疏神达思,怡情理性”的美好品德。

既然读书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虚理,那么其要求读书治学必然要知行合一或知行迭进。如颜元所认为,读书更重要在于实学、实习,要通过亲身的体悟和习行,否则是无用的学问。他反对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和“全副力量用于读书”的阅读思想,认为“穷理居敬”是其自欺与自娱,读书是学习致知中的一项内容,读书之后关键在于行动和致用。“读书无他道,只需在‘行’字上着力”<sup>[4]</sup>,他强调读书和习行的关系,认为二者紧密相连。颜李学派的阅读观以“实学”直击程朱理学死读书的要害,注重读书在明理、致用和习行中的重要意义,在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史上最具有批判性,对近代以来的阅读观和重塑读书致用的理念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 1.2 读书立志

孔子有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中国传统的阅读精神中,立志一直是我国传统阅读理论强调的读书之本。立志是读书的基础,治学首先要立志。“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是以为之者亿兆,而成

之者无几，故君子必立志。”<sup>[5]</sup>志向是读书治学的导师，治学之人自有才气，但却要为其志不定而担忧，因此读书一定要订立志向。在宋儒的阅读理论中，立志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丰富的内涵。宋代理学家将立志作为读书之本，其志不仅仅是将致知作为重要内涵，而且是把致用推举为最高标准，这也体现出了鲜明的理学色彩。南宋理学家张栻在其《桂阳军学记》中详细论述了读书立志之要。他讲到：“学者当以立志为先，不为异端詆同，不为文采眩，不为利禄汨，尔后庶几可以言读书矣。圣贤之书，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要警惕“三不为”之害，且“惟利禄之诱最害人”，读书治学的志向与追求应该是“必趋于圣人之道亦”。

那读书治学先立什么志，标准又是什么？理学家们也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朱熹有言：“学者要立大志，才学便要做圣人也。”<sup>[6]</sup>“夫子之所志，颜子之所学，子思、孟子之所传，皆是学业。”<sup>[7]</sup>朱熹成为圣人，继承孔孟之道即为读书之志，也可以说是读书治学之目的。此外，立志必须高标准，程颐说到：“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可见，这里的标准就是“道”。因为理学在宋朝占据官方统治地位，所以这里的“道”也就等同于“理”，即纲常伦理和道德规范。理学家们将学者分为三类，能文者只是文士，谈经者专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这也就是学者阅读必须确立并追求的目标：立志高雅，信道深坚。

### 1.3 勤奋钻研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读书、勤奋读书的民族。中国古代勤奋钻研、刻苦读书的实例也数不胜数，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家贫读书不辍的王歆、有劳作间隙孜孜以求的著名目录家王象、有身居军政不忘读书的周瑜和鲁肃、有头悬梁锥刺股的苏秦和孙敬，等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奋发向上。

勤奋钻研是一种意志和坚持，读书一时人人可为，读书一生却绝非易事。古人勤学苦读贵在坚持，不少文人坚持终身阅读，这是需要我们花费一生去学习的。晋代著名史学家孙盛，自小好学，“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一生的勤奋坚持，终造诗赋论难复数十篇等<sup>[8]</sup>。清代徽派朴学代表人物之一程瑶田“自少迄老，笃志著述”，读书十分勤奋刻苦，“平居鸡鸣而起，燃灯达旦，夜分就寝，数十年如一日”<sup>[9]</sup>。闻鸡而起，数十年如一日的起早贪黑，勤学苦读，最

终学有所成，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图书著作。勤奋钻研、勤学苦读的精神在古代科举考试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参加科考的应试者基本须贯通古今，精熟经旨，这需要通过长期的阅读来积累，且这一必备条件实现艰难。白居易《与元九书》言：“及五六岁便学诗……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寤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韩愈《与凤翔刑部尚书书》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宫，以文明于四方。”不管科举为了功成名就或是为了理想抱负，古人为此孜孜不倦、坚持不懈的苦读精神是我们当今读书治学应该学习的。

读书要有钻研的精神，其实也可称为深思，这与当今提倡的“深阅读”相似。对此，唐朝刘知几提出“窥探幽昧之理，求索隐藏之处”的探赜索隐之法，即探求典籍中精微深奥之意，寻找文字背后隐秘的事迹。元宋以来，探赜索隐法一直影响着文人的阅读，也经常被学者用来评说文人读书问学的状态。北宋文学家曾巩，一贯主张读书必须勤奋刻苦，不能有丝毫懈怠和放松。他借用王羲之日夜勤练书法至墨池水尽黑之事撰写《墨池记》，以勉人勤学。读书之人不及王羲之的境界，是因为勤学苦练功夫还不够，并指出：

“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sup>[10]</sup>勤奋刻苦读书是必不可少的，更何况是实现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呢？这对每一个读书人来说都具有积极劝勉的作用。

万事万物皆有缘由，那中国古人为何会如此勤奋苦读呢？其实，或为改变命运、光宗耀祖，或为志于仕途、政治抱负等，皆可概括为“修齐治平”之目的。另外，我们从唐太宗和岑文本的对话中可能受到一些启发。太宗曰：“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岑文本对曰：“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飭情以成其性。《礼》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sup>[11]</sup>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三点勤奋苦读的必要性：第一，人本性聪明，但其个性的发挥需要以博学为基础，博学才能引人入正道，而勤学苦读是博学的重要途径；第二，苏秦和董生的事例表明只有通过勤学苦读才能成才立名、修己治人；第三，勤学是为了“懿德”，疏神达思，怡情理性。这也体现出古人的勤学苦读是基于一定的目标和志向的，所立之志，须勤奋刻苦才能实现。

#### 1.4 以学为乐

乐学思想和幸福观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将其引申到阅读学领域,就是读书为乐观<sup>[12]</sup>。自古以来,受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的影响,古人以学为乐的思想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入世之乐”“避世之乐”“田园之乐”等。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好之”“乐之”是古人为学的三层递进境界。“知之者”懂得学以致用,“好之者”以读书治学为兴趣,只有“乐之者”才达到了读书治学的最高意境,以学为乐。儒家思想兼具读书入世与读书出世的阅读哲学,不管“仕”与“不仕”,都应该乐在其中,“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sup>[13]</sup>。与儒家读书治学的“入世之乐”相反,魏晋南北朝的阅读是一种纯粹追求精神境界的读书之乐。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有诗云:“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sup>[14]</sup>陶渊明的田园读书乐透露出一种悠闲和欢欣之情。他将读书当作一种乐趣和精神享受,正是在这种纯粹的精神境界中,诗人也参悟许多人生道理。不在乎一切功名利禄,只求读书为乐,优哉游哉,也将当时文人推崇的隐逸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清代的张潮以读书为乐事,阐述了他的快乐读书理念。“读书最乐,若读史书,则喜少怒多;究之怒处,亦乐处也。”<sup>[15]</sup>虽然读史书时有让人恼怒之处,但读书人也能从中寻得乐处,转怒为乐,快乐自在其中。从张潮的阅读心态可以看出,他真正将阅读看作一件乐事,但此乐也不同于苦读中“苦中作乐”,是发自内心的读书为乐的心态。

其实我国古代文人的这种以学为乐的读书观也是一种非功利心态下的阅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精致高雅并富有审美意味的生活模式,是中国文人追求心灵自由的传统隐逸文化的一部分<sup>[16]</sup>。当然,这种读书为乐的心态与追求或为施展抱负,或为躲避官场,或为隐居田园,或为自然无为,等等,都是为了追求内在、主观上的精神自由,无关名与利,这也是如今青年人在追逐和实现梦想和目标的过程中应该学习的。

#### 1.5 学有所序

学有所序指的是读书治学要有一定的顺序。朱子读书法中强调读书要循序渐进,这里的“序”即指读书治学之次序。自古至今都有强调学有所序,但所序

内容和方法却有不同。

中国古代阅读思想中所言读书治学之序,大体可分为始终之序、时间之序和内容之序<sup>[17]</sup>。其中时间之序和内容之序最为强调。时间之序指读书的时间安排。三国时期董遇提出了“三余”读书法,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sup>[18]</sup>。在董遇看来,除了日常必要的劳作之外,其余多的空闲时间都可以用来读书。从开始阅读的年龄上来看,“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为政者玩岁而愒日,则治不成”<sup>[19]</sup>。读书学习应该“及时”,从小开始,不要等到老迈之时,那样不会有所成。内容之序指阅读的内容要有先后的顺序,可分为群书先后缓急之序和每书诵读考察之序两个层面。朱熹与吕祖谦编写的《近思录》中记录了关于二程对群书阅读顺序的内容,主要强调初学者要先通四书,次及诸经,然后观史。且宋代理学家普遍认为,四书也要先读《大学》来“立定架子”,在熟知传统阅读治学的首末次第之后,再阅读《论语》《孟子》《中庸》。对此,朱熹也总结道:“先观《论》《孟》《大学》《中庸》,以考圣贤之意;读史,以考存亡治乱之迹;读诸子百家,以见其驳杂之病。其节目自有次序,不可逾越。”<sup>[20]</sup><sup>188</sup>古人规定的读书治学之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大体的顺序是“经史为先,以时有序”。但对于读书之序,朱熹更重视每书诵读考察之序。读书无序,难有所得,如此一来,致知尚且不能,切己躬行更是无从谈起。对此,朱熹提出四个字:循序致精。“读书,理会一件,便要精这一件……一件看得精,其他书亦易看。”<sup>[20]</sup><sup>169</sup>他要求学生读一书要自首至尾,逐句玩味,更要首尾贯通,读得通透。如此便不会造成随意穿凿、错会经意的弊端。无论是始终之序、时间之序,还是论述最多的内容之序,都体现出读书治学的循序渐进性、方法性、系统性等,这对当今我们的阅读顺序、书目次序的规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2 中国古代阅读思想的当代价值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古代先贤流传下来的丰富的阅读思想和方法对现今人们为学、做人、处世等都具有很好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 2.1 躬身实践,修身为本

在古代,经世致用的“经世”我们可以理解为对

外维护社会稳定,对内修身以资,这也正是读书治学思想中经世致用的实用之意和修养之意。这对当今的学生、教师、各类学者等端正读书治学的态度以及现代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长久以来,我国应试教育的大环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一方面,从读书的目的来看,出现了中小学生对成绩和升学,大学生为技能和文凭,部分学者为职称和晋升的功利现象。虽说也自有其理,但这与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读书治学之目的逐渐偏离。古人读书治学秉持经世致用的目的,读书不仅只为迎合“学而优则仕”的社会趋势,亦有“修齐治平”的理想抱负。学以致用,将所学应用于家族教育,打造“书香世家”,用于社会稳定、国家建设,这都是古人躬身实践的具体表现。当今社会,我们不应该将读书学习过度功利化,学生应该被教育树立读书有益于自己、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志向;秉承“修齐治平”的读书志气,广大学者也应该坚持追求专深的治学之志,学习古人通达事务、经国济世的治学态度,这对个人、社会、国家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另外经世致用讲求“致用”,即躬身实践、知行合一,读书不是读“死书”,不是一味埋头扎根书本文字,只学理论,而是要将“究明义理”和“躬行践履”相结合,坚持以“行”为目的、读行结合的读书方法。如今的应试教育正是普遍缺乏知行结合、躬身实践的教育理念,学生在理论方面做到了烂熟于心,但实践之时却不知所措。因此,我们要秉持“体用一致”的读书观,坚持“致知”与“致用”相结合,营造知行迭进的务实学风。

另一方面,对内修身以资的修养之意也是当代学习借鉴之需。儒家思想主张“正人先正己”,要通过读圣贤书来藻练精神、明辨善恶、修身养性。读书不仅是学习知识,读书做人也十分重要,“君子不学,不成其德”<sup>[21]</sup>。如果从“性本善”的角度来看,阅读有助于保持和发展良好的品性,正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sup>[22]</sup>。如果从“性本恶”的角度来看,人只有经过后天的读圣贤书才能明辨善恶、为善去恶。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难免会跌进功名利禄的深渊无法自拔,读书修身的阅读目的也正是不断“正己”“修己”的必要,时刻让我们看到当下的自己,督促我们切己省察、以致修身。

## 2.2 立志正心,勤奋刻苦

读书治学首先要治心,“治心”就是要建立起治

学的心理驱动力,下定决心,坚定不移。而立志与正心是治心的关键与核心。中国古人普遍认为,立志是成学、成事的基础,正所谓“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sup>[23]</sup>。在我们当代的阅读中,唯应试、唯科研的阅读并不鲜见,有些人也许最初有大志于心,但在实现的过程中逐渐偏离。正所谓志不立,学无所向;志不坚,学无所成。立志是一切开始的前提,在当今新时代发展的潮流之中,我们要坚持立志正心,立志之后更应辨明义理、名实、理欲等关系。青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当代青年人读书学习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大志已有,我们所做的就是应该保持志向,笃定前行。而“正心”则是实现志坚、志笃的重要途径。正心就是正心态,我们要在辨明义理、名实和理欲等关系的过程中端正心态。在阅读过程中拒绝完全的阅读功利主义、坚持明理修身推己及人、践行“今之学者为人”的义理,这样才能保持有志不变。

立志是成学、成事的基础,而勤奋刻苦是成学、成事的方法。“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自古不变的读书思想。读书治学应该是纯粹、专深、勤勉的。近几年学术界的不良风气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读书治学之风。古人读书治学,有多少人十年寒窗苦读、勤奋刻苦才得以有所成就。而今,无心苦读、急于求成、追名逐利让一部分人逐渐将勤奋钻研的读书治学态度边缘化,“天道酬勤”的主流价值观被质疑。因此,倡导古人勤奋钻研的治学之法,发扬勤学苦读的读书精神,对修正我们的治学态度、端正社会主流价值观尤为重要。另外,在全力推动全民阅读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充分挖掘和发扬古人这种孜孜不倦、勤奋刻苦、学志弥坚的阅读精神,这对改善阅读风气、提高阅读效率、营造学习型社会,进而推进全民阅读具有重要的意义。

## 2.3 安贫乐道,积极向上

古人以学为乐的阅读观体现了乐在其中的读书态度和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读书为乐是一种不追求物质层面的读书观,而是将读书作为一种乐趣,享受阅读过程。在学习压力大、社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坚持一种乐学、乐读的思想十分有必要。因此,我们应该将以学为乐、以读作乐视为治学的驱动力,在乐学中不断进步,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同时,这种读书为乐的态度也体现在阅读疗法之中,这也是自

古便有的阅读主张。从阅读中获得的乐趣有益于人们身心的健康，“一读疗沉疴”。在今天学习、工作、人际关系等各方压力不断增加的环境中，人们通过读书来获取快乐、缓解心情、释放压力。阅读疗法甚至在治疗某些心理健康问题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有专门的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自闭症患者、抑郁症患者、老年人患者等的阅读疗法书目和方法，真正通过阅读给他们带去快乐和健康。

读书为乐阅读观也折射出一种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我们应该时刻秉持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情。古人仕途不顺之时就将读书作为一种乐趣，将原来的不快乐转为“田园读书乐”“修道之乐”，此道不通则取他道之乐。我们要借鉴这种读书治学的态度，在学习中学会乐学，学会“苦中作乐”。生活和工作中，保持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坦然看待一些事情，保持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当读书到了“自趣”“自进”的地步，读书也就真正成了生活，读书乐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 2.4 学而有序，渐进精思

学有所序强调读书治学要有次序，这也是一种读书治学的章法，有“序”则不乱，而后才可“渐进”。古人读书的时间之序和内容之序为我们当今的阅读学习提供了可借鉴之道。

首先从时间之序上看，阅读的“最合适的年龄”问题应该被我们重视。研究表明，0—2岁是培养儿童早期阅读习惯的黄金时期，能够为孩子一生的阅读习惯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重视这个年龄阶段，从小培养儿童的阅读习惯。当然，儿童的自制力和注意力较差，其阅读的实现主要通过家长的引导阅读实现，因此亲子阅读、家庭阅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阅读是一件需要坚持的事情，长期的阅读才能培养阅读兴趣和习惯。在如今手机、网络、工作等各种因素的诱惑和影响之下，能每天抽出时间阅读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因此，在时间方面，学校和家庭应该充分发挥作用。中小学校应该设置阅读课，通过固定的阅读课时保障学生的阅读时间和阅读量；高等院校应该将“阅读课程”设置为必修课程，大学生也是最需要阅读的群体。家庭阅读可以说是实现全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家庭阅读氛围的建立对孩子阅读力的培养发挥着基础和关键的作用。所以，应该倡导每个家庭建立自己的家庭藏书，规定家庭阅读和

亲子阅读的时间，这也是对我国自古就有的“书香世家”和“书香门第”的学习和借鉴。

其次，在内容之序上，古人群书阅读须分缓急和阅读一书的“循序精思”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阅读方法。一方面，书籍阅读的缓急既体现在每个年龄阶段阅读不同类型书籍，也体现在阅读内容的重要性方面。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应该阅读合适的书籍。比如，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智力和能力水平各不相同，阅读的书籍种类应该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来逐渐调整，这在当今阅读推广过程中表现为“分级阅读”。因此在全民阅读推广过程中，各个图书馆和阅读推广组织要做好分级阅读推广工作，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推荐合适的书籍，各类型学校也应为不同年级的学生制定不同的阅读书目。在阅读内容的重要性方面，要兼顾必读与选读之内容。必读为当前阶段不可或缺的内容，选读为当前非必须的内容，这也体现出古人所讲的“博约相济”，只是此处更强调“约”在前，“博”次之的读书之序。另一方面，古人读书治学十分注重循序精思，强调“读书最以精熟为贵”，这也是如今我们在“快阅读”时代亟需学习的阅读方法。如今数字化阅读方式备受青睐，碎片化阅读虽然方便、快捷，但它无法达到深阅读所带来的阅读效果。阅读力的提高只有通过深度阅读，实现对书籍内容的熟读精思，仔细揣摩，才能达到古人所说的“通达”的效果。也即“每字先逐字训之，然后通解一句之意，又通解一章之意”<sup>[24]</sup>，从而做到“知音”。

## 3 结语

中国古代先贤在几千年的文明旅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阅读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笔者曾将这些思想总结为五个方面：循序熟读、博约相济、读书宜有择、读书须有疑、读写并重<sup>[25]</sup>。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内容丰富，笔者通过深入研究，再次总结了其中的五个方面：经世致用、读书立志、勤奋钻研、学有所序、以学为乐。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内容丰富，其蕴含的道理不仅是在与阅读相关的阅读方法、阅读推广等方面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指导人们的学习、生活、为人处世、人的思想态度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价值。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博大精深，还有很多丰富的思想和方法需要我们继续

深入挖掘、学习和借鉴。在大力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要以古鉴今,让这些优秀的阅读思想和方法在促进全民阅读、个人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 参考文献:

- [1]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2] 汪祖辉.双节堂庸训[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154.
- [3] 孔子.论语·为政[M].长沙:岳麓书社,2000:9.
- [4] 颜元.颜元集[M].王星贤,张芥麈,郭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623.
- [5] 徐干.中论·治学[M].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3.
- [6] 朱熹.朱子语类[M].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78:134.
- [7]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01.
- [8]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48.
- [9]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8:79.
- [10] 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279.
- [11] 吴兢.贞观政要译注[M].裴汝诚,王义耀,郭子建,等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51.
- [12] 徐冰洁.中国古代阅读目的论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20.
- [13] 孔子.论语[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112.
- [14] 陶渊明.陶渊明诗文选择[M].成都:巴蜀书社,1990:125.
- [15] 张潮.幽梦影[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109-159.
- [16] 王余光,汪琴.中国阅读通史:理论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258.
- [17] 蒋永福.论古代中国人的治学智慧(下)[J].图书馆,2019(10):22-27,46.
- [18] 陈寿.三国志·魏书[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420.
- [19] 戴震.戴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86.
- [20] 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16.
- [22] 孔子.论语·泰伯[M].长沙:岳麓书社,2000:72.
- [23]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
- [24] 程瑞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M].姜汉椿,校注.合肥:黄山书社,1992:142.
- [25] 韩迪.中国古代阅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1(6):72-77.

**作者简介:** 韩迪,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收稿日期:** 2021-10-25

**本文责编:** 郑秀花

· 图书馆学史 ·

## 会员制模式在民国私立图书馆的运用\*

——以上海通信图书馆为例

郑爽<sup>1,2</sup>

(1.河南省图书馆事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新乡 453007)

(2.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河南新乡 453007)

**摘要:**清末民初,伴随中国近代私人办馆活动的频繁,以会员制模式运营的私立图书馆应运而生。上海通信图书馆作为同人出资创办的私立图书馆,以互助合作的精神组建共进会,通过吸纳会员、收缴会费向图书馆提供稳定的读者群体、有序的服务团队、长效的资金供给,成为会员制模式运营的私立图书馆的代表。该馆运用邮寄方式免费向读者借书,从思想内容、印刷装订方面对书刊采买进行严格甄选,发行馆刊公示馆务、沟通读者、阐发理念,编订适应现实需求的分类法、指导馆藏书目的编制;藉由这些特色服务激发会员忠诚度、获取普通读者价值认同、提高自身行业竞争力。会员制模式也是上海通信图书馆彰显公益价值,传播新文化与开展进步活动,引导近代图书馆服务创新的有效保障机制。

**关键词:**会员制模式;私立图书馆;上海通信图书馆;通信借阅

中图分类号:G259.29;G258.83

文献标识码:A

## On Application of Membership Mode in Private Libra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1912–1949): Taking Shanghai Communication Library for Example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with the frequent private library activities in modern China, the private library operating in the mode of membership came into being. As a private library funded by like-minded people, Shanghai Communication Library set up the Co-progress Society in the spirit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and provided stable readers, orderly service teams and long-term capital supply to the library by absorbing members and collecting membership fees. It becam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ivate libraries operated by the membership mode. It provided services as follows: lending books to readers for free by mail, selecting books and journals strictly in thought contents, printing and binding, publishing library journals to publicize library business, communicating with readers and advocating ideas, filing classification methods meeting real needs to guide collection compilation. Through these special services, the library stimulated member loyalty, obtained the value recognition of ordinary readers and improved its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The membership model was also an effective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Shanghai Communication Library to highlight public welfare value, spread new culture, carry out progressive activities, and guide the service innovation of modern libraries.

**Key words** membership mode; private library; Shanghai Communication Library; correspondence borrowing

\*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白话文运动对文学阅读转型的影响研究(1917—1927)”(项目编号:2018BZH004);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阅读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019-ZZJH-48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会员制是一种人与人或组织与组织之间进行沟通的媒介,它是由某个组织发起并在该组织的管理运作下,吸引客户自愿加入,目的是定期与会员联系,为他们提供具有较高感知价值的利益包<sup>[1]</sup>。会员制模式出现在图书馆运营中,源自18—19世纪的英美国家。起先是一些较为富裕的读书人组织读书会,并附设图书馆,专供会员使用。会员共同出资购买书籍轮流阅读,便产生了非商业性质的会员图书馆。因会员图书馆常提供给会员严肃的文化作品而深得人心,随后在英美国家大范围普及,被视为近代公共图书馆产生的先声<sup>[2]</sup>。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上海,也有一所采用会员制模式运营的职工业余图书馆——上海通信图书馆。该馆组织共进会作为办理图书馆的专门团体,会员以互助合作的方式义务承担馆务与经费;运用通信方式邮借书刊,使各阶层读者均能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免费借读好书。上海通信图书馆被誉为“上海第一个真正开放的公共图书馆”<sup>[3]</sup>。

## 1 会员制模式是上海通信图书馆的运营方式

诞生于欧美的会员图书馆是由会员缴纳会费维持基本运营的私营图书馆<sup>[4]</sup>。考察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创办历程,可确定该馆属于同人出资所办的私立图书馆。进一步解读《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章程》,可以发现其运营模式与会员图书馆极为相似。上海通信图书馆创办于1921年国际劳动节。发起者为上海福源钱庄店员、“湖畔诗人”应修人。早在1917年前后他便有收藏进步书籍、建立“修人书箱”、供人借阅的先举。1921年组织创办“共进图书馆”。该馆初创时仅沈滨掌、应修人、许元启、谢旦如、杨井眉、戚涣垠、卞绍曾等10人,均为供职于钱庄、银行、公司的热爱读书的职业青年。他们共同出资,贡献私藏,设立小型图书馆交流阅览。仅有138种281册图书置于从钱庄借得的小房间充任的馆舍中,最初只限内部人员借阅。伴随人数增多,该馆对外开放,并成立内部组织支持馆务,因馆舍亟待扩充移址隔壁纸号楼上——天津路44号。随后该馆采用通信的方式服务本埠较远的读者与外埠读者,并因通信借书的创举易名“上海通信图书馆”,组织也随之定名“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sup>[5]</sup>。1929年5月4日,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称该馆为“共党宣传机关”,对其密令查封。后由市教育局接收,改组为上

海市立流通图书馆,于1930年10月1日正式开放<sup>[6]</sup>58-62。籍此,《中国图书馆史》将其列入“同人出资所办,即同一单位、同一系统的人员,或目标和兴趣相同者共同发起创办的图书馆”<sup>[7]</sup>261。《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章程》开宗明义:“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是专办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团体”,并申明宗旨:“联合各地爱读书而不能多买书的人们,以互助合作的精神,共同创办‘上海通信图书馆’,收集并流通有时代思想的各种学术文艺的书报,使每人每年只出有限的会费,能随时随地读到无数的刊物;同时并推己及人,公之于社会,使各地有志读书而困于经济者,也能不离住所,不妨业务自由借读各种书籍”<sup>[8]</sup>。由此可见,共进会是专办上海通信图书馆的私人团体,招募各地热爱读书的同人为会员,以互助合作的精神,缴纳会费充任办馆经费,服务各地有志读书而困于经济的会员与非会员。综上所述,上海通信图书馆是热爱读书的职业青年共同出资兴办,伴随人员增多成立共进会共事馆务,由最初只供内部阅览的小型图书馆逐渐发展而成的对外开放的公共图书馆。

会员制作为从商业领域移植而来的概念,它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如自愿性、有限性、目的性、契约性、结构性关系等,同样适用于解读会员制模式运营的图书馆。共进会旨在“集多数有兴趣于图书馆事业的同志,通力合作,组织一团结严密的团体,节衣缩食,以无力之力,聚集起来,筹集一个小规模的图书馆”<sup>[9]</sup>。“以无猜忌的真情借贷借书者,不收租费,不讨保证,也不希望任何的酬劳;以设身处地的用心为借书者着想,使不受路途限制,不受经济限制,不受职务限制,也不受早晚的时间限制”<sup>[10]</sup>,充分彰显其目的性。《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章程》规定:“凡同情本会宗旨,愿守本会章程者,由在会会员之介绍,或自向本会声请而经会通过,都可加入为会员。”<sup>[8]</sup>可见会员入会是自愿性的。又规定:“每会员,有纳会费及当委员的义务,有优先借得书报及免费取得本会各种出版物的权利。”<sup>[8]</sup>由于该馆对非会员亦是免费开放,所以在图书借阅方面,会员并未比非会员享有更多的优惠。会员更多是承担缴纳会费、运筹馆务的义务,体现出对会员的限制与要求,即有限性。《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章程》作为契约实体,规定了共进会的定名与宗旨、组织方式、出入会条件、会员的权利及义务等,它对会员的约束与会员对它的认同遵守即是契约关系的

表现。而以互助合作精神结合起来的共进会，竭力营造友好、平等、无私的氛围，在情感与利益方面相互支持、相互渗透，表现出稳固的结构性关系。会员们甚至将这种以互助合作精神结合起来的会员制模式的图书馆事业视为“一种集合各阶级青年共同合作”的运动<sup>[11]</sup>。由此可见，上海通信图书馆的运营符合会员制的普遍特征，属于会员制模式。

实际早在戊戌（1898年）前后，各地“倡新学”“开民智”，成立了很多学会，这些学会大多设有藏书室，已具有会员图书馆的特点。戊戌期间的学会藏书室一般附属于学会，仅供学会成员阅读使用，有的还收取一定费用，既非独立机构同时开放程度也有限。上海通信图书馆则是独立的借阅机构，不仅无偿供会员阅读，还将免费借阅的权利提供给非会员，故而具有开放性。共进会虽向会员收取会费，却主要用于图书馆运营，较之营利性的租借机构要低廉得多，可见该馆的会员制是非营利性的。会员制模式作为图书馆建设“自下而上”的内生方式，在军阀混战、国民经济受损、文化事业颓废的民国初期，以吸纳会员、收缴会费、开展特色服务扩展业务，表现出明显的坚韧性、灵活性与时效性。

## 2 会员制模式是上海通信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 2.1 收缴会费：提供不断循环、长效经营的资金链

私立图书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经费问题。民国初期，我国图书馆事业受战乱影响而陷于困顿，经费短缺是图书馆面临的普遍问题。清末民初，我国也出现过许多面向公众开放的私立图书馆，如古越藏书楼、景堂图书馆、松坡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等，它们的创办经费主要靠创建者自己承担。虽然不少私立图书馆能够得到社会捐助，但这只是缓兵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图书馆的营生问题。私立图书馆想要持续下去，必须建立起一个不断循环的内部机制。而会员制恰好可以帮助私立图书馆建立起一个长效经营机制。上海通信图书馆在创办期间曾向外界发起过几次募捐，如：1921年初创时共进会内外特捐43元；1924年募捐得954.3元；1926年5月起“月报补助团”，预筹集经费90元。此外，还有来自书业经营机构的襄助。据楼适夷回忆，亚东图书馆、

群益图书社以及民智书局、泰东书局、光华书局、北新书局等大多对该馆抱以同情与支持的态度，“给我们特别的折扣，有的还赠送，后来连商务、中华也承认了我们的资格，给我们一个图书馆的折扣”<sup>[5][14-19]</sup>。但维持运营的常项经费主要来自共进会会员缴纳的会费，会费分入会费和常任费两种：入会费1元；普通会员的常任费为本埠4—24元/年、外埠2—12元/年；学生会会员的常任费的最低额为1元；会费均在最低标准之上自由认纳。1925年8月，《醒狮报》事件造成20名会员脱离，该馆执委会与诸会员约定：“一年为期，共相介绍四十新同志，固我根基，厚我才力。”<sup>[12]</sup>足见会员增减对运营经费的影响。会员制模式的图书馆主要靠会费收缴提供不断循环、长效经营的资金链；并依靠吸纳会员、增加会费，扩大图书馆运营规模。

### 2.2 吸纳会员：提供长久稳定的读者群体与自律有序的服务团队

共进会会员是上海通信图书馆稳定的读者群体，且利用业余时间自愿提供管理服务。会员均抱以救济广大无产求知青年、方便阅读具有时代思想的书报的共同目标，是追求进步、甘于奉献的读者群体。会员因志趣相投而入会，在情感上具有较高的忠诚度，故也是最稳定的读者。此外，该馆的管理还具有鲜明的业余性质。会员认纳会费、承担馆务也完全出于自愿与义务。“工作人员与广大读者，极大多数是职业青年，白天办公时间，各有职业。图书馆只有一个拿生活津贴的常驻人员。到晚上和星期日才对外开放。办事的执行委员和热心会员，都为义务劳动，每周轮流值班。”<sup>[13]</sup>由会员出入会统计表（见表1）可见，除1925年8月《醒狮报》事件对会员队伍带来一次冲击外，抱以互助与进步信念的会员逐年增多，不少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如恽代英、杨贤江、潘汉年、胡适、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楼适夷、汪静之、钱俊瑞、李俨、魏金枝等纷纷入会，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他们甚至抱以“会员都是借书者，借书者也全是会员”的希望<sup>[14]</sup>。

## 3 会员制模式是上海通信图书馆增强行业竞争力的内在动因

民国时期的私立图书馆十分注重引进新理念，开展新服务，采用新的服务和管理模式，探索使用新技

表 1 共进会会员出入会统计表

单位: 人

时间	会员总数	入会人数	出会人数
1921.12	10	—	—
1925.8	59	4	20
1925.9	77	18	0
1925.10	93	16	0
1925.11	118	25	0
1925.12	119	5	4
1926.1	141	23	1
1926.2	146	5	0
1926.3—5	332	184	1

术,并致力于发展中国图书馆学教育,非常具有社会责任与改革意识。聚焦上海通信图书馆,会员制模式是其探索特色服务、增强竞争力的内在动因。会员制的目标是通过与会员建立富有感情的关系,不断地激发并提高他们的忠诚度。很多读者均是在借阅中受益于该馆的价值理念并产生认同,逐渐加入会员队伍的,故而是会员发展的潜在对象。如何能向会员与普通读者提供较高感知价值的利益包,是获取读者价值认同、激发会员忠诚度的关键。该馆通过通信借阅、图书甄选、创办馆刊、编订分类等特色服务,不仅满足了更多读者高质量的借阅需求,同时也增强了图书馆的行业竞争力。

### 3.1 通信借阅: 践行开放理念, 扩展流通范围

上海通信图书馆用通信出借书籍的办法来解决受职务、时间、地域与经济限制的民众的求知欲。虽然此前,在清末“公共图书馆运动”与民初“新图书馆运动”的影响下,公共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纷纷开办,但大多数所谓的公共图书馆,仍带有传统藏书楼的遗风,服务对象尚限在智识阶层人士;或带有商业色彩,借阅图书需索要押金、铺保、租金。所谓开放依旧是一种带有颇多限制的被动式经营。上海通信图书馆开展的邮寄借阅,不仅拓宽了图书馆开放的时间、地域范围,实现了阅读权益的最大化;而且规避了职业贵贱,只要能够出邮费,均能借书。《上海通信图书馆贷书章程》申明其服务宗旨:“用通信借还的方法,使国内远近各地方有志读书而困于经济者,无论本馆会员、非会员,都能不离住所,不妨业务,自由借读不出租费的好书。”<sup>[15]</sup>为保证通信借书能够持久、广泛地开展,该馆制订了系统的工作程序和完善的管理制度。《上海通信图书馆贷书章程》对通信借阅的操作

流程作了详细规定。这是上海通信图书馆历时八年之久、影响远及海外的制度保证。尽管,邮寄借阅不免使图书馆运营陷入经济、路途、时间、职业等困难:如邮寄借阅所需复本量大,耗费资金;邮寄路途遥远,使图书循环周期长,且易在邮寄途中遗失、损坏;图书馆办事员均是利用闲暇时间从事服务的职业青年,繁琐的手续常使其忙碌不堪。然而该馆始终秉承“不让任何地方的人们读不到任何种类的好书,不让任何种类的好书流通不到任何辽远偏僻的地方”之初衷,克服困难、倾注热情,“希望成为远近人们的藏书库”,“希望为大规模上海图书馆的先导”<sup>[10]</sup>。

自清末中国近代邮政事业诞生以来,通信多在商业宣传与新闻报道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将其用于图书借阅,胡道静曾评价“这种流通图书的方法不惟是在上海是首创者,而且在全国也并没有先例”<sup>[16]</sup>。事实上早在俄国十月革命时期,邮寄借书就已受到列宁的关注,他认为要“使图书在人民中间广泛流传”,“务使图书本身能达到读者的跟前,因此就不能不利用邮政局,不能不建立各种各色的流通形式”<sup>[17]</sup>。1919年他还以提问的形式问及图书馆“是否通过邮局寄书”,并希望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管理处能及时给予答复<sup>[18]</sup>。列宁的教导,对于我国图书馆开展邮寄借书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五四”之后,这一新型图书馆形式也为国人所注意。1920年7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通信图书馆募捐启事”,旨在以通信的方法做到轮流借阅,使各地有志读书者能够用少量金钱阅览多数书报。该馆于7月9日正式开放<sup>[19]</sup>,真正开始了面向广大民众服务的实践。在上海通信图书馆创办之后,亦有1923年天津“马氏学会”创办的“马氏通信图书馆”,他们开列马克思主义书目、不收租金和保证金、面向贫苦的知识青年开展借阅<sup>[20]</sup>;1933年上海职业青年文化团体蚁社成立蚂蚁图书馆,它继承上海通信图书馆的传统,用通信借书的方法免费义务为大众服务<sup>[6]64-65</sup>;1934年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增设邮借部,为外地读者开展邮借服务<sup>[6]64</sup>。此外还有:1928年交通部主办的中华全国电政同人公益会通信图书馆<sup>[21]</sup>;1933年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主办的中国通信图书馆<sup>[22]</sup>;1934年当代青年社筹备的通讯图书馆<sup>[23]</sup>;1935年成立的私立河北通信图书馆<sup>[24]</sup>;1936年北平教育短波社创设的邮借图书馆等<sup>[25]</sup>。这些图书馆均采用邮寄借阅的方式,但部分仍需缴纳少量

保证金、租费等费用；部分图书馆只面向会员、特定群体开放。上海通信图书馆则免费向会员及非会员读者提供借阅服务，是我国较早运用通信方式践行开放理念的公共图书馆。

### 3.2 图书甄选：传扬时代思想，引领阅读风尚

五四新文化运动导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反思，这种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加速着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近代化进程。此时以推广、普及近代图书馆为目的的“新图书馆运动”也促使图书馆藏书的渐趋合理化，强调藏书以适合读者的需要为宗旨。自此我国传统的厚古薄今、存中排外的藏书思想逐渐改观，出现古今并存、中西并重的局面。“五四”前后是我国书刊出版的兴盛时期，进步书刊和革命书刊的出版是这个时期图书发展的重要特征；为适应文化教育的发展、知识普及的需要，科学书刊、白话书刊也大量涌现。在藏书建设方面，上海通信图书馆紧跟时代脉搏，大量收集进步书刊和科学读物，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在传播进步思想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图书采选上，上海通信图书馆认为没有经过郑重选择的图书，不但耗费开办者的购书经费，增加工作者的管理任务，而且消耗阅览者的时间与金钱。故而有严格的甄选标准：不但拒绝恶滥无益的书报，而且规避对图书质量的精否鲜加注意的弊端；主张根据借阅者的职业身份与教育程度等，以及图书馆的性质类型与经费状况等因素进行图书采买；同时审核图书的条理与文字，检查图书的外表与装订；内容倾向于适合进化、促进进化、符合民族需要、反映世界观念的书刊，同时淘汰反动复古、偏执狭隘与毫无学术价值的书刊<sup>[26]</sup>。典藏书刊有：《共产党宣言》《通俗资本论》《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浅说》《帝国主义浅说》《共产主义初步》等马克思主义进步书籍；《五卅痛史》《农民协会章程与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反映中国革命运动的书籍；《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前锋》《莽原》《语丝》《创造周报》《洪水》《小说月报》《新潮》等革命与新文学刊物。据《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以下简称《书目》）与《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以下简称《月报》）来看，当时的革命文学、左翼新文化书刊、几乎全部的新文化出版物该馆均有收藏。1926年10月刊行的《书目》（第6版）更是一个突出成绩，不仅突出反映和宣传了进步书刊，指导了当时进步青年的阅

读；对今天考察1926年8月以前的重要新出版物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进步书刊颇有参考价值。

### 3.3 出版新声：创办图书馆学期刊，搭建沟通读者的有效平台

图书馆学期刊是近代图书馆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民国初期，伴随图书馆文化的“西学东渐”、近代图书馆事业和出版事业的蓬生，图书馆办理期间诸多业务技法问题的“解决”亟需专设的研讨阵地，以沟通读者、交流业务、推介馆藏、宣传图书馆职能理念、探讨图书馆学理论为旨趣的图书馆学期刊应运而生。根据程焕文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期刊史的分期，1925年8月创刊的《月报》正值图书馆学期刊的发展期（1924—1928年）<sup>[27]</sup>，该年6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与《图书馆杂志》（上海图书馆协会）相继诞生，扭转了此前图书馆学期刊寥寥无几的窘境，引领出一个创办图书馆学期刊的潮流，《月报》正是这股风潮中的早期个影。作为上海图书馆期刊群落中较早的刊物，《月报》的特质既具有早期图书馆学期刊的共性，也具有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个性。

从《月报》创刊旨趣来看，其一意在构建图书馆与读者交流的桥梁。创刊人有感于“与借书者之间，也实在太隔绝了”，“应得有一种机会，使能尽量交换其意见，以倾双方的情愫”；也“盼望借书者时常有建议”<sup>[28]</sup>。“读书合作”栏目就是《月报》给予读者推荐优秀书刊的平台，使其“以读者的眼光，将借读的书，或批评内容，或节录精粹，或提要挈纲，或依目次而加以表解”<sup>[29]</sup>。“通信者”栏目则为读者之间搭建沟通交友的桥梁。通信人藉此寻找在文学、艺术、时政、世界语等方面有共同志趣的伙伴。另设“读者的意见”栏目，以广视听，藉来信问答的方式，采纳良策、倾吐困难。此外，《月报》自第4期始，增设“书报介绍”栏目，利导读有益之书、读现时切需之书。推荐图书广及政法、外交、历史、人生哲学、妇女、种族、国际形势、民生、革命、科普、文艺、生理常识及图书馆学等，形式笼括小说、诗歌、戏剧、歌剧、书画作品、时评与学术著述等。推荐图书均是当时优秀的新文学及科普书籍；《洪水》《语丝》《创造月刊》《文学周刊》《现代评论》等均推荐在列。“书报介绍”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出版界优秀书刊的梳理总结，具有重要的宣传指导作用。其二意在业务上的互通声气、互通有无。创办人亦感外界“不太明了我们的内容和

份子”，迫使“我们要想法向社会公开我们每月工作的景况”<sup>[28]</sup>。因此，《月报》不仅刊载组织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还开设“馆务纪要”“会务纪要”“议案纪要”“会员出入报告”“贷书报告”“收支报告”“会外赠书者名录”等栏目，会务馆务公开透明，不仅益于接受会员与读者监督，也达到业务交流的目的。其中“贷书报告”精细到类目统计与地区统计，使读者的阅读偏向与地域分布情况更加直观。“会外赠书者名录”公开感谢社会捐赠，民智书局、平民书局、上海书店、东方杂志社、小说月报社、文学周报社等书业经营机构，以及文学研究会、上海世界语学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等社会文化团体均名列其中。《月报》的“创刊号”与“五周年特号”分别发表《四年来的工作》《五年的努力》等文，也是对该馆历史的全面总结。其三意在推介馆藏以谋藏书之活用。创刊者苦于《书目》出版不及时，新书见报常成旧闻。故而借助《月报》每月定期刊载“新书报告”，标明每种书籍的类号、书名、作者、册数、借期与重量，附注挂号与停刊信息，便于通信借阅具体操作，切实推介最新图书。

“本月捐来的书报”也对捐赠书刊进行详细展示。其四则在宣传图书馆的职能理念、管理经验。创刊人深感上海通信图书馆“还引不起内地民众的注意，达不到下层阶级的听闻，觉得非作一种当期的宣传，无以遂创设的初衷”<sup>[28]</sup>。《月报》刊载不少颇有见地的评论文章，均是会员立足该馆实务，阐述上海通信图书馆的精神理念、管理经验。如《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读书自由》《人日颂》《通信与世界语》《从“绿邮”徽章想起》等文均阐述了该馆开放、免费、平等的精神理念；《图书馆与图书的选择》《图书的管理》《图书馆的经费问题》等文涉及图书馆的管理方法问题，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近代早期公共图书馆管理思想的踪影。由于《月报》创刊时间较早，创办者并非专业的图书馆学者，又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论述与阐扬传统文献的篇目很少见诸报端，更多是较为朴实的工作经验的阐述。故而形成《月报》以沟通读者、推介馆藏、公示业务、传播图书馆理念为主的办刊旨趣。

### 3.4 目录新质：编辑馆藏书目，制订适应时代的分类体系

民国时期目录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出版事业进步、近代学科体系确立、教育水平逐步提高的基础之上。

知识的更新、文献的剧增，使我国延续千余年的四部分类法不再适应知识结构的变化，在经历“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引入，本土化蜕变过程中的激烈争辩后，目录工作逐渐展示出贴合实际的发展征象。不仅出现了一系列“仿杜”“补杜”“改杜”之作，也有不少新型目录面世，实现了传统目录学与近现代目录学的优势互补，顺利完成了我国目录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过渡。尤其是“五四”之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使书目的发展转向一个新的领域，各大报刊积极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书刊，学术思潮的演变催生各种明显具有马列主义特色的书目产生，《书目》即是这类进步书目的代表。

上海通信图书馆在共产党的影响与领导下，为方便邮寄借阅，广泛流通革命与进步书刊，很重视书目工作。该馆设有“书目委员会”，连续编辑出版了几次馆藏书目。1926年10月出版的《书目》（第6版）更是一个突出成绩。第6版《书目》共103页，32开，主编是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创办者应修人。《书目》着重收录1926年8月以前入藏的革命社会政治书刊，进步文艺新书和通俗科学读物。每本书均著录书类、书号、著者、书名、借期、重量，以便邮借。书后附有《散订本期刊目》《期刊名索引》《致谢长期赠阅书报目》《我们的书类与书号》《本馆创设宣言》《本馆共进会章程》。该《书目》编制的最大特色是使用了《S.T.T.图书分类法》（S.T.T.是上海通信图书馆罗马拼音字母的缩写），这是我国最早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分类法。

《书目》前列的《书类纲目》相当于分类法详表，后附的《我们的书类与书号》相当于分类法简表。上海通信图书馆遭查封后，新书推荐社的部分员工系原馆的骨干，对该分类法进行了增订，改编成《S.T.T.分类法草案》，刊于《出版月刊》1930年8、9、10月号合刊。该分类法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从大类到整个类目体系的设计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国内革命运动、国际工人运动等方面的书刊给予显著地位，同时注意表现现代科学技术水平与进展，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该法结构较为完善，有大纲、详表、助记表（小类表、分国表、朝代表、时代表），使用了当时流行的十分法、参照法等技术，还绘制了纵横坐标的分类书码纲目简表，帮助记忆。应修人还创造性编纂了国语罗马拼音著者号码表，方法是以三个罗马字母作为书

次号,取著者姓名的罗马拼音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加名字的最后字母组成。这是我国图书馆较早采用的拼号式著者号码表。

《书目》属于私立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因收录书刊内容进步、紧跟时代,发挥起指导社会青年阅读进步书刊的功用,成为革命宣传书目的代表。《书目》不仅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取得经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对国人革命道路的指引起到巨大鼓舞作用;也影响着中国青年的知识结构,使其从以往的儒家训示中解脱,树立新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 4 会员制模式是上海通信图书馆实现社会价值的保障机制

##### 4.1 能够最大限度彰显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公益性价值

会员制的本质是共有制,但它并没有违背公共图书馆的公益性本质。共进会作为私立的非营利组织,追求的是社会正义与公民权利,倡导的是社会公益与责任,在图书馆运营上更具有灵活性、广泛性,更贴近普通民众。他们对普通读者报以完全信任的态度,免费向其开放,被誉为“不收学费的导师”<sup>[30]</sup>。虽然会员制模式的上海通信图书馆向会员收取一定会费,但这些费用相对于商业性质的图书馆要低廉很多,在会费缴纳方面甚至照顾外埠会员以及学生会会员,并只设最低限额、允许自由认纳,充分体现该馆的互助友好精神。收取会费并非为了营利,而是为了投资馆藏建设与运营发展。读者借阅过程也会产生少量的附加费用。《月报》发行之初,为方便沟通馆藏信息,曾规定借阅者必须订阅,但考虑到此项规定限制了读者尝试阅读的机会,故而不再作硬性规定,还发起“月报补助团”,尝试免费寄赠。对普通读者,需自付邮费才能自由借阅书刊,但“将来会员增多,经费充裕,会费最低额可望缩到极低”,“借书者邮费也可以免纳”<sup>[14]</sup>。足见该馆最大限度取消读者的费用门槛,积极实现图书馆的公益价值。上海通信图书馆的馆徽是一枚“绿邮徽章”:“是邮票形,绿的地,中央白日,有五月拱卫”<sup>[31]</sup>2,“邮票代表通信,日月象征光明,表现为团结、互助,用五个月一个日,又表示该馆成立日期5月1日,绿地象征亲爱、成长,百花象征纯洁”<sup>[32]</sup>。馆徽的设计与寓意正是开放、平等、免费的现代图书馆精神的体现。

##### 4.2 使上海通信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文化、开展进步活动的阵地

上海通信图书馆深受新文化运动的鼓舞,流通进步性、思想性、学术性较强的书刊,影响了大批青年,被读者誉为“生命的寄托所”<sup>[33]</sup>。伴随该馆事业的发展,书刊借阅量持续攀升。据谢灼华先生统计:1923年6月至12月共借出书籍1 663种,每月平均借出230种。但在1924年10月份就增至448种,1925年8月662种,12月达755种<sup>[34]</sup>。读者队伍也逐渐壮大,在数量与地域范围上不断突破。1924年虽有战事发生,而借阅者尚达3 000余人<sup>[35]</sup>。至1928年,读者已增至5 000余人<sup>[34]</sup>。据应修人对1925年7月至12月非会员读者的区域统计表(见表2)分析,除上海区外,异地借阅者共计211人,分布在19个省区,86个县份<sup>[31]</sup>4-6。谢灼华研究表明:时至1925年,该馆读者遍及全国20个省区、各大城市、乡村,更及于南洋群岛、日本、美国、法兰西等海外各地<sup>[34]</sup>。不少青少年读者正是在此接受知识熏陶,成为文化、教育、科技战线上的知名人物与骨干力量。

表2 1925年7月至12月非会员读者区域分布统计表

单位:人

地区	人数	地区	人数
上海	411	广东	5
江苏	62	山东	5
浙江	55	江西	4
湖北	21	山西	3
京兆	10	四川	2
安徽	10	云南	2
直隶	9	广西	1
河南	9	陕西	1
福建	6	奉天	1
湖南	5	吉林	1

该馆还是应修人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共进会事实上成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五卅”运动时期该馆就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应修人是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同年间他和团支部的几个骨干又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当时商务印书馆内的党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使该馆成为党团联系群众的桥梁<sup>[36]</sup>。很多会员均在此成为团员后转为党员。不少革命先烈、现代革命作家都在该馆从事过实际工作。如恽代英同志就曾担任过共进会的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中共党员应

修人同志自图书馆成立起就具体负责图书馆工作达六年之久<sup>[34]</sup>；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的恽雨棠、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干部陈云同志等人均曾为共进会会员<sup>[13]</sup>。他们均在此接受革命书籍的教育与革命斗争的锻炼，藉此走上谋求人类解放的道路，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坚强斗争力量。

### 4.3 推动上海通信图书馆服务创新，在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具有垂范意义

会员作为最主要的读者群体，同时参与图书馆管理与服务，最能设身处地为读者着想，并不断激发会员的创新能力，开展更适应时代的、更方便读者的特色服务。诸多图书馆服务与管理举措在当时均具有领先性，使上海通信图书馆在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具有垂范意义。应修人曾在《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读书自由》一文中写道：“在1921年我们创设之前，以上海之大，还寻不到一个完全公开的图书馆，这是一个事实。”<sup>[10]</sup>即便早在19世纪中叶上海租界当局已创办上海图书馆（又名工部局公共图书馆），并逐渐由小范围的西侨社会的私立图书馆转变成公共租界面向社会公众包括中国居民在内的公共图书馆，但因藏书只涉英文，最初开放对象也仅限洋人，胡道静称其“并非是着眼于为谋华人的利益”，“和我国人民所发生的影响极为轻微”<sup>[16]1-2</sup>。上海通信图书馆率先运用通信方式邮借书刊，使各阶层读者均能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免费借读好书。同时出版《月报》，用以沟通读者、推介馆藏、公示业务、宣传办馆理念，成为馆办期刊的早期践行者。故而《中国图书馆史》称其为“上海第一个真正开放的图书馆，承担起当时上海市唯一的公共图书馆的任务”<sup>[7]268</sup>。该馆编订并试行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S.T.T.图书分类法》，适应“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说、时代先锋思想、科学知识理念不断纳入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现实要求，并较早使用拼号式著者号码表，对蚂蚁图书馆、现代书

局、上海民众图书馆、广安县立中学图书馆等的图书分类产生影响。该馆还接受党的直接领导，传播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理念，广泛流通进步书刊，编制的《书目》成为宣传进步书刊的书目代表。谢灼华称上海通信图书馆“揭开了中国现代进步图书馆事业史的序幕”<sup>[34]24</sup>。

## 5 结语

综上所述，会员制模式不仅在18—19世纪欧美国家的会员图书馆广泛运用，在我国清末民初也不乏其例。虽在公共图书馆诞生前夕的戊戌之际出现过类似于会员图书馆的学会藏书室，但它既非独立的机构，同时开放程度也有限。20世纪初年至30年代，中国近代私人办馆的活动频繁出现，个体、同人、社团、出版界成为私人办馆的主体，以会员缴纳会费维持基本运营的私立图书馆也相应出现。上海通信图书馆作为同人创办的私立图书馆的代表，依靠吸纳会员、缴纳会费提供办馆人员与经费，藉由通信借阅、图书甄选、创办馆刊、编订分类等特色服务吸引更多读者借阅与会。会员制模式不仅在维系该馆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功不可没，也在创造其公益性价值、推动新文化传播与业务创新方面贡献卓著。进入21世纪，伴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会员制模式成为部分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开辟新的服务领域时采纳的理想模式；也成为个别私立图书馆服务基层读者、缓解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有效方式。作为一种坚韧性、灵活性、时效性兼具的图书馆营销方式，会员制模式不仅丰富了近代民间建馆的多样化形式，为助推公益事业发展、履行社会责任作出积极贡献；更应在当代图书馆建设中获得关注与传承，成为公共图书馆事业补缺与创新的有益方式，确保民众获得更为广泛与专业的服务保障。

### 参考文献：

- [1] 肖建中.会员制营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15.
- [2] 蒋永福.图书馆学通论[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36.
- [3] 谢灼华.中国图书与图书馆史(第三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310.
- [4] 郑永田.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1731—1951)[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6.
- [5] 适夷.记上海通信图书馆[J].读书与出版,1947(3):14-19.

- [6] 朱庆祚.上海图书馆事业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 [7] 韩永进.中国图书馆史·近代图书馆卷[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 [8] 上海通信图书馆章程及宣言[M].上海:上海通信图书馆,1926:2.
- [9] 长风.图书馆的经济问题[J].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1925(4):1-3.
- [10] Siu.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读书自由[J].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1926(10/11):7.
- [11] 杨贤江.我对于本馆的感想[J].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1926(五周年特号):16-17.
- [12] 为醒狮报造谣及二十人出会事告全体会员[J].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1925(1):11.
- [13] 楼适夷.关于上海通信图书馆的一封信[J].图书馆杂志,1982(4):79.
- [14] 会5.我们这个小社会[J].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1925(2):6.
- [15] 上海通信图书馆执行委员会.新订的贷书章程[J].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1925(4):12-14.
- [16] 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M].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
- [17] 舒翼翬.苏联的图书馆事业[M].上海:中华书局,1952:15.
- [18] 列宁.列宁论国民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300.
- [19] 张雁,孙秀玲,郭晨虹.中国近代大学的现代转型:移植、调适与发展[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147-148.
- [20]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天津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 中国共产党天津志[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223.
- [21] 公益会通信图书馆章程[J].会报,1928(35):44-45.
- [22] 中国文化服务社开幕[N].申报,1932-12-20(13).
- [23] 当代青年社筹备通讯图[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4,10(2):25-26.
- [24] 私立河北通信图书馆成立[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5,11(1):20-21.
- [25] 北平教育短波社创设邮借图[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6,12(3):24-25.
- [26] 建南.图书馆与图书的选择[J].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1925(2):1-3.
- [27] 程焕文.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期刊史略(上)[J].图书馆,1985(5):30.
- [28] 发刊词[J].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1925(1):1.
- [29] 李子久.读书合作[J].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1926(9):9.
- [30] 警顽.不收学费的导师[J].图书馆,1925(创刊号):55.
- [31] 修.从“绿邮”徽章想起[J].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1926(7):2.
- [32]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局(馆).日出东方 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红色记忆:上[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4:127.
- [33] 张挚甫.我所读之书[J].会报,1928(37):50.
- [34] 谢灼华.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通信图书馆[J].图书馆学通讯,1960(5):26.
- [35] 尧.上海公开之图书馆[N].申报,1925-09-13(21).
- [36] 李克西.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创始者——应修人[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0(12):4.

**作者简介:** 郑爽, 硕士, 河南省图书馆事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图书馆史研究中心负责人, 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史、阅读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 2021-11-01

**本文责编:** 郑秀花

## 图书馆视角下民国时期《中国教育年鉴》的学术价值探析

梅影 刘劲松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西南昌 330022)

**摘要:**《中国教育年鉴》由中华民国教育部组织编写,民国时期出版了两次。该年鉴关于图书馆部分的内容,注重全国视野下图书馆事业的整体性描述,资料较为翔实,体现了民国时期教育部对国内图书馆事业的看法。这种看法,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中国教育年鉴》中使用了一些当时没有公开的文件,在材料上也有新颖之处。不过,年鉴也存在不少问题,如观点雷同、材料讹误等。尽管如此,《中国教育年鉴》关于图书馆部分的记载,依然是研究近代中国图书馆的重要参考文献,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图书馆;民国时期

中图分类号:G259.29

文献标识码:A

### On the Academic Value of *Chinese Education Yearbook*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brary

**Abstract** *Chinese Education Yearbook*, compil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published twi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devotes a chapter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The library part of the yearbook focuses on the overall description from the 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the materials are detailed, which reflects the view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Chinese librarianship and can serve as a guideline for our work. In addition, the book employs materials from confidential documents and other new materials. However, the yearbook also has many problems, such as resemblances, false materials and so on. Nevertheless, the records of the library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 Yearbook* are still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braries, showing a certain academic value.

**Key Words** *The First Chinese Education Yearbook*; *The Second Chinese Education Yearbook*; library;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中国教育年鉴》在民国时期出版了两次。《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于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于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部《中国教育年鉴》均由中华民国教育部(以下简称“教育部”)组织人员编写,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教育事业、图书馆事业的看法,丰富了对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研究。然而,该年鉴图书馆部分的学术价值,至今没有受到重视。了解《中国教育年鉴》图书馆部分的学术价值,对深化近代中国图书馆史研究

具有积极意义。

#### 1 《中国教育年鉴》的特色

我国关于图书馆事业的研究起步较早。1909—1910年,孙毓修撰写的《图书馆》一文在《教育杂志》连载<sup>[1-2]</sup>,对我国图书馆事业进行了概述。该文从建置、购书、收藏、分类、编目、管理、借阅7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清末图书馆事业概况。这是我国第一篇图

书馆事业研究成果。1928年后,中山大学图书馆金敏甫对近代以来的图书馆事业展开研究。他的《图书馆事业之发展》《中国现代图书馆教育述略》《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概况》等文章陆续发表,勾勒出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概貌,包括图书馆的趋势、图书馆法规、图书馆行政机关、图书馆会议团体及其议案、图书馆经费、图书馆藏书、图书馆建筑等。金敏甫的论文为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研究奠定了基础。马宗荣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研究,功力颇深。1920年代初即有撰写《图书馆概论》计划<sup>[3]</sup>,随后相关论文论著不断问世。马宗荣把我国图书馆事业分为古代、秦汉、晋及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民国10个时期展开论述,内容极为广泛<sup>[4-6]</sup>。此外,杜定友、洪有丰等人对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也都有零星的研究。不过,上述研究都是私人撰述,代表了学者个人对图书馆事业的看法。

1934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出版,这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阶段性总结,官编图书馆著作正式出现。《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从沿革和概况两方面简述了近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沿革上,掲載了《图书馆通行章程》等公共图书馆法规。图书馆概况上,主要阐述国立图书馆和各省市区图书馆情况:概述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沿革、组织、经费、建筑、藏书和职员等方面的情况,国立中央图书馆的概述。重点介绍了各省特别市的图书馆情况,包括沿革、组织、经费、建筑设备和图书等内容,并绘制了《全国图书馆统计表》<sup>[7]798-799</sup>。

1948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出版。这次教育年鉴关于图书馆事业的撰述,与《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衔接,并进一步完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图书馆部分共九个子目,分别为行政与组织、建筑与设备、经费与藏书、分类与编目、馆员之训练与待遇、图书馆出版物之编刊、战时损失及胜利后之清理与接收、孤本秘笈之搜购与影印、国立图书馆概况。其关于图书馆事业的材料较为丰富全面。

《中国教育年鉴》由教育部组织人员编写,其图书馆部分的特色主要有:

一是注重全国视野下图书馆事业的整体性描述,无论《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都是如此。如介绍图书馆行政与组织时,臚列了近代中国主要的公共图书馆法规,包括《图书

馆通行章程》、《图书馆规程》(1915年)、《通俗图书馆规程》、《图书馆条例》、《图书馆规则》(1947年)等。图书馆法规是图书馆运作的法律依据,是图书馆权利的法律保障,也是教育部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式。《中国教育年鉴》把图书馆法规作为图书馆部分的起点,地位使然。

再如图书馆概况。《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专门编制了《全国图书馆统计表》,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省市别、普通图书馆、专门图书馆、民众图书馆、社教机关附设图书馆、机关及团体附设图书馆、书报处、学校图书馆及私家藏书楼8类,而前7类又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类。该表是1931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公布的《十九年度全国公私立图书馆一览表》的修改版。根据《全国图书馆统计表》,截至1933年底,我国公立图书馆中,民众图书馆为558所,普通图书馆为827所,专门图书馆为40所;私立图书馆中,民众图书馆为17所,普通图书馆为67所,专门图书馆为18所,各类图书馆总数达2 935所。我国历来有图书馆调查统计的传统,不管是私人的还是官方的,局部的还是大规模的,图书馆的调查统计活动一直都存在。其中著名的调查主要有中华图书馆协会在1925年、1928年、1930年、1931年,接连4次公布的《全国图书馆调查表》,调查以省为单位,内容包括华北、华中、华南、华东地区各省市图书馆的馆名和地址,并分类总计了各省和各种类型图书馆的数量。《全国图书馆统计表》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调查统计相互补充,丰富了我国的图书馆调查研究。《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同样绘制了《全国图书馆统计表》,分别为1936年和1948年的统计数字。

二是资料使用较为全面。教育部编写年鉴时,常常使用档案资料,这是其特色之一。如第二次年鉴介绍图书馆行政时,开头即谓:“大学院成立之初,内设行政处,主持全国教育行政事宜,处分六组,图书馆亦占其一,掌理下列事项:(一)关于国立图书馆事项;(二)关于学校图书馆事项;(三)关于公立图书馆事项;(四)关于保存文献事项;(五)关于钞印稀有图书事项。不久图书馆组并入文化事业处,迨大学院改为教育部,遂将图书馆事项,归并社会教育司,不复独立成一部门矣。”<sup>[8]1104</sup>教育部管理图书馆事业的机构多为社会教育司。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实行大学区制,设立了大学院。不过,大学院管理图书馆的行政部门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第二次中国

教育年鉴》对该机构的介绍,为深入研究国民政府初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教育部档案资料在《中国教育年鉴》中运用最为成功的地方,集中体现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孤本秘笈之搜购与影印”部分。该部分着重提出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中央图书馆的文献收购活动:“国立中央图书馆于二十九年收藏吴兴许氏善本书七十余种,三十年在沪港两地收购,历年所藏已达一五三、四一四册。罕见之品有金崇庆间刊本之泰和五音新改并类聚四声篇,元至正间徐氏一山书堂刊本之礼部韵注(前附科场条例),元刊本之新编阴阳足用选择龟鉴,元溪隐书堂刊本之新编年月集要,前至元十八年刊本之涓吉成书,至正间刊本朱墨套印本之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明刊本之高皇后传,寰宇通志及嘉隆新例等。此外尚购有宋版书二十余种,六朝及唐人写经四十余卷,永乐大典数册,宋本中之南宋群贤小集及十二行本之陆宣公奏议等书,成批入藏者则有张氏搢辉齐大批珍本图书,计二百六十种,其中最珍秘者有金刻之云齐广录,明建文齐刻本之元音,明抄本之廷枢纪闻,述右堂钞本,钱遵王密校之怀陵流寇始终录,曹倦圃手抄黄尧圃手跋之方澜、郭升、刘垞郑铭四家诗,元钞本之敦交集及建文、天顺、弘治、嘉靖、万历、崇祯各朝之登科同学录等。又明代大统历,自景泰以迄崇祯,都凡三十九部,尤为大观,而宋元刻本,亦达十多种。关于金石拓片古今兴图曾于三十三年购入天津孟氏旧藏金石拓片一千五百种,三十一年购入番禺商氏所藏金石拓片七百余种,总共已达一一、一三九件。”<sup>[8]1116</sup>细绎这些书籍入藏时间和收购区域,均为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的沦陷区。国统区机关在沦陷区收购书籍,本身就值得玩味。随着《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sup>[9-11]</sup>《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sup>[12]</sup>《郑振铎等人致旧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sup>[13-14]</sup>以及台北大学方国璇的硕士学位论文《抗战期间古籍抢救与古书业》<sup>[15]</sup>等一系列论文的发表,我们始知国民政府中央图书馆战时收集沦陷区文献活动的惊心动魄。这些材料当时不可能公布,而教育部已经把相关情况编入《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资料的独特性成就了《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的学术价值。

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国立北平图书馆身上。《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国立北平图书馆近年来

入藏罕见书,数亦不少。举其要者有明张凤鸣辑旧抄本桂胜,明杨芳詹景风纂修万历刻本殿粤纂要,康熙初年刻本盘州盘江铁桥志,康熙刻本松江府志。嘉庆刻本扬州府图经,乾隆刻本泾渠志,明赵琦美抄校本东国史略,明末刻本逊国正义记,朱丝栏精抄本清文宗穆宗实录,明归有光等修隆庆刻本三吴水利录,宋罗从彦撰元刊本罗豫章集,明万历刻本常熟文献志,明谢肇浙撰万历刻本文海披沙,明刊本程氏、金氏、方氏、汪氏、洪氏家谱,明戚继光撰明刊本戚少保兵书,明刊本河南河内县志,明万历刊本四川赋役书册,明文林撰弘治正德间精刻本文温州集等。又孤本元曲凡六十四册,每册载元明剧三种左右,共二百种,皆为元曲选所未刊者,其中以明抄者为多,亦间有元刊本,未有陈眉公,黄尧圃,丁初我诸家之跋;为也是园钱氏旧藏,政府正拟价值购,案存平馆。”<sup>[8]1117</sup>这些书籍多为抗日战争时期在沦陷区收购。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购这些书籍时,不能大张旗鼓地宣传,至多在《图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等刊物上略载一二。如乾隆刻本《泾渠志》信息发表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sup>[16]</sup>。其收购过程直到最近几年才有学者揭示出来<sup>[17]</sup>。不过,《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已经在1948年展示了这些战时成果。这是其他私人著述所无法比拟的。

当然,《中国教育年鉴》的价值远远不止上述所述两类,其他如更正错误等,均属荦荦大端,不再一一罗列。

## 2 《中国教育年鉴》的不足

因为宏大,《中国教育年鉴》也存在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是观点与学者高度相似。《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评价民国初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趋势时,提出5点:“由保存而趋于使用”“由贵族而趋于平民”“由深奥而趋于实用”“由简单而趋于复杂”“由散漫而趋于联络”<sup>[17]788</sup>。金敏甫有一篇文章叫《中国现代图书概况》,指出图书馆发展的趋势为“由保存的趋于使用的”“由贵族的趋于平民的”“由深奥的趋于实用的”“由主观的趋于客观的”“由形式的趋于精神的”“由机械的趋于专门的”<sup>[18]</sup>。两者比较,差异仅在于后面两点。金敏甫的文章发表于1928年,而《第一

次中国教育年鉴》出版于1934年。显然，后者大篇幅地借鉴了前者，有掠美之嫌疑。

《中国教育年鉴》中这类情况不止一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民众教育馆纷纷成立，成效显著。《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叙述民众教育馆沿革时，提出：

“民众教育馆，为国民政府成立后之一新兴教育事业。其前身为通俗教育馆。设立最早者，当推民国四年成立之江苏省立南京通俗教育馆。”<sup>[8]1096</sup>我国的通俗教育开始于民国四年（1915年）吗？根据学者的研究，“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在北京设立通俗教育调查会，调查北京有关通俗教育各情形。根据该会的调查，京师学务局设宣讲所8处，通俗图书馆1处。同年，河南等省也都开始筹设通俗图书馆”<sup>[19]</sup>。也就是说，我国通俗教育至少开始于1912年，甚至可能更为提前。《中国教育年鉴》的说法，与著名学者陈训慈的观点较为接近。陈提出，1915年《通俗图书馆规程》的颁布，标志政府对于图书馆的目光，由硕学士子已及于民众的身上，“可说是民众图书馆的张本，中国的民众图书馆运动自此抬头”，“当时各省民众图书馆，以江苏最为发达，如南京民教馆图书馆在民国四年三月”<sup>[20]</sup>成立。陈训慈的文章发表于1936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出版于1948年。或许其他学者更早提出类似观点也未可知。不管如何，教育部的观点肯定落后于学者，且与学者观点高度相似，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是机构介绍残缺不全。国民中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只是公布《图书馆通行章程》等图书馆法规，还设立了机构，专门负责图书馆事宜。这些机构是全国图书馆事业的管理机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虽然介绍了大学院管理图书馆事务的组织机构，但却遗漏了其他时期中央教育主管部门设立的图书馆管理机构。

清末，中央设立学部，学部又设五司十二科。学部下设专门司庶务科，“凡关于图书馆、博物馆、天文台、气象台等事均归办理”<sup>[21]</sup>。专门庶务科，“员外郎一员，主事一员，办理科务”<sup>[21]</sup>。专门司庶务科推动了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清末管理地方教育事务的机构是提学使司。每省设一员提学使，秩正三品，为督抚之属官，总理全省学务，包括图书馆事务<sup>[22]</sup>。劝学所和教育会也在各地纷纷兴起，劝学所为全境学务之总汇，各厅州县于本城择地设劝学所；教育会则与劝学所、学务公

所联络一气，其宗旨为“补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sup>[23]</sup>。它们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都有助益。

提学使衙门下的学务公所分为六课，图书课占其一，“掌理编译教科书、参考书，审查本省各学堂教科图书，翻译本署往来公文书牒，集录讲义，经理印刷，并管图书馆、博物馆等事务”<sup>[22]</sup>。在各地的教育总会和分会中，其应举事务包括“筹设图书馆、教育品陈列馆，及教育品制造所，并搜集教育标本，刊行有关教育之书报等，以益学界”<sup>[23]</sup>。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设立了教育部。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司，管理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各项社会教育事务。社会教育司所掌事务包括：“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关于通俗图书馆巡行文库事项”<sup>[24]</sup>。社会教育司一直到1927年才被大学院替代。不过，大学院为时不久，1929年又恢复为社会教育司。《中国教育年鉴》仅介绍大学院行政处，显然不够。

三是史料问题。《中国教育年鉴》中图书馆材料方面有很多问题。如《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收录了《图书馆通行章程》，然而到“第十九条”时，全文结束。1910年，《政治官报》刊载了《图书馆通行章程》全文，两者对照，发现《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遗漏了第二十条：“图书馆办事章程如有未尽事宜，应随时增订。在京呈由学部核定施行，在外呈有提学使司转详督抚核定施行。”<sup>[25]</sup>1981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了《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其附录一为图书馆法令，第一个即为《图书馆通行章程》。不过，该章程也只有19条<sup>[26]</sup>，第二十条完全遗漏。这两者的巧合，可见《中国教育年鉴》确存在材料遗漏问题。

又如《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民国十四年十月教育部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十一条如左”<sup>[17]788</sup>，又载“同年十一月，教育部又颁布《图书馆规程》十一条，照录入下”<sup>[17]788</sup>。而《通俗图书馆规程》原文，其第二条为“通俗图书馆之名称，适用图书馆第三条之规定”<sup>[27]</sup>，第三条“通俗图书馆之设立及变更或废撤时，依图书馆第四条之规定，分别具报”<sup>[27]</sup>，第四条“通俗图书馆主任员应依照图书馆第五条之规定，分别具报”<sup>[27]</sup>，第六条“公立通俗图书馆之经费预算，适用图书馆第八条之规定”<sup>[27]</sup>，等等。这些条款都提到“图书馆”一词。那么，这个“图书馆”是什么呢？显然是《图书馆规程》。而《图书馆规程》一定和《通俗图书馆规程》同时公布，或在其前

公布,而绝对不应该在其后公布。事实上,《图书馆规程》<sup>[28]</sup>和《通俗图书馆规程》<sup>[27]</sup>在《教育公报》上同时公布了。这个谬误流传更广。《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春秋至五四前后》将它们收录,《通俗图书馆规程》后面的记载为“一九一五年十月”,《图书馆规程》后面的记载“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还言之灼灼来自《教育公报》1915年第8期<sup>[29]</sup>。或许它们出错的渊源完全相同。

再如,《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编制了《全国图书馆统计表(二十五年及三十六年)》。根据该表,1936年时,我国单设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机关社团附设图书馆、民教馆图书部,共5 196所。1947年时,我国这些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共为2 702所。这些数据来自哪里?《中国教育年鉴》没有说明。1936年7月27日,教育部通过《中央日报》公布了截至1936年底全国图书馆统计表。根据该表,学校类图书馆为1 967所,私立类图书馆为20所,普通类图书馆为576所,专门类图书馆为11所,流通类图书馆为37所,机关类图书馆为175所,民众类图书馆为1 255所,总计4 041所<sup>[30]</sup>。显然,《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没有采纳教育部公布的调查数据。那么,这5 196所图书馆书籍来自哪里?1936年,《申报年鉴》发表了和陈训慈合作编写的《全国各省市各种图书馆数量统计表》(计二十八省,六直辖市,西藏及外蒙未及调查)。根据该表,全国图书馆分为四类,单设图书馆1 502所,民教馆990所,机关附设162所,学校2 542所,共计5 196所<sup>[31]</sup>。比较这两个统计表,不难发现,全国图书馆总数完全相同。不过,在各种具体图书馆数据上,又有很大差异。如数据合计问题。《全国图书馆统计表(二十五年及三十六年)》中的统计对象比《全国各省市各种图书馆数量统计表》要多,西安、大连、天津、汉口等地区图书馆数据均为《全国各省市各种图书馆数量统计表》所无。蹊跷的是,两者的合计数据是一致的。其中原因耐人寻味。只能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编制的《全国图书馆统计表》合计数据有问题。《第二

次中国教育年鉴》还存在数据誊抄错误。《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和《申报年鉴》都对1936年的单设图书馆、民教馆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机关附设图书馆进行了数量统计,但两者的表格中,学校图书馆与机关附设图书馆的先后顺序不一样。在《申报年鉴》中,学校为2 542所,机关附设为162所;《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学校图书馆为162所,机关社团附设图书馆为2 542所,这是不可能的。当时都没有那么多机关。根据教育部1936年7月27日在《中央日报》公布的数据,截至1935年底,机关类图书馆为175所<sup>[30]</sup>,抗日战争后突然增加到2 542所,完全不可能。此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关于1936年各省市学校图书馆的数据与《申报年鉴》中机关附设的数据完全一致,而《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机关社团附设图书馆的数据又与《申报年鉴》中学校的一致。以江苏省为例,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其学校图书馆为7所,机关社团附设图书馆为44所;而在《申报年鉴》中,其学校为44所,机关附设为7所。又如浙江省,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其学校图书馆为21所,机关社团附设图书馆为125所;而在《申报年鉴》中,其学校为125所,机关附设为21所。由此可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将1936年中学校图书馆和机关附设图书馆的两类数据抄反了。

### 3 结语

《中国教育年鉴》是由中华民国教育部组织人员编写,其关于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描述,反映了教育部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看法。这种看法,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中国教育年鉴》中使用了一些当时没有公开的文件,在材料上也有新颖之处。这是《中国教育年鉴》极具价值之处。然而,《中国教育年鉴》在很多细节上存在雷同、讹误等问题。尽管如此,《中国教育年鉴》图书馆部分依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

#### 参考文献:

- [1] 孙毓修.图书馆[J].教育杂志,1909,1(11/12/13):45-70.
- [2] 孙毓修.图书馆[J].教育杂志,1910,2(8/9/10/11):27-64.
- [3] 马宗荣.现代图书馆的研究[J].学艺,1924,5(9):2.

- [4] 马宗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史的研究:上[J].学艺,1930,10(3):1-6.
- [5] 马宗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史的研究:中[J].学艺,1930,10(5):1-7.
- [6] 马宗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史的研究:下[J].学艺,1930,10(7):1-8.
- [7] 中国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M].上海:开明书店,1934.
- [8] 中国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 [9] 沈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上[J].文献季刊,2001(3):249-275.
- [10] 沈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中[J].文献季刊,2001(4):214-228.
- [11] 沈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下[J].文献季刊,2002(1):216-231.
- [12] 苏精著.近代藏书三十家[M].北京:中华书局,2009:234.
- [13] 陈福康.郑振铎等人致旧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J].出版史料,2001(1):87-100.
- [14] 陈福康.郑振铎等人致旧中央图书馆的秘密报告(续)[J].出版史料,2004(1):102-124.
- [15] 方国璇.抗战期间古籍抢救与古书业:以郑振铎与书贾间相关活动为探讨重点[D].台北:台北大学,2009.
- [16] 国立北平圜近讯[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0,14(5):21.
- [17] 刘劲松.抗战期间北平图书馆收购沦陷区珍贵文献活动小考[J].图书馆杂志,2017,36(7):110-113.
- [18] 金敏甫.中国现代图书概况[J].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1928,1(1):8-10.
- [19] 张书美.中国近代民众图书馆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1:50.
- [20] 陈训慈.二十年来我国之民众图书馆与其展望[J].教育辅导,1936,2(8-9):42.
- [21] 谨将酌拟学部官制职守缮具清单恭呈御览[J].直隶教育杂志,1906(9):2.
- [22] 谨拟各省学务详细官制及办事权限章程缮具清单恭呈御览[J].学部官报,1906(2):22,24.
- [23] 谨将教育会章程恭呈御览[J].秦中官报,1906,7(4):211,215.
- [24] 教育部官制案[J].政府公报,1912,8(95):71.
- [25] 谨拟图书馆通行章程恭呈御览[J].政治官报,1910,12(813):360.
- [26] “中央图书馆”.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M].台北:“中央图书馆”,1981:404.
- [27] 通俗图书馆规程[J].教育公报,1915,2(8):2-3.
- [28] 图书馆规程[J].教育公报,1915,2(8):1-2.
- [29] 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春秋至五四前后[M].北京:中华书局,1982:184-185.
- [30] 全国图书馆统计[N].中央日报,1936-07-27(4).
- [31] 申报年鉴[M].上海:申报年鉴社,1936:1236.

**作者简介:** 梅影,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刘劲松,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收稿日期:** 2021-08-23

**本文责编:** 李芳

## 浙东抗日根据地报刊探析

丁若时

(宁波图书馆 浙江宁波 315100)

**摘要:**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始终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浙东抗日根据地报刊是中共党史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浙东出版发行历程的重要见证。文章从刊载内容、办报主体、从业人员三个方面对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报刊创办情况进行探析,研究其成因及影响,以期促进红色文献和中共党史史料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 浙东抗日根据地;报刊;红色文献

**中图分类号:** G219.29; G255.3      **文献标识码:** A

### Analysis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the East Zheji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PC and the people's army under its leadership alway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publicity role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ase areas. Tho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bout the East Zheji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are par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CPC's history, and witnesses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ation business in eastern Zhejia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the east Zheji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is analyz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contents, the main body of the newspapers, and the employees. It has facilitated the deepening of the research on the red literature in the east Zhejiang area and the comple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PC.

**Key words** East Zheji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red document

#### 1 引言

浙东抗日根据地处于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三角地带,根据地包括三北、四明、金萧、淞沪四个基本区和三东游击区。自浙东抗日根据地建成起,秉持“一手拿枪杆,一手拿笔杆”的指导思想,浙东区党委始终将舆论宣传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设办创立小型的报纸,帮助群众〔提高〕抗日政治水平”<sup>[1]40</sup>,涌现出诸多由中国共产党主持或领导完成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的报刊,鼓舞了浙东军民的抗日斗志,成为浙东抗战胜利的重要支撑。1942年6月谭启龙抵浙并成立中共浙东行动委员会,至1945年11月浙东纵队和党政机

关及地方工作人员完成北撤任务,本文对此期间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报刊进行梳理,探析红色文献,目的是研究其成因与影响,以进一步推动红色文化与中共史料的深入发展。

#### 2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办报概况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以战时状态为由实行以原稿审查为标志的新闻管制政策,中国共产党面对新闻出版的限制和舆论宣传的封锁,以抗日根据地为依托,建成以《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中心,及《晋察冀日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新华日报》华东版(晋冀鲁豫根据地)、《大众日

报》(山东根据地)、《抗敌报》(华中抗日根据地)等各大根据地报刊为辅的中共媒体体系<sup>[2]</sup>。作为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中比较小又最年轻的一块,浙东抗日根据地在创立、巩固与发展过程中,新闻出版事业也从无到有,形成机关党委、部队政治部和统一战线的三种办报形式,中国共产党的高参与度成为其鲜明特征。

## 2.1 浙东抗日根据地主要报刊

通过调查,笔者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报刊及其主办单位进行了整理(见表1),其中如《文艺周刊》《新文教》《浙东青年》《浙东妇女》等为《新浙东报》副刊或专刊,且《时事简讯》与《浙东报》均为中共浙东区党委主办且先后停办,由《新浙东报》承继,故本文以《新浙东报》为例进行分析。

表1 浙东抗日根据地主要报刊分析表

报刊名称	主办单位	属性
新浙东报	中共浙东区党委	机关党委
学习与工作	中共四明地委	
团结	中共浙东区党委	
大众报	浙东行署文教处	
做学写	浙东区党委宣传部、新华社浙东分社	
新华社简讯	淞沪地委	
抗日报	金义浦地委	部队政治部
战斗报	纵队政治部	
战斗半月刊	纵队政治部	
战斗画报	纵队政治部	
团结报	纵队政治部	统一战线
解放周报	日本反战同盟浙东支部	
东南文化	东南文化社和编辑委员会	
大众报	镇海龙山区教育会	

这些报刊不仅反映出党的宣传舆论工作以浙东抗日根据地为依托迅速形成规模,且给予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这些报刊大多以党的政治纲领与行动路线作为宣传重点,但不同办报形式仍存在差异,具有各自的职能作用。

## 2.2 根据地报刊内容及阅读对象

机关党委办报的阅读对象主要为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党员,如被明确为浙东区党委机关报的《新浙东报》就要求“各级党必须经常组织研究讨论”,在宣传抗日的稿件外,还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为重要内容,其中以“浙东区党委及各部门

负责人之文章以及中央的、华中局的与浙东党的各种文件”<sup>[188]</sup>作为党的正式指示。另有四明地委出版《学习与工作》以“改造思想与转变领导工作作风”<sup>[31165]</sup>,浙东区党委宣传部、新华社浙东分社联合发行的《做学写》旨在“供给党政军民各给各部门的党员干部与进步的非党同志阅读与发表写作的”<sup>[3201]</sup>,《团结》则是浙东区党委创办的党内刊物。

部队政治部办报侧重于部队战士,如《战斗报》属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机关报,刊登内容主要为部队的的生活与战斗,作为部队工作的指导中心与教育工具<sup>[190]</sup>。《战斗报》改版后阅读对象改为干部,而战士的阅读需求转由同是纵队政治部创办的《战斗画报》提供<sup>[3219]</sup>。总的来说,这一类报刊虽然也刊登各类新闻消息,但仍以服务部队为主。

此外,由浙东地区文化人士成立的东南文化社筹备有《东南文化》为“反映现实生活,提高东南抗日民主文化运动的热潮”<sup>[4]</sup>,日本反战同盟浙东支部主办的《解放周报》由楼适夷主编(另有黄源任主编),日本人共办,内容主要为两类:新华社电讯译文、日本人自撰稿件,主要起到对敌宣传的作用<sup>[3347-348]</sup>。

## 2.3 根据地报刊从业人员

基于提高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正确认识并扩大政治影响力的目的,浙东区党委为保证根据地报刊的宣传效果,在报刊工作中的参与度很高,直观体现在办报人员上。

从根据地报刊的主办单位上看,机关党委与部队政治部办报数量较多,属于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直接领导与操办,并成立有以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为主任的党报委员会<sup>[3]89</sup>。此外,浙东区党委还选派优秀党员干部充任负责人,如《新浙东报》的社长由宣传部长顾德欢(即张瑞昌)担任,新华社浙东分社社长于岩任副社长兼总编辑。《战斗报》的社长为浙东纵队政治部宣传科长江岚,主编则由浙东文工队副队长丁柯担任,其曾为粟裕、陶勇部队的随军记者,有在苏中四分区《江海报》的采写经验<sup>[5]</sup>。

党外办报也不乏中共党人的参与,如《解放周报》的主编黄源与楼适夷,分别为浙东鲁迅艺术学院的院长与副院长,此外两人还分任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与副处长,其中黄源在前往浙东抗日根据地前曾参与编辑《文学》《译文》《呐喊》等著名刊物,以及有担任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报》副总编辑的工作经

历<sup>[6]</sup>。楼适夷早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与编辑《救亡文艺》《奔流新集》等刊物<sup>[7]</sup>。《东南文化》则由黄源、楼适夷、张瑞昌、江岚、于岩组成的编辑委员会负责<sup>[4]</sup>。

对于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报刊工作，浙东区党委对负责人的考量以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并重，并设有专门管理机构，正因为对宣传工作的重视，根据地报刊才得以满足根据地形势发展的需要。

### 3 浙东抗日根据地报刊发展成因

1942年6月，谭启龙在古窑浦登陆，当月出版油印《电讯稿》，同年7月成立“时事简讯社”并改出《时事简讯》，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第一份正式的红色报刊。虽然根据地的报刊工作在第二次反顽战役中遭受严重挫折，但在浙东区党委的重视下始终保持活力并发展壮大。

#### 3.1 浙东区党委统筹引导

浙东区党委制定的任务与总方针指出“报纸内容的充实及其发行普遍深入迅速，不能专靠报社少数工作同志，而应由全党来负责”<sup>[8]</sup>，并明确“奖励抗日书报的发行”<sup>[1]86</sup>。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的报刊发展有着具体政策与措施，同时也要求部队开展宣传学习工作，不仅创办有《战斗报》等刊物，还制定墙报、读报、干部小报的“三报制”。此外，浙东区党委积极联系各地热心新闻文化人士，听取报界工作者改进意见<sup>[9]</sup>，成为根据地的“主心骨”，起到指引报刊工作任务的作用。

浙东区党委贯彻中共中央有关抗战的各项方针和政策，响应“全党办报”的号召，重视宣传工作，在实践中总结出办报与培养报人的有效模式，对促进根据地的报刊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 3.2 外来文化力量支援

早在1938年，中共江苏省委派陈静等人建立了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领导浦东抗日武装斗争，并为连柏生所组建的抗日保家武装小分队（后获得了“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的番号）送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其他进步书籍<sup>[10]</sup>。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上海、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地先后沦陷，诸地的出版机构先撤至金华，后又退到丽水、云和一带，虽一度繁荣稳定，但在日军的威胁下，浙江新闻出版事业陷入困顿，勉强维持各自为战的局面。

至浙东抗日根据地创建，浙东地区有了坚实的领导核心，浙东区党委对广大知识分子秉持信任的态度，兴办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文化事业，促使许多文化人士投入革命宣传工作，为根据地报刊注入强劲动力，其中不仅有受中共组织的派遣，从各地党政军文化部门抽调而来，也有来自沪、杭、甬及其他各地的知识青年、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人<sup>[11]</sup>。外来知识分子的涌入，极大地增强了根据地的新闻出版力量。

#### 3.3 出版发行建设完善

按照党中央“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的要求<sup>[12]</sup>，浙东区党委在敌人的封锁中，在四明山陆埠杜徐岙泥镬里建立根据地第一个印刷厂。浙东印刷厂自1943年7月1日开印第一份文件，至1945年10月1日《新浙东报》终刊号宣布结束<sup>[13]</sup>，期间浙东印刷厂是根据地报刊出版印刷的重要保障。

1944年，为统一出版物的发行工作，浙东区党委成立“浙东书局”，同年改名为“浙东韬奋书店”，除负责管理发行部外，还负责领导印刷厂和芝林纸厂，组成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发行网络。至北撤前夕，出版发行人员发展到200多人，其中浙东韬奋书店50人左右，印刷厂120多人，芝林纸厂20人左右<sup>[14]</sup>。依靠建成的专业化出版发行网络，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报刊得以广泛地发行到各阶层群众中。

### 4 浙东抗日根据地报刊的影响

报刊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浙东抗日根据地报刊反映出根据地建设和浙东地区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历程，是仍待深入挖掘潜在价值的红色文献。

#### 4.1 巩固浙东抗日根据地

随着日军发动宁绍战役，国民党部队溃败，多地沦陷，浙东地区抗战局势异常紧张，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抗击了敌伪的军事进攻，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而根据地报刊的宣传工作，通过扩大区党委的政治影响，争取了广大群众与民主人士。《解放周报》发行两月后，受其影响的日军官兵逃跑10次41人。其中3名日军士兵手持《解放周报》及投诚通行证，寻找新四军三五支队<sup>[15]</sup>。《抗日报》的刊头字为吴山民题写，其在抗战初期任义乌县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引领下，与党真诚合作，争取到金东义西地区的开

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对金义浦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有着多方面且重要的作用。

根据地报刊与根据地的革命与战斗紧密结合,抓住生动事例进行宣传鼓动,以激发群众的斗争意志,鼓舞根据地的抗战热情。1944年浙东游击纵队以少胜多的大渔山之战,被誉为“海岛狼牙山之战”,由新华社全国播送,这一光辉业绩在《新浙东报》连载有报告文学《大渔山战斗》。《战斗报》则编印“血战大渔山”木刻连环画,对战斗事迹进行广泛宣传。

#### 4.2 新闻出版工作下沉

抗战年间,浙江报业格局发生变化,正规化的大报减少,抗日油印小报增多,记者活动也从城市移到乡村和前线,抗日战争的通讯日益增多,无价值的社会新闻减少,副刊的作用和地位明显提高<sup>[16]</sup>。相比老解放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出版事业起步晚、规模小,但办报方式与刊登内容灵活多变,契合基层群众、工农兵读者的需要。

《新浙东报》有《文艺周刊》等副刊或专刊,而《战斗报》也衍化出《战斗画报》《战斗半月刊》,除新闻通讯、评论文章等形式外,根据地报刊还采用了诗歌、笑话、版画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如《新浙东报》刊发的《满山红》是为悼念俞菊生烈士所作,其中写道“我轻轻地折了朵(满山红),心在跳动偷偷地吻着”,真挚的诗句满溢对战友的情意<sup>[17]914-915</sup>。《战斗画报》则刊有版画《国民党的说和做》<sup>[17]1028</sup>和漫画《蒋介石下山来了》<sup>[17]1034</sup>等极具辛辣讽刺意味的美术作品。同时,根据地报刊的内容提供者不限于专业报人,如《欢迎新同志岩冈文雄君》是原为战俘的日本人栗花落岩所作<sup>[18]</sup>,而《新四军和宋部的比较》则为英雄部队小战士金福根撰写<sup>[17]969-970</sup>。这些报刊扎根根据地,以贴近群众的视角与形式,反映真实的斗争生活,更易为文化水平不高的根据地群众所接受,并提高他们的觉悟。

#### 参考文献:

- [1]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浙江省档案馆.浙东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 [2] 刘继忠,赵佳鹏.新闻媒体的抗战贡献:以主流媒体的抗战宣传为中心的探讨[J].青年记者,2015(22):10.
- [3] 浙东抗日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编纂委员会.浙东抗日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上[M].金华:[出版者不详],1992.
- [4] 佚名.东南文化新阵地 东南文化即将出版[N].新浙东报,1945-04-02(1).

#### 4.3 保留浙东地区新闻出版火种

1945年10月,浙东总队和党政机关奉命北撤,《新浙东报》终刊号发表《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但浙东地区的新闻出版事业并未就此断绝。在原浙东抗日根据地基础上开辟的浙东游击根据地里,抗战时期保留下的火种重燃光辉,如作为金萧地区党和政府的新闻出版机构的鸡鸣社,其“鸡鸣”就来源于北撤前留下的油印出版物<sup>[19]</sup>。再有《新浙东报》社新闻二台报务和译电工作人员乐子型,在北撤时奉命坚守四明,后负责《新华电讯》(后改为《四明简讯》)的编印工作<sup>[20]66-76</sup>。面对艰苦的工作和生活,办报者以非同寻常的意志,实现了党中央主张思想与游击根据地革命宣传的及时传播。

相较于抗战时期,浙东游击根据地的报刊更具规模,各地区工委和支队出版有《台川简讯》《路东简讯》《路南简讯》《金萧报》等十几种油印报刊<sup>[20]207</sup>,并有鸡鸣社、新浙东出版社、四明出版社等多家出版发行机构。从这个角度上说,浙东游击根据地的报刊发展史,即为浙东抗日根据地之后的浙东报人与报业演进史,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浙东新闻出版事业开了先河。

#### 5 结语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中国共产党急需唤醒民众,鼓舞抗战士气。报刊因其出版周期相对较短,时效性较强,成为党政军及群众团体做好宣传工作的有力手段,在抗日救亡的革命宣传中发挥极大的作用。浙东抗日根据地报刊既是中共党史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浙东出版发行历程的重要见证。作为极为重要的红色文献,进一步对其开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对革命传统教育,以及传承红色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下转第79页)

## 基于遗传神经网络的图书采购推荐模型研究

蔡丹丹

(上海图书馆 上海 200031)

**摘要:** 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采购与馆藏质量息息相关。在读者决策采购模式盛行的当下, 基于投入采购的成本是有限的, 如何有针对性、高效地满足读者需求关系着相关成本能否得到高效利用。文章基于上海图书馆普通外借借阅数据, 通过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的方法, 构建基于遗传神经网络的图书采购推荐模型, 判断读者需求的书是否能成为“热门书”, 从而生成推荐采购序列。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 “热门书”可以优先采购, “冷门书”延后采购, 从而使投入的成本得到最优化利用。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图书采购; 神经网络; 遗传算法

**中图分类号:** G253.1      **文献标识码:** A

### Book Purchasing Recommendation Model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 and Neural Network

**Abstract** Public libraries' books purchase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the collection. At present, the 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s model is a popular method. However, how to meet the needs of readers in a targeted manner is related to the efficient use of relevant cost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book borrowing data from Shanghai Library. Through the method of genetic algorithm to optimize a neural network, this article builds a book purchasing recommendation model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 and neural network. This model can get the result of whether the reader demanded book can become a "popular book", to generate a recommended purchasing sequence. "Popular book" can be put high on the priority agenda of purchase, while the purchase of "unpopular book" can be delayed, to optimize the use of cost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book purchase; neural network; genetic algorithm

图书采购在图书馆工作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采购策略对于图书馆馆藏质量和服务水平有着决定性的作用<sup>[1]</sup>, 同时对于读者满意度、阅读推广效果等方面也都有着很深远的影响。采购书目的质量和复本量关系着图书馆能否利用投入采购中的有限的成本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sup>[2]</sup>。对于许多图书馆来说, 充分利用有限的经费同时达到购买到的图书是读者最需求的效果, 是图书采购中的核心问题<sup>[3]</sup>。

图书馆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和先进技术的运用是密不可分的。目前图书采购中的读者决策采购 (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s, PDA) 模式很受欢迎, 但对公共图书馆来说, 如果同时收到的读者需求较多, 如何筛选

真正有价值、利用率高的图书, 关系着读者决策采购的相关投入能否得到最优化利用。而对图书价值和利用效率的预判, 目前在许多图书馆中还是基于采访人员对图书信息的把握和个人经验。随着智慧图书馆概念的发展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 将图书采购原则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 减少图书采购时的主观判断因素, 形成更科学高效的采购策略, 是在“互联网+”时代发展智慧图书馆亟需面对的课题。

本文利用近年流行的神经网络结合遗传算法对图书进行协同分析, 将图书分为有借阅图书 (“热门书”) 和零借阅图书 (“冷门书”) 两类, 获得基于图书特征的借阅预测模型, 在采购前对一本书是否会成为

“热门书”进行预测,从而为是否满足读者提出的采购需求提供依据。

## 1 图书采购模型研究现状

目前图书采购研究热点是读者决策采购、图书招标采购等采购方法,数据挖掘在图书采购中的应用也是研究热点之一<sup>[4]</sup>。许多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数据挖掘模型来建立科学的图书采购决策,但这些模型也都有尚待解决的问题。

### 1.1 现有数据分析模型的优化

有研究者将回归分析模型应用于建立图书借阅率预测模型,并以此作为图书采购复本量的参考<sup>[5]</sup>。但回归分析需要依赖线性相关关系,当订购数量作为决策对象时,与采购相关的多因子没有很好的线性相关关系<sup>[6]</sup>。为了实现图书建设的良性发展,得到一个有效的、可观的订购策略,有研究者建立了基于单隐层神经网络的图书订购动态模型,来实现图书购买经费的优化配置,该模型可以较好地处理非线性相关关系<sup>[6]</sup>。

为减少主观因素,增强图书采购的科学性,有部分研究者及图书馆尝试过建立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图书采购策略<sup>[7]</sup>。层次分析法是一种有效的系统分析方法,基于人的决策和判断,结合部分定量信息,为解决复杂的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但仍然较为依赖人的判断,存在准确性和客观性不足的缺陷<sup>[8]</sup>。有的研究者引入了基于BP(Back Propagation)算法的神经网络,即BP神经网络,来对层次分析法进行优化,这种优化方法相对于单纯的层次分析法,具有不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避免出现逻辑错误的优点,但同时该模型也有收敛速度受限和可能出现局部最小的情况尚待改善<sup>[8]</sup>。

由此可以发现,许多研究者提出的图书采购模型中存在缺乏客观性、准确性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构建基于神经网络的采购模型来解决。但无论是神经网络模型还是有一定改进的BP神经网络模型,在构建时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收敛效率和局部最小问题等都有继续优化的可能。因此,在进行图书采购模型的研究时,我们可以考虑引入遗传算法来进一步优化神经网络模型。遗传算法具有良好的全局搜索性能,并减少了陷入局部最优解的风险,这些优点恰好

可以弥补神经网络的缺点<sup>[9]</sup>。

### 1.2 现有神经网络模型的应用

目前应用于采购的神经网络模型有许多不同的类型,有的研究者提出通过LVQ(Learning Vector Quantization)神经网络,基于图书的特征对是否采购进行预测<sup>[10]</sup>;也有研究者通过灰色神经网络构建了基于拒借率和流通率的图书复本量预测模型<sup>[2]</sup>,等等。但这些基于神经网络的采购模型,一方面显示出神经网络模型相对于传统回归模型,预测精度更高<sup>[2]</sup>,但同时都无可避免地受到神经网络模型本身固有缺陷的限制。

有一部分关于图书采购模型的研究也探讨了神经网络模型的不同优化方法,比如结合带有影响因子的遗传算法,预测某本书是否会被本校图书馆采购<sup>[11]</sup>;以及通过遗传算法对基于神经网络和支持向量机的两种采购模型进行优化,对比优化后对图书馆是否采购的预测准确度<sup>[3]</sup>。这些优化模型都取得了比原有的标准神经网络模型更好的预测结果,因此基于遗传神经网络原理来构建采购模型是一个可行的方法,而且相较于基于标准神经网络的模型,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由此,本文选择了基于遗传算法的神经网络来构建采购决策模型。

此外,综合上述案例可以发现,在神经网络与图书采购策略结合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是否采购的研究,是基于过往采购专员的采购行为而形成的函数,可以达到的效果是减轻采购专员的机械劳动量。本文则希望通过对遗传神经网络的应用,形成关于零借阅图书的非线性映射模型,模型的构建是基于对过往读者行为的总结,尝试从读者行为角度,为采购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 2 神经网络及遗传算法概述

本文选择利用遗传算法对神经网络进行优化,构建基于遗传神经网络的采购决策模型,而不是采用传统的标准神经网络,是考虑到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的特点,利用遗传算法作为神经网络学习和训练的基础,以期能够获取一个预测精度更高、训练效率更好的模型。

### 2.1 神经网络概述

神经网络具有极强的非线性映射能力,因此可以很好地处理非线性映射关系。理论上,对于一个三层

和三层以上的网络,只要隐含层神经元数目足够多,该网络就能以任意精度逼近一个非线性函数<sup>[3]</sup>。但标准神经网络也存在一定缺陷。我们可以把神经网络的整个计算过程看作是一个优化学习和训练函数的过程,我们需要在计算中找到算法的权值和阈值,在此范围内,根据输出结果与实际预期结果比较,可以得到最小误差值<sup>[12]</sup>。因而,在寻找权值和阈值的过程中,由于初始值是根据经验预设,就有陷入局部极小值的风险,同时初始值设定距离最优值较远,就会存在训练时间比较长的问题。

此外对于神经网络的特点有多种优化方法,其中应用比较广泛、结构比较简单的是基于BP算法的神经网络,即BP神经网络,是标准神经网络的改进。它是一种双向预反馈神经网络,它的反馈机制能够修正神经网络的一部分缺点以提高训练效率,但始终存在陷入局部极小值的风险,并且训练样本数的增加仍然会降低模型的收敛速度<sup>[13]</sup>。

## 2.2 遗传算法概述

美国密歇根大学Holland于1975年提出的遗传算法是一种通过模拟生物进化过程,基于“优胜劣汰”的原理,选择、进化、迭代计算寻找最优解的算法<sup>[14]</sup>。其本质是一种全局优化搜索的方法,它能在搜索过程中自动获取和积累有关搜索空间的知识,并自适应地控制搜索过程以求得最优解<sup>[11]</sup>。

遗传算法可以对神经网络的权值和阈值进行优化,代替随机根据经验设置的初始值。因此有研究者通过引入具有良好全局寻优能力的遗传算法,建立遗传神经网络,来优化标准神经网络,发现遗传算法有能力较好地降低标准神经网络存在的容易陷入局部极小的风险<sup>[15]</sup>。同时也有研究发现,遗传算法能够有效地解决神经网络中的预反馈信息问题,因此通过遗传算法优化的神经网络结构可以解决神经网络收敛速度慢、运行效率低等问题<sup>[12]</sup>。

遗传算法和神经网络的特点决定了将两者结合使用,是一种优化构建模型的方法,可以使神经网络具有自进化与自适应能力<sup>[14]</sup>,从而使模型面对图书馆中样本数据量较大的情况时,能够发挥效率优势和精准度优势。

## 3 基于遗传神经网络的图书采购推荐原理

上海图书馆目前开展了多种表现形式的读者决策采购,包括在书目查询系统中开通了“中文图书你荐我购”标签页<sup>[16]</sup>,以及在上海书展期间的“你选书,我买单”活动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但面对多样化需求时也要考虑到,尽管PDA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馆藏建设“以用户为主导”的特点,但读者们的选择也是充满个人偏好的选择<sup>[17]</sup>。如何科学高效地利用投入采购中的成本,使按需采购的图书是更多读者需要的图书,也是公共图书馆需要决策的重点。

因此,本文利用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模型,现有读者行为结合书目信息预测图书是“冷门书”还是“热门书”,从而可以为是否满足读者需求进行采购提供依据。如果模型预测为“热门书”则推荐优先采购,如果模型预测为“冷门书”则根据采购成本延后采购。

### 3.1 数据集选择

数据集来自上海图书馆普通外借类型图书,共计627 529册,选取其中的零借阅图书数据共82 779册。通过书目号筛选,发现零借阅图书为7 729种。提取这7 729种书籍的特征值量化作为零借阅书目数据集,相对应地选取普通外借类型图书中借阅量排名在前8 000种的书目作为有借阅书目数据集,共提取15 729种书籍的书目信息。筛选其中编目数据比较完整的书目共得到14 834条书目,因此数据集为:零借阅书目7 358种,有借书目7 476种。

### 3.2 设计步骤

通过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模型的设计步骤为:①数据采集。提取大多数图书都有的书目信息作为特征值,对特征值进行量化。②创建神经网络,数据集导入MATLAB(Matrix & Laboratory)中,共14 834条数据,其中训练数据14 000条,测试数据834条。③通过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的阈值和权值。④将优化后的阈值和权值带入还未开始训练的神经网络。⑤训练神经网络。⑥测试神经网络。⑦分析准确率。

### 3.3 特征值的选择和量化

首先,根据特征在数据集中的数量进行排序,优先选择数量比较多的特征;其次,对特征是否会对读者借阅行为产生影响进行分析判断,选取会对借阅产生影响的特征。因此,本文选取分类、著者、主题、出版社、出版日期、开本、页码、语种这8个特征进行量化。

著者、主题、出版社都通过统计词频后排序实现量化,由于是非线性映射,排序号码数值的大小与最终判断结果并无线性逻辑关系,因此直接将排序号作为量化值。

#### 4 遗传神经网络构建过程

本文基于MATLAB构建神经网络并通过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的结构和神经元权重,从而利用遗传神经网络判断某本书目为零借阅图书还是有借阅图书。

##### 4.1 数据准备

数据存储在MATLAB数据文件中,共有14 834条数据,包括图书馆当前普通外借的冷门书籍和热门书籍。输入神经元的个数为8,代表书籍的各种特征,输出神经元个数为1,输出值通过一定规则判定为0或2,分别代表冷门书籍、热门书籍。样例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样例数据

分类	著者	出版年	主题	开本	页码	出版社	语种	输出
18	78	2016	177	21	5 320	65	1	2
9	54	2020	285	24	3 657	5	1	0
2	0	2012	311	15	9 419	79	3	0
14	5	2016	222	24	34	54	1	2
111	2 686	2011	203	24	2 729	5	1	2
6	2 497	2012	1 012	21	44	10	1	0

##### 4.2 构建神经网络

首先创建神经网络,设置节点个数、训练集和测试集。主要代码如下:

```
load data input output %读取数据。
```

```
inputnum = 8;hiddennum = 12;outputnum = 1; %节点个数。
```

```
input_train = input(1:14000,:); input_test = input(14001:end,:); %训练数据和预测数据。
```

```
output_train = output(1:14000)'; output_test = output(14001:end)'。
```

##### 4.3 利用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

遗传算法优化过程包括:初始化参数和种群;记录平均适应度;通过选择、交叉、变异计算迭代求解最佳阈值和权值。其中选择、交叉、变异算法的主要过程如下:

```
individuals = select(individuals,sizepop);avgfitness = sum(individuals.fitness)/sizepop; %选择。
```

```
individuals.chrom = Cross(pcross,lenschrom,individuals.chrom,sizepop,bound); %交叉。
```

```
individuals.chrom = Mutation(pmutation,lenschrom,individuals.chrom,sizepop,i,maxgen,bound); %变异。
```

##### 4.4 生成神经网络

通过遗传算法获取神经网络的最佳初始阈值和权值之后,将这些初始值带入神经网络,进行神经网络训练,并获取预测结果。神经网络训练和获取预测结果的主要过程如下:

```
[net,per2] = train(net,input_train,output_train); %训练神经网络。
```

```
BPoutput = sim(net,input_test); error = BPoutput - output_test; result_t = [output_test' BPoutput' error']; %输出神经网络预测结果。
```

#### 5 结果分析

多次运行遗传神经网络进行训练测试,表2中为样本、训练集、测试集的数据基本信息,表3为其中4次的运行结果。

表2 数据基本信息

数据	总数	“热门书”数量	“冷门书”数量
样本	14 834	7 476	7 358
训练集	14 000	7 038	6 962
测试集	834	438	396

表3 运行结果

测试次数	“热门书”准确率/%	“冷门书”准确率/%	总准确率/%
1	89.95	84.34	87.29
2	89.04	85.06	87.15
3	89.50	83.33	86.57
4	90.64	84.85	87.89
平均值	89.78	84.40	87.23

由表3运行结果统计可见,该模型的运行稳定性较高,对“热门书”预测的平均准确率达到89.78%,对“冷门书”预测的平均准确率达到84.40%,平均预测准确率可以达到87.23%。模型获得的误差值较小,且运行结果比较稳定,能够达到预测图书属于“冷门书”或者“热门书”的目的。同时遗传神经网络模型具

有运行效率高的特点,即使导入新的数据,学习效率也很高,因此该模型可以为图书采购提供一定建议,并经常根据读者行为进行修正。

## 6 结语

通过对上海图书馆普通外借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可以发现遗传神经网络在基于读者行为的外借预测中有较好的表现,可以通过该模型获取到推荐优先采购的书目。此外,本文中设想的模型应用场景是处理多样化的读者推荐采购书目,但模型通过改进或许也可以应用于图书批量采购。由于应用于图书批量采购时,对模型的精准度要求更高,因此未来的研究

中,可以通过引入主题词、标题、摘要等书目信息中语义相关的特征值,来优化模型获取更加准确的预测结果。

同时,从采购决策上来说,对许多专业图书馆、社区图书馆来说,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提高采购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率,可以显著优化馆藏建设。从这一点考虑,遗传神经网络模型由于具有提高模型运行效率、优化准确率的特点,通过这一方法来构建新的采购决策模型或者优化原有采购模型,都是有价值的改进尝试。但同时,对大型公共图书馆和大型专业馆来说,“应采尽采”或“饱和采购”是其应尽的义务,这类模型的使用或许收效有限,但依然可以依据预测结果来决定采购顺序,提升服务效率。

## 参考文献:

- [1] 彭彦.图书采购决策支持系统应用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3.
- [2] 刘驰.灰色神经网络模型在图书采购复本量预测的应用[J].科技创新导报,2013(19):200-201.
- [3] 周志强.基于混合智能算法的高校图书馆图书采购模型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9.
- [4] 宋丹辉,李海燕.基于文献计量的国内图书采购研究热点及前沿分析[J].科技促进发展,2021,17(1):133-142.
- [5] 蔡迎春.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学科图书采购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0,54(21):36-39,104.
- [6] 尹婷婷.基于BP神经网络及层次分析法的供应商选择问题[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2(5):23-26.
- [7] 孙宝.基于回归控制的高校图书馆采购量建模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36(6):93-97,106.
- [8] 卞丽琴,陈峰.基于人工智能的图书订购策略分析[J].图书馆杂志,2015,34(8):39-43,56.
- [9] 黄小华,苗松,施化吉,等.基于改进遗传神经网络的图书采购模型研究[J].现代情报,2009,29(9):162-165.
- [10] 孙雷.LVQ神经网络在高校图书馆图书采购中的应用研究[J].现代情报,2011,31(10):166-168.
- [11] 尹纪军.基于改进遗传神经网络的图书采购系统研究[D].镇江:江苏大学,2007.
- [12] HU M.Decision-Making Model of Product Modeling Big Data Design Scheme Based on Neural Network Optimized by Genetic Algorithm[J].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Neuroscience,2021,2021:8.
- [13] 刘英娜,李琳琳,刘立士.遗传算法优化BP神经网络实现自相似流量预测[J].电子世界,2021(13):32-33.
- [14] 赵伟,张秀华.基于遗传神经网络的图书馆成效评估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36(12):94-98.
- [15] 任谢楠.基于遗传算法的BP神经网络的优化研究及MATLAB仿真[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4.
- [16] 丁建勤,庞飞菲.读者推荐采购,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以上海图书馆中文图书采访为例[C]//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第四届全国文献采访工作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48-52.
- [17] 符艺.公共图书馆读者决策采购应用研究与案例分析[J].四川图书馆学报,2021(2):29-32.

**作者简介:** 蔡丹丹,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馆员,研究方向为数据挖掘。

**收稿日期:** 2021-08-19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探索与创新 ·

## 基于 BERT 的《中图法》文本分类系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姜 鹏

(上海图书馆 上海 200031)

**摘 要:** 文章以BERT模型为例,在分析了BERT模型分类结果的基础上,总结了基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文本分类经验。从数据、系统、分类法等方面详细分析了目前影响分类系统的因素,并通过训练数据集清洗、引入知识图谱等措施来提高分类准确率。

**关键词:** 文本分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BERT

中图分类号: G254.1; TP18 文献标识码: A

### A Case Study of the BERT Model Based on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Abstract** Taking the BERT model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model and conclude the text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the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CLC).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influence factors of class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ata, systems and classification methods. What's more,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ims to make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more accurate through data cleaning and the knowledge map.

**Key words** text classification;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 from transformers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原称《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编制出版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综合性分类法,是当今我国图书馆使用最广泛的分类法体系,简称《中图法》<sup>[1]</sup>。长久以来,《全国报刊索引》基于《中图法》的文献分类工作主要依靠人工进行,但有限的人工标引目前已很难应对爆炸式增长的文献,迫切需要引入文本分类系统以增加文献标引量。

#### 1 文本分类调研

文本分类一直是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的一项基础工作,是指机器按照一定的分类规则或者标准自动对文本进行类别标记的过程,其目的是对文本资源进行整理和归类<sup>[2]</sup>。文本分类一般包括传统的分类方法和基于深度学习的分类方法。典型的文本分类算法包括支持向量、循环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等。

侯汉清等人以《中图法》为主干体系,分类号—关键词串对应表为知识库主题,构建了基于《中图法》的文本分类系统<sup>[3]</sup>;孙雄勇等人利用CNKI已人工标注的期刊数据,采用基于词典的方法,构建含有词条、分类号、权值等信息的特征短语词典,实现了基于中图法的自动分类模型<sup>[4]</sup>;郭利敏利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通过TensorFlow平台上的深度学习模型,构建了基于题名、关键词的自动分类模型,其一级准确率为75.39%,四级准确率为57.61%<sup>[5]</sup>。

2018年10月,GOOGLE公司发布了一种基于双向Transformer<sup>[6]</sup>编码器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BERT (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 from Transformers)<sup>[7]</sup>,并刷新了11项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精度,引起了广泛的重视<sup>[8]</sup>。Adhkari A等人首次将BERT用于文本分类,通过对BERT模型进行微调以获取分类结果,并证实BERT在文本分类中依然可以取得较好的结果<sup>[9]</sup>;SUN C等人在8个数据集上进

行BERT在文本分类的应用,并介绍了一些调参及改进的经验,进一步挖掘了BERT的潜力<sup>[10]</sup>;赵旻等人以34万篇中文医学文献摘要为预训练语料,通过构建BERT的中文基础模型(BERT-Base-Chinese)和BERT中文医学预训练模型(BERT-Re-Pretraining-Med-Chi),对R大类下16个类别的中文医学文献进行分类研究<sup>[11]</sup>;吕学强等人在BERT的基础上,提出了TLA-BERT模型,用于解决多标签文本分类问题<sup>[12]</sup>;罗鹏程等人通过构建基于BERT和ERINE的文献学科分类模型,实现文献的教育部一级学科自动分类<sup>[13]</sup>。

为了解基于《中图法》的文本分类系统实际应用情况,笔者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走访了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等数据库厂商,并调研了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尔思”)、云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孚科技”)等涉及文本分类方面业务的商业公司。调研结果如下:

(1)同方、万方都有专门从事基于《中图法》的文本分类人员,且都开发出相应的文本分类系统并投入使用。其中同方采用传统的分类方式,可以做到30%以上的分类结果不需要人工校对。

(2)拓尔思、云孚科技等商业公司虽然对《中图法》不熟悉,但具有类似文本分类系统开发经验,倾向采用深度学习方法。本次调研选取了《中图法》经济类(F类)约75万条数据分别委托进行测试,测试准确率(分类层级控制在四级以内)均能达到70%以上。

(3)本次还调研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得益于长期的数据、词表积累,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采用传统分类方法对医学类文献进行分类,中文标引系统的正确率约为80%,西文标引系统的正确率大约为78%。

## 2 基于 BERT 的文本分类结果及分析

《全国报刊索引》拥有专门从事文本分类工作的队伍,在2004年和南京农业大学侯汉清教授团队合作,研发出基于《中图法》的文本分类系统并投入使用,同时不断跟进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先后尝试贝叶斯、最近邻算法、Tensorflow、BERT等方法用于文本分类。本文采用BERT-Base(Chinese)为例,阐述目前所遇到的难点以及对应解决思路。

### 2.1 BERT 原理

BERT在双向transformers的基础上,通过预训练(Pre-training)和微调(Fine-tuning)两个过程来完成自然语言处理任务。其预训练阶段包括两个任务:随机掩码机制(Masked language model, MLM)和上下句预测(Next Sentence Prediction, NSP)。其中的MLM任务中,BERT会随机遮挡住15%的词语,用“[MASK]”代替,并通过不断的迭代来预测这部分词语,以此学习语义和句法信息。为了使模型更加稳定,在随机的15%的词语中,有80%的概率会用“[MASK]”替换,有10%的概率会替换为随机的单词,有10%的概率不做任何替换。NSP任务用以判定输入的两段语句是否连续,从语料库中随机选择50%的正确语句对和50%错误语句对进行训练,这一任务可以从任何的单语料库中生成。MLM与NSP任务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刻画语句甚至篇章层面的整体信息,为微调任务提供更好的初始参数值。

BERT模型的输入如图1所示,输入层通过词向量(Token Emmbdings)、段向量(Segment Embeddings)以及位置向量(Position Embeddings)三部分求和组成,且在每个句子首位加入“[CLS]”和“[SEP]”标志,其中[CLS]对应的输入向量可用于文本分类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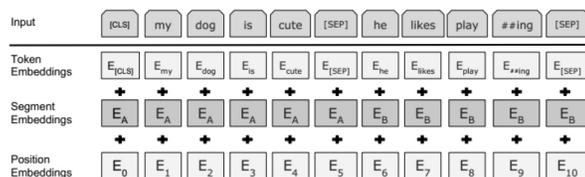


图 1 BERT 模型输入示意图<sup>[7]</sup>

### 2.2 基于 BERT 的中文文本分类

本文主要使用BERT-Base-Chinese进行基于《中图法》的中文文本分类。样本数据的选择方面,本文选取《全国报刊索引》篇名库所收录的2008—2019年发表并经人工标引的核心学术期刊数据,其中仅包含题名、关键词、摘要、来源、作者信息等索引信息,并没有全文。经《中图法》四、五版类号转换、错误分类号剔除等清洗工作后,训练数据总量400余万条(2008—2018年收录数据),测试数据近24万(2019年收录数据)。

分类深度方面,由于目前受限于人工标引效率、学者研究热点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各数据量分布不均匀。以《全国报刊索引》所收录的F类数据为例,涉及

分类号26 202个,数据量超过500条的类目仅有20个,84%的类目(21 980个)对应数据量不到10条。更甚者,2008年至今所收录的数据,F02(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及其下位类中,仅有8篇文献,且均集中在F023(封建社会)类。为保证训练数据量,本文将单类层级限定在《中图法》第四级。

为了验证BERT模型分类效果,本文首先在F类进行对比测试。将BERT与TEXT-CN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LSTM(long-short term memory)、百度飞桨等模型进行对比测试,除百度飞桨模型测试结果在10%至60%之间徘徊,不具有参考性,未将其列出外,其余结果如表1所示。通过对比结果可以看出,BERT模型分类测试结果要优于TEXT-CNN等模型,可进一步进行全类测试。

表1 文本分类算法结果比较

模型算法	四级准确率 /%
TEXT-CNN	67
CRM	64
IndRnn	70
BERT	79
Bayes	60
LSTM	73

在进行全类标引测试前,首先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对《中图法》基本大类进行微调。《中图法》共5个基本部类,22个基本大类,目前总类目5万余个<sup>[14]</sup>。本文将D9(法律)以及T(工业技术)大类下二级类目,如TB(一般工业技术)、TD(矿业工程)等均作为一级类目处理,并去除Z大类,调整后共有38个基本大类。

具体分类思路,首先实现38个一级类目的自动分类,然后进行四级类目自动分类。输入结果方面,根据之前测试结果发现,虽然输出多个分类号(一般是前三个)时,系统准确率较高,但在实际工作中,标引人员仅给出最接近文献内容的一个分类号,为了更贴切工作需要,本文仅输出阈值最高的分类号。性能指标的选取方面,需要的是系统较高的准确率,以减轻人工工作量,经综合考虑,本文仅采用了准确率这一指标。模型主要参数设定为批训练大小(train\_batch\_size)为32;批预测大小(predict\_batch\_size)为32;学习率(learning\_rate)为3e-5。一级类目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准确率最高为97.41%,最低为52.05%。社科一级类目(A—K)平均分类准确率为88.65%,且

大部分类目准确率在90%以上;而科技类目(N—X)平均分类准确率在78.12%左右,略低于社科类目。四级类目测试中,本文选取了一级类目准确率较高的四个类目:F(经济)类、J(艺术)类、R(医药、卫生)类以及TG(金属学与金属工艺)进行后续测试,测试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各一级类目分类准确率

一级类目	准确率 /%	一级类目	准确率 /%
A	90.00	TD	92.56
B	86.47	TE	84.14
C	65.74	TF	80.38
D	89.55	TG	91.78
D9	93.97	TH	71.32
E	90.76	TJ	81.80
F	94.34	TB	73.51
G	93.59	TK	76.34
H	93.18	TL	83.57
I	93.76	TM	88.86
J	93.38	TN	78.99
K	79.11	TP	83.65
N	52.05	TQ	71.03
O	76.93	TS	88.61
P	89.27	TU	86.99
Q	72.05	TV	68.52
R	97.41	U	83.75
S	90.80	V	82.68
TB	73.51	X	84.14

表3 F、J、R、TG 类目测试结果

测试类目	四级类目测试准确率 /%
F	74.33
J	69.07
R	68.04
TG	57.95

### 2.3 测试结果及难点分析

通过测试发现,一级类目准确率较高的类目主要集中在专指度较高,与其余类目交叉内容较少的类目。后经标引人员分析,此部分类目相对O(数理科学和化学)、P(天文学、地球科学)等类目而言,对标引人员专业知识背景要求相对较低。C(社会科学总论)和N(自然科学总论)在没有通览全文的情况下,很难准确入类,这点也可在表1中反映出来,实际工作中,这两类数据全部需要进行人工复验。I大类(文学)虽

然主要以文学作品体裁作为主要立类依据,系统难以判定,但由于《全国报刊索引》所收录的学术文献主要属于相关文学评论,内容相对集中,系统分类准确率较高。

四级类目测试方面,通过阈值筛选可有效地将一部分标引结果设置为免检,无需再次人工标引。目前免检率最高为F类,在阈值大于0.9999的情况下,分类准确率可达到92.77%,所涉及数据占测试数据总量的38%。具体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F大类测试结果分析

阈值区间	对应数据量	分类正确数据量	占比 /%
0.1—0.2	6	0	0.00
0.2—0.3	25	8	32.00
0.3—0.4	41	13	31.71
0.4—0.5	79	23	29.11
0.5—0.6	150	59	39.33
0.6—0.7	167	64	38.32
0.7—0.8	207	82	39.61
0.8—0.9	269	120	44.61
0.9—0.99	795	398	50.06
0.99—0.9999	2 581	1 964	76.09
0.9999—1	2 711	2 515	92.77

中文文本分类,一般包括预训练、待分类预处理、特征提取、分类等步骤<sup>[15]</sup>。影响文本分类的因素有训练数据集质量、数据分布、输入文本质量等<sup>[16]</sup>。为提高分类准确率,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分析BERT环境下影响分类质量的因素,调整测试方案,并提出解决对策。

#### 2.4 《中图法》对分类准确率的影响

《中图法》本身是一个详尽且有巨大容纳力的类目系统,其基本类目高达四万多个。同时《中图法》广泛采用了类目复分、仿分、组配等方法增强文献的分类能力,这就造成了类号数量的不可控制性。同时这也导致同一大类不同下位类间、相近主题间区分度小,给机器分类带来极大困难。

《中图法》对类目进一步进行划分时,如涉及总分标准时,通常把类目划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性或理论性类目,第二部分是专论性或具体性类目,遵循能入具体问题、事物的类目,不入总论性或理论性类目的原则。此外,社科一级类目(A—K)划分时,国家和时代成为这部分类目下重要分类标准,

以D大类(政治、法律)为例,下设D5(世界政治)、D6(中国政治)、D73/77(各国政治),D6下又设D67(地方政治)。系统在区分总论或专论以及“世界”“中国”“各国”及“地方”时很容易判断错误。以“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国外征管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为例,其侧重点在于对我国的启示,应放入F812中国财政,而系统将其划入F811世界财政。

部分类目类名相同或接近,系统难以从数据中获取区分因素。如H2(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下设“朝鲜语”(H219),而H5(阿尔泰语系)下同样含有下位类“朝鲜语”(H55),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使用手册》(以下简称《使用手册》)中的说明“外国出版的与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相同的语文著作入各语系的具体语言、文字”<sup>[17]</sup>,这给机器的理解带来很大困难。另外,如J51(图案设计)下设J516(各种图案设计)、J519(其他)类目,如何准确区分这三个类目之间,尤其是“各种”和“其他”的区别,对系统而言是个考验。

类目更新缓慢,《中图法》第五版2010年9月第一次出版,截止到2021年,共发布过9次修订信息,最近一次修订为2019年8月正式发布<sup>[18]</sup>,修订速度落后于技术或时代的发展。同时还存在《中图法》与《使用手册》描述不一致的情况,如“国际商务英语”《中图法》建议入“F7-43”,而《使用手册》建议入“F74-43”。

#### 2.5 提高分类准确率对策

(1) 提高训练数据质量。文献分类是一项相对主观的工作,对标引人员有较高的要求,且并没有严格的标准答案。标引人员知识背景的不同、对文章内容理解的差异、对分类规则应用角度的不同,均可能造成分类结果的不同。对测试结果进行人工抽样分析发现,由于主观性因素导致的模型分类准确率误差在 $\pm 1\%$ — $4\%$ 之间。为进一步测试数据质量对分类结果的影响,本文在F类训练数据中混入部分低质量数据,这部分数据主要为仅含题名数据以及分类结果错误数据,占训练数据总量的15%。测试结果对比显示分类准确率下降约3%。

为提高训练数据质量,将导入模型的F类训练数据进行自动分类,后将机标阈值在0.5以下的数据从训练数据库中清除,重复4遍后,将清洗后的数据对模型重新进行训练,测试结果平均准确率提升至81.2%,提升幅度为2.76%。后续拟采用训练数据清洗

与交叉验证并行的方法来提高训练数据质量。

(2) 平衡数据分布。由于研究热点等客观因素, 各类目间数据量差异较大。为测试数据量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本文在F大类上进行两组试验: 一是在训练集中删除数据量在8 000以上的类目, 并在测试集中删除对应类目, 测试结果显示剩余类目分类准确率基本没有变化。二是在训练集中删除数据量在500以下的类目, 并在测试集中删除对应类目, 测试结果显示剩余类目分类准确率基本没有变化。

《中图法》为了保证实用性, 根据文献分类的需要, 采用多种方法对类目进行划分。最典型的在于法律类目采用双标列类(D9以及DF类), 同时规定“各馆可根据各自的性质、特点, 选择使用”。此外, 交替类目、专类复分表、类目仿分设置、冒号组配法是否使用等, 各馆所或数据提供商使用标准并不统一, 这也导致不同来源的数据需要花费大量人工进行处理后才可以使⽤。在标引人员有限的情况下, 本文无法通过引入外部数据的方式来测试小样本数据量的提升对分类准确率的影响, 后续拟采用基于马氏距离的适应性过采样方法增加小样本数据量<sup>[19]</sup>, 以期待获取更好的分类结果。

(3) 提高输入文本质量。影响标引结果的重要一方面为文中关键信息理解不当,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一些专指度较高的词语、国名、缩略词, 如“一带一路”“土耳其”等, 系统无法识别。针对此情况, 本文将汉语主题词表中相关术语词添加到自定义词典中, 并在F大类中进行测试, 测试结果并无明显的提升。二是主要因素理解错误, 以“民用航空器客舱物体表面消毒效果评价”一文为例, 其描述重在“消毒”, 应分到R187(消毒), 而非系统理解的R851(航空航天卫生学)。针对此种情况, 本文拟参考N Poerner等人思路<sup>[20]</sup>引入知识图谱作为辅助信息, 以增强文献主题权重。目前这项工作仅在R54(心脏、血管疾病)类中进行测试, 准确率提升较为明显, 但其通用性需进一步验证。

针对多主题文献, 《中图法》将其划分为并列关系、从属关系、应用关系等, 并说明了对应分类规则。但对错误数据分析发现系统对重点内容以及规则的

判定结果不理想, 如“美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服务贸易”和“中国经济”是“A对B的影响”, 按规则“一个主题对另一个或多个主题影响另一主题的文献, 分入受影响主题所属类目”, 应入F12(中国经济), 而不是机器分类的F752(中国对外贸易)。人工分析原因可能是文本预处理时将关系指示词, 如“对”等作为停用词删除。为验证BERT环境下分词是否对分类结果有影响, 本文以F类进行了对比实验, 发现未进行预处理的情况下, 模型分类准确率下降约1%。本次测试中, 字长选取128, 为测试输入内容对分类结果的影响, 将字长分别调整为256和512, 重新进行测试, 测试结果略有提升, 幅度不足0.3%。

(4) 充分利用作者分类信息。《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数据中可直接用于辅助标引信息的主要有期刊分类号以及作者分类号, 这两类数据可以为自动标引提供一定的助力。仍以2019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数据为例, 95%的文献集中在一个大类的期刊有431种; 有作者分类号的文献有200 939篇, 其中分类号一级类目正确的有109 235篇, 占比为54.36%; 扩展到刊的层面, 在涉及到的4 000多种刊中, 作者分类号正确率在95%以上的, 有92种。由于目前尚未找出如何适当使用作者分类号的方法, 本文仅使用期刊分类号用于辅助一级类目分类结果。测试结果显示, 使用期刊分类号后一级类目准确率能提高0.86%。

### 3 结语

本实验是为了在现有技术水平下, 尽可能地增加标引数据量。《全国报刊索引》编辑部根据实际情况, 已在会议论文分类工作中投入使用基于BERT的文本分类系统, 用以标引R类会议文献。一方面为了解决人力问题, 增加标引量; 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验证系统的准确率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以便于进一步改进。后续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梳理人工分类经验, 及时统一内部分类规则, 尽量保证同一主题文献分到同一类目下, 为文本分类提供高质量训练数据; 二是尝试将人工分类经验引入到分类模型中, 为文本分类提供一定助力。

#### 参考文献:

[1]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会.《中图法》用户服务[EB/OL].[2021-07-08].<http://clc.nlc.cn/>.

- [2] 汪焱,刘柏嵩.文本分类研究综述[J].数据通信,2019(3):37-47.
- [3] 侯汉清,薛春香.用于中文信息自动分类的《中图法》知识库的构建[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5(5):82-86.
- [4] 孙雄勇,罗霄.中图分类法体系下的自动分类研究[C]//中国中文信息学会信息检索与内容安全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全国信息检索与内容安全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北京:中国中文信息学会信息检索与内容安全专业委员会,2008:6.
- [5] 郭利敏.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文献自动分类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7(6):96-103.
- [6] VASWANI A, SHAZEER N, PARMAR N, et al.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Proceedings of the 2017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C]. Stroudsburg: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17:5998-6008.
- [7] DEVLIN J, CHANG M W, LEE K, et al. BERT: Pre-training of Deep Bidirectional Transformers for Language Understanding//Proceedings of the 2019 Conference of the North American Chap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Human Language Technologies[C]. Stroudsburg: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19:4171-4186.
- [8] HAO Y, DONG L, WEI F, et al. Visualiz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BERT//Proceedings of the 2019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the 9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EMNLP-IJCNLP)[C].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19:4143-4152.
- [9] ADHIKARI A, RAM A, TANG R, et al. DocBert: Bert for document classification[EB/OL].[2021-07-08].<http://arxiv.org/pdf/1904.08398.pdf>.
- [10] SUN C, QIU X, XU Y, et al. How to fine-tune bert for text classification?//Proceedings of the 2019 conference on China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C]. Cham: Springer, 2019:194-206.
- [11] 赵旻,张智雄,刘欢,等.基于BERT模型的中文医学文献分类研究[J].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2020,4(8):41-49.
- [12] 吕学强,彭彬,张乐,等.融合BERT与标签语义注意力的文本多标签分类方法[J/OL].计算机应用:1-8[2021-07-0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307.TP.20210519.1524.006.html>.
- [13] 罗鹏程,王一博,王继民.基于深度预训练语言模型的文献学科自动分类研究[J].情报学报,2020,39(10):1046-1059.
- [14] 刘慧.中图法版本体系刍议[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5,35(8):77-79.
- [15] 徐威,董渊,白若鹂,等.针对中文文本自动分类算法的评估体系[J].计算机科学,2007(8):177-179.
- [16] 何琳,刘竞,侯汉清.基于《中图法》的多层自动分类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35(6):49-55.
- [17]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委会.《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使用手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2012:67.
- [18]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会.修订快讯[EB/OL].[2021-07-08].<http://clc.nlc.cn/kuaixun.do>.
- [19] POERNER N, WALTINGER U, SCHÜTZE H. E-BERT: Efficient-Yet-Effective Entity Embeddings for BERT//Fin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EMNLP 2020[C]. Punta Cana: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20:803-818.
- [20] YANG X B, KUANG Q M, ZHANG W S, et al. AMDO: an Over-Sampling Technique for Multi-Class Imbalanced Problems[J]. 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2018, 30(9):1672-1685.

作者简介: 姜鹏, 硕士, 上海图书馆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文本分类、关联数据、知识组织等。

收稿日期: 2021-11-05

本文责编: 孙晓清

· 探索与创新 ·

## 学术类微信公众号运营与服务特征解析及启示\*

牛晓菲 白雪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875)

**摘要:**微信公众平台已成为学术信息服务的重要载体,但学术类微信公众号发展水平良莠不齐。文章选取12个优质学术类微信公众号,基于运营认证方与定位、团队与合作、运营矩阵、发布习惯、服务功能、原创与传播力维度等统计数据,多维度解析其运营与服务特征,并为同类微信公众号的发展提供启示:运营体系化建设是基础保障、智能化个性化知识服务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学术类微信公众号;运营;信息服务

**中图分类号:** G252.8 **文献标识码:** A

### Analysis and Inspiration of the Operation and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Abstract** The WeChat public platfor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services, but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is patchy. The study selects 12 outstanding academic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and analyzes the operation and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Chat account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based on statistical data including certification and orientation, talent teams and operation, operation matrix, release patterns, functions of services, originality and transmission. The study aims to inspire simila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by making it clear that the systematic building of operation underpi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counts, and intelligent and targeted knowledge services represent the defining trend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academic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operation; information service

#### 1 引言

自腾讯公司2012年推出微信公众平台以来,微信已成为各领域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也是学术信息服务重要载体。高校图书馆、学术期刊、研发机构与数字媒体公司构成了学术科研微信公众平台的运营服务主体<sup>[1]</sup>。先行研究中,对高校图书馆、学术期刊两类微信公众号关注较多,如诸多高校图书馆利用微信平台提升了查询借阅等基础服务能力<sup>[2]</sup>,拓展了阅读

推广、信息素养等服务路径<sup>[3-4]</sup>,搭建了自我营销渠道<sup>[5-6]</sup>,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up>[7]</sup>,但同时存在原创内容少、功能性服务欠缺、营销能力不足、影响力较小等运营问题<sup>[8-11]</sup>;微信公众平台有助于学术期刊加快稿件查询、缩短出版周期、增强互动性<sup>[12]</sup>,利于成果传播、期刊影响力提升<sup>[13]</sup>,但运营管理粗放、定位不清、运营经验缺乏等问题并存<sup>[14-15]</sup>。针对科研机构或数媒公司运营的微信公众号,有研究对“壹学者”从平台构建、运营维度进行了个案分析<sup>[16-18]</sup>,王丹、杨颖等人则考察了募格学术等微信公

\* 本文系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2019年前瞻性研究项目“新信息环境下CASHL资源与服务拓展设计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众号运营情况<sup>[1,19]</sup>,并阐述了此类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运营方面的特点优势。可见,新媒体信息服务市场中的优质学术类微信公众号也逐渐受到关注,值得进一步探索。

本研究选取部分优质学术类微信公众号,基于运营认证方与定位、团队与合作、矩阵、发布习惯、服务功能、原创与传播力维度的数据,解析其运营与服务特征,进而为学术类微信公众号运营发展提供借鉴。

## 2 研究设计

“科研圈”基于读者投票、专家评分、学术传播影响力评估三个维度,推选出学术媒体公众号入围榜单<sup>[20]</sup>。研究基于该榜单,并以清博大数据官网微信传播力指数(We-chat Communication Index,简称WCI)为参照,选取每个学科领域WCI最高的微信公众号作为研究对象,如表1所示。

表1 学术类微信公众号基本信息

学科类型	微信名称	WCI	认证方
人文社科类	壹学者	788	人大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类	量子位	969	北京极客伙伴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综合类	iNature	882	暂未认证信息
化学、材料与能源类	纳米人	790	厦门路漫科技有限公司
地球科学类	桔灯勘探	777	北京桔灯地球物理勘探股份有限公司
医学类	奇点网	689	北京奇点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类	神经现实	668	暂未认证信息
药学类	药明康德	664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数理天文类	星空天文	644	暂未认证信息
植物学类	植物科学最前沿	599	暂未认证信息
环境生态类	环境人 Environmentor	591	暂未认证信息
生物信息学类	生信技能树	575	暂未认证信息

## 3 学术类微信公众号运营特征解析

完善的运营机制关乎微信号可持续发展性。研究从运营认证方与定位、团队与对外合作、运营矩阵、运营习惯四个维度,分析学术微信公众号运营方

面的特征。

### 3.1 运营认证方与定位

#### 3.1.1 运营认证方

关于学术类微信公众号运营管理方,如表1所示,研究对象中至少6个为公司化运营,可见线上学术信息服务呈现商业化、产学研相结合的特点,意味着该类微信公众号在资金投入、运营规范、团队管理上有明显优势。

#### 3.1.2 运营定位

运营定位是微信公众号发展的牵引方向,平台功能介绍体现微信公众号服务定位标准,微信公众号应依据自身优势,做好精准化定位,为用户群体提供专业化内容服务<sup>[21-22]</sup>。研究对微信公众号“功能介绍”进行调研,并结合其服务内容所涉领域广度,将定位类型相对分为大颗粒度、中颗粒度、小颗粒度,进而考量实际服务内容与定位的匹配度,各类型例举如表2所示。

表2 学术类微信公众号定位类型与内容匹配度

微信号	定位	学科领域	定位类型	内容匹配度
壹学者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移动官方阅读平台“口袋里的学术圈”	人文社科	大颗粒度	高
iNature	专注前沿科学动态,传递科普信息	生命科学	中颗粒度	较高
生信技能树	生物信息学学习资料分析,常见数据格式及公共数据库资料分享;分析软件及流程,基因检测及癌症相关动态	生物信息学	小颗粒度	高

壹学者定位着眼点是“人文社科学术资源”,涉及学科范围广泛,栏目内容按法律、经管等9个学科划分或检索,其“学者社区”栏目对应“口袋里的学术圈”功能,实际服务内容与定位匹配度高;iNature主要发布Nature、Science等国际顶级期刊中生命科学领域学术研究信息,对应其“前沿科学动态”,并设置了“科普”专栏,栏目内容与定位契合度较高;生信技能树的定位则是“生物信息学学研资料与研究工具”,并设置“学习资源大全”“在线工具”等栏目,服务内容细化、针对性强,与定位契合度高。总体上,研究对象定位类型多为中、小颗粒度,并注重与实际服务内容的匹配。

### 3.2 运营团队与对外合作

#### 3.2.1 运营团队

依据各微信公众号运营队伍介绍与招聘信息跟踪,研究将受调学术微信公众号分为专门运营、联合运营两种模式。专门运营模式代表有:药明康德组建专门内容团队且其30%成员拥有博士学位<sup>[23]</sup>;量子位、壹学者则招聘全职运营岗位,对学历、职业技能、经验有明确要求<sup>[24]</sup>。联合运营模式代表有:iNature由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哈佛大学等相关科研团队共同运营,并设有专门编辑部,招聘全职岗位<sup>[25]</sup>;神经现实运营团队由来自北京大学、剑桥大学等海内外大学或科研机构的150多名志愿者组成,团队学科背景与其“专注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精神病学”的定位高度匹配,且招聘岗位涉及主编、原创作者、插画师等多种岗位类型<sup>[26]</sup>。

### 3.2.2 对外合作

研究对象的对外合作主要体现在内容或定制推广上,其中7个微信公众号设有“投稿/合作”专栏(见表3),纳米人供稿来自哈佛、伯克利等高校研究人员,神经现实联合超星名师讲坛等制作“Mind+”线上直播课程,量子位则设商务合作专栏,开展内容、活动、社群等类型合作;星空天文等虽未设置合作专栏,但有专门内容投稿渠道。

### 3.3 运营矩阵

“媒体矩阵”是指由微信、APP等不同性质媒体组成聚合、多元、差异化的传播模式<sup>[27]</sup>。基于微信视角,可将运营矩阵分为微信内与微信外矩阵。研究对象均有各自矩阵,但建设力度、方向有所差异。

调研学术类微信公众号的微信内矩阵可知:药明康德运营“学术经纬”“e药物环球”等7个公众号,

构建学术研究、公众科普等差异化内容;壹学者开设“壹学者思政研究”公众号专门为高校思政教学研究提供服务;桔灯勘探则开发“桔子邦”等小程序,以满足不同场景应用。微信外矩阵如:bilibili弹幕视频网站(简称“B站”)上40.4%的用户年龄在24岁以下,约54.5%的用户是大学生,新冠疫情期间,B站流量数据表现突出<sup>[28-29]</sup>;纳米人于2020年6月在B站以“学研课堂”ID发布学术论坛视频,并将直播间嵌入至其官方微信;生信技能树、神经现实均入驻B站;星空天文等9个公众号在今日头条设置账户。

### 3.4 运营发布习惯

发布习惯与用户信息阅读规律相契合,对提升阅读量有所助益。多数受众习惯随机阅读微信公众号内容,为接近受众作息规律,碎片化时间段常被选为发布时间<sup>[30]</sup>。研究基于清博平台月数据(检索日期:2020年3月29日),调研学术微信公众号运营发布习惯(见表4)。

上述微信公众号日均发文量介于0.6—8条间,9个公众号日均更新1条及以上消息,其中iNature固定发文模式为每天一次性发送8条信息;多数公众号发布时间较固定,主要集中在7—9时、17—18时的上下班高峰,12—13时的午餐时段,21—23时的睡前时段,以契合用户碎片化时间,提升阅读率;量子位等11个公众号发文周一至周日全覆盖,壹学者则每周三发文。

### 3.5 运营特征

#### 3.5.1 运营趋向商业化、细分化

从研究对象认证方性质及数量来看,在新媒体、信息经济时代,学术信息服务早已突破图书情报机

表3 学术类微信公众号功能主题概况

微信名称	投稿/广告合作	学研资料与工具	付费知识服务	招聘	业界资讯	往期回溯	社群	专属小程序
壹学者	√	√	√		√	√	√	√
量子位	√	√	√		√	√	√	√
iNature		√		√	√	√	√	
纳米人	√	√		√	√	√	√	√
桔灯勘探	√		√				√	√
奇点网	√		√		√	√		√
神经现实	√	√	√	√				√
药明康德					√	√		√
星空天文			√			√		
植物科学最前沿	√					√	√	√
环境人 Environmentor		√			√	√		
生信技能树		√	√	√	√	√	√	

表4 学术微信公众号运营发布习惯

微信名称	日均发文量 / 条	24小时发布习惯	工作日/周末发布习惯
壹学者	0.6	19时	每周三
量子位	4.6	12时	周一至周日
iNature	8	9时	周一至周日
纳米人	5.6	9时	周一至周日
桔灯勘探	1.2	8/17/18时	周一至周日
奇点网	1.8	22时	周一至周日
神经现实	0.9	22时	周一至周日
药明康德	4.4	7时	周一至周日
星空天文	0.8	7时	周一至周日
植物科学最前沿	4.3	9/16时	周一至周日
环境人 Environmentor	1	较分散	周一至周日
生信技能树	2.1	8/9时	周一至周日

构、学术期刊等传统学术信息服务领域,不少研究者、学术团体或商业研发机构投入运营学术类公众号,使学术信息服务呈现商业化特点,进而助力运营的专业性、规范化;而研究对象定位则表明服务领域越发细分,便于挖掘深度个性化知识服务。

### 3.5.2 运营专业性与规范化

日常微信运营涉及选题策划、内容编辑发布、用户咨询、营销推广等多个方面,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研究对象的运营人员招聘要求明确、岗位多样化,规律发布习惯则突出其注重运营的专业性与规范化,这是微信公众号长期良性发展的基本保障。

### 3.5.3 注重合作与营销

合作可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进而可提升微信号服务水平与影响力。整体上,研究对象合作类型多样,既有内容合作又有推广合作,既包含国内合作又涉及国际合作,既有学术机构合作也不乏商业机构合作;多元化微信内外媒体矩阵式建设则体现其紧跟用户、服务用户的营销思维。拓展合作与营销是引流用户的重要方式。

## 4 学术类微信公众号服务特征解析

功能与内容是微信服务核心竞争力,是保持用户粘性的首要因素,目标用户群体知识层次越高,对信息质量的专业性要求越高<sup>[31]</sup>。研究从功能丰富度、内容原创力与传播力、功能与内容特色考察研究对象整

体服务特征。

### 4.1 功能丰富度

关于功能丰富度,研究侧重对固定栏目、社群以及专属小程序进行调研。社群是指学术微信公众号依据学科、研究身份等分层建立的用户群;专属小程序指该微信为实现服务拓展开发的小程序(借用第三方小程序不计),并按功能性质归类(见表3)。

横向看,上述微信公众号内容主题数量介于2至7类间,其中壹学者、量子位、纳米人、生信技能树涵盖6类及以上主题;纵向看,7个及以上微信公众号均涵盖的主题内容有:投稿/广告合作、研学资料与工具、付费知识服务、业界资讯、往期回顾、社群、专属小程序,可见上述功能主题服务在线上优质学术信息服务中较为普遍。

### 4.2 内容原创力与传播力

文章原创数量可一定程度反映微信公众号内容生产力,传播力可表征微信公众号内容影响、运营效果、用户黏度,基于清博2020第一季度传播数据,统计如表5所示。

研究对象均拥有原创声明权,可授权其他公众号转载原创文章;如表5所示,学术微信公众号间声明的原创数量与占比差距悬殊,纳米人对302条信息声明原创;星空天文原创占比最高,达85.7%;壹学者、植物科学最前沿该指标为0。

学术类微信公众号篇均阅读数在0.2W+至2.5W+人次间,其中壹学者、量子位等4个微信号篇均阅读数达1W人次以上;微信“在看”具备传播功能,壹学者、量子位、奇点网篇均在在看数达100以上,仅壹学者等4个微信号在看率高于1%,表明通过终端用户传播内容并非易事;各微信号头条位置优势明显,传播指标数据均有提升;4个学术类微信公众号10W+文章数为0,量子位等3个学术类微信公众号产出12—13篇,即重磅文章数量差距悬殊。

### 4.3 服务特征

基于学术类微信公众号的应用功能、原创与传播力,并结合其实际服务栏目,归纳分析其特点如下。

#### 4.3.1 多级多数量菜单架构设置

基于内容的多级多数量菜单架构设置,便于主题聚焦以及信息分类查找。量子位、神经现实等9个学术类微信公众号均设置3个一级菜单,二级、三级菜单数量突出,如神经现实设有“深读”“特刊”“演

表5 学术类微信公众号原创力与传播力概况

微信名称	声明原创数量	原创占比/%	篇均阅读数	篇均在看数	篇均在看率/%	头条平均阅读数	头条平均在看数	头条平均在看率/%	10W+文章数
壹学者	0	0.0	2W+	244	1.09	7W+	1 009	1.37	5
量子位	99	23.5	1.9W+	206	0.97	5W+	693	1.39	12
iNature	220	30.3	1W+	44	0.35	3W+	134	0.45	13
纳米人	302	59.6	0.5W+	13	0.25	1.2W+	35	0.29	0
桔灯勘探	4	3.7	0.7W+	37	0.50	0.9W+	42	0.46	0
奇点网	113	68.1	2.5W+	206	0.77	3.8W+	342	0.90	12
神经现实	50	64.1	0.5W+	66	1.10	0.8W+	88	1.10	0
药明康德	267	67.4	0.5W+	76	1.30	1.8W+	307	1.70	3
星空天文	66	85.7	0.6W+	65	1.10	0.7W+	73	1.05	0
植物科学最前沿	0	0.0	0.2W+	11	0.37	0.6W+	26	0.43	0
环境人 Environmentor	33	36.2	0.2W+	15	0.50	0.3W+	16	0.53	0
生信技能树	138	72.3	0.2W+	11	0.47	0.3W+	17	0.56	0

注：“W”表示“万”，下文同。

讲”等15个二级菜单，内容主题分类清晰，区分度高。

#### 4.3.2 内容切入点明确，打造增值服务，推行知识付费

《2020年中国知识付费行业运行发展及用户行为调研分析报告》<sup>[32]</sup>称中国在线学习以80后、90后为主，88.8%的用户购买过知识付费产品，可见消费者对优质内容的青睐。内容组织上，iNature重点围绕国际顶级期刊开展前沿论文导读、一作专访等内容服务；纳米人、神经现实分别聚焦纳米材料化学、脑科学的信息资源；生信技能树侧重“技能”的分享与培训。学术类微信公众号内容切入点明确、聚焦性强的特点有助于打造品牌特色与增值服务，至少7个学术类微信公众号推出付费知识服务。壹学者以年费会员制提供数据库资源、学术传播等服务；量子位“AI内参”施行付费会员制，提供精选论文推荐、社群陪伴式阅读等服务；奇点网推出付费在线课程。

#### 4.3.3 智能化功能性服务突出

在微信服务中，学术资源检索、智能提醒、预约等功能属于高魅力、高期望服务，即功能性服务对保持用户粘性发挥重要作用<sup>[30,33]</sup>。纳米人等10个微信公众号实现了号内信息搜索；壹学者可按学科类别查找信息，并联合第三方采用“选题宝”，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按学科领域提供智能化选题服务。微信小程序在举办活动、用户互动方面优势明显，8个学术类微信公众号开发专属小程序，如奇点网的“奇点好物”提供专业书籍售卖，神经现实的“神经漫游”提供话题讨论、专家演讲视频等服务。

#### 4.3.4 知识服务社群化，提供个性化深度服务

知识型微信社群指基于微信，以知识性内容为主题，具有专业化知识学习功能和用户交互的微信社群<sup>[34]</sup>。移动互联网产品分众化是必然趋势，而社群化是移动互联网时代重要的商业模式<sup>[16]</sup>。壹学者有70W+会员；iNature分别基于学科专业、用户身份组建10个学研社群、16个PI(Principle Investigator, 学术带头人)社群、64个博士社群，合计4W+社群用户；纳米人组建线上系列知识社群(见图1)，社群用户信息需求具有一定同质性，便于挖掘深度学科知识服务，同时可促进用户间信息共享。

纳米人学术QQ群系列				纳米人学术微信群系列	
总群3#	5132 34570	SERS群	5298 47278	导师群(仅限 教授)	综合交流社群
电池群2#	1162 12839	生物医药群	9906 6659	测试表征群	SERS群
电催化群2#	7615 90050	光催化群	5296 27268	电池群	生物医药群
纳米催化群	2563 63607	碳材料群	4854 29596	电催化群	光催化群
发光材料群	5296 27332	二维材料群	4859 81823	纳米催化群	碳材料群
超浸润群	4627 94235	多孔材料群	5296 27329	发光材料群	二维材料群
仿生材料群	1116 58060	能源聚合物群	2188 04511	超浸润群	多孔材料群
晶体团簇群	5307 22590	磁性材料群	1279 96112	晶体团簇群	磁性材料群
功能器件群	4749 48391	分析传感群	5307 27948	功能器件群	分析传感群
复合材料群	5191 81225	理论计算群	5307 21885	复合材料群	理论计算群
光伏技术群	7087 59169	DNA纳米技术群	7517 83496	光伏技术群	DNA纳米技术群
环保技术群	6991 66559	纳米毒理群	7523 42983	环保技术群	纳米毒理群

图1 纳米人线上知识社群

## 5 启示

### 5.1 运营体系化建设是学术类微信公众号发展的基础保障

研究对象运营特征表明运营涉及多个方面，是有机整体，需要稳定投入对运营进行体系化建设，以提

升工作效率,保障目标计划的实施,促进微信公众号良性发展。

首先,学术类微信公众号应根据自身依托的资源与实际情况,明确定位用户群体,根据用户性质、需求,制定运营战略目标;围绕目标推出不同阶段的运营计划,进而配备专业性运营团队,以保障计划实施落地;且实际运营中内部工作机制、规范也不可或缺。其次,若微信公众号运营在人财物投入受限的情况下,更需拓展对外合作,如目标用户与服务类似、体量相当的学术类微信公众号可共同投资、共担风险,整合运营资源,探索联盟式携手运营,聚拢用户;或委托数媒公司代为运营,以提升服务水平与市场竞争力。再者,信息碎片化时代,新媒体平台多样、信息丰富,用户具有分散性特点,学术类微信公众号运营也需引入营销理念,推动营销网络建设,以更大范围覆盖目标人群。而微信功能的深度开发有助于微信内服务营销,跨平台营销则需考虑平台特点与目标用户、服务内容的匹配度,而非盲目投放营销。反之,如只开通微信公众号,但缺乏运营体系化建设,则容易造成用户流失,滑落为形式化新媒体学术信息服务。

## 5.2 智能化个性化知识服务是学术类微信公众号发展的重要方向

互联网时代,信息检索与获取更加便捷,基础性学术信息资源不再稀缺,学术用户对高效优质的知识

服务更加期待。多个研究对象采用了“资源内容+工具/功能性服务+知识服务社群”的产品架构模式,即以资源内容聚合用户,以智能便捷的服务提升用户体验、培养用户忠诚度,进而依托知识服务,通过用户圈层化、社群化实现联结、沉淀用户。而走向智能化个性化知识服务需要多方面的投入。

对于学术类微信公众号发展知识服务而言,首先,梳理整合可及的各类资源是重要的基础工作。基于对资源的深度了解,才可进一步优化配置资源,开发有深度的知识服务内容。开发服务则必须结合目标用户需求,对资源进行知识化加工组织,并将服务产品化,以保障知识服务质量,吸引用户。其次,技术是推动知识服务智能化个性化的有力支撑。从服务实现维度,微信公众平台的服务架构设计与实现、用户管理与交互、小程序研发等均需技术支持;从运营与服务产品研发角度,基于技术的用户数据挖掘、用户精准画像,是知识服务走向智能化、个性化的基础,而精准的知识服务又是沉淀用户的关键。再者,管理机制是发展知识服务的重要保障。健全的管理机制对内可衍生工作机制、激励机制,盘活内部资源,对外可衍生合作机制、活用外部资源,从而利于集中多元优质资源,打造知识服务产品。反之,向学术用户单纯提供基础性内容服务,在学术信息服务市场中会逐渐丧失竞争力,不利于学术类微信公众号长远发展。

## 参考文献:

- [1] 王丹,宋梦梦,魏蕊.学术科研类微信公众平台信息服务模式案例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8(9):31-36.
- [2] 张长恒,黄芳.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构建高校图书馆APP的技术实现[J].图书情报工作,2015(4):37-43.
- [3] 邵玉河.高校图书馆在线信息素养教育调查与分析:以42家“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4):112-117.
- [4] 杨明秋,王艳秋.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吉林省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现状调研[J].图书馆学研究,2020(8):85-93.
- [5] 张吉,郭晶.高校图书馆微信标题精准营销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21(6):52-62.
- [6] 史梅,翟晓娟.高校图书馆官方微信经营策略研究:以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5):79-85.
- [7] 张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高校图书馆微信服务研究:基于42所“双一流”高校的调研[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9):58-66.
- [8] 李佳玉.中、美盟校图书馆基于微信与Facebook平台服务的比较研究[J].四川图书馆学报,2021(2):57-62.
- [9] 王志军.媒体融合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服务营销策略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12):103-108.
- [10] 黄国凡,张钰梅.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内容营销策略:基于微信传播指数WCI的分析[J].图书馆杂志,2015(9):91-96.
- [11] 杜辉,刘晓,袁百成.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创新[J].图书情报工作,2015(6):41-45.
- [12] 刘星星,崔金贵,盛杰,等.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平台运营中的优势转化及实践盲点[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6(2):207-211.

- [13] 张广萌,李世秋,葛建平.微信推广:让“枯燥”的学术期刊生动起来——以《航空学报》微信公众号为例[J].编辑学报,2016(5):482-484.
- [14] 周华清.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模式创新[J].科技与出版,2018(12):127-131.
- [15] 孔薇.编辑出版类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运营现状和优化路径[J].新媒体研究,2021,7(7):42-46.
- [16] 王卉,张文飞,唐沛.基于移动端的知识服务产品运营策略探讨:以人大数媒“壹学者”学术科研移动服务平台为例[J].出版发行研究,2015(11):44-47.
- [17] 曹丹.学术出版类移动应用产品传播运营策略分析:以“壹学者”为例[J].出版广角,2017(5):46-48.
- [18] 徐小敏.资源 工具 社交——从“壹学者”看学术期刊微信平台构建的三个维度[J].传媒,2016(18):30-32.
- [19] 杨颖,王文权.学术类微信公众号运营模式探究及对社科类出版社微信公众号运营的启示[J].科技与出版,2019(6):132-135.
- [20] 2019年度学术媒体公众号入围榜单[EB/OL].(2020-02-18)[2020-03-15].<https://www.linkresearcher.com/information/5880df21-f8b4-4324-846e-501d5b31b41f>.
- [21] 蒋亚宝,栗延文,吕建新,等.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传播力及运营策略研究[J].编辑学报,2020(3):257-261.
- [22] 田常清,宋宁宁.新媒体时代高校文科学报微信营销模式及改进对策研究[J].出版科学,2018(5):75-81.
- [23] 为什么我们非要在药上“做文章”? [EB/OL].(2019-12-05)[2020-04-12].[https://www.sohu.com/a/358536359\\_119097](https://www.sohu.com/a/358536359_119097).
- [24] 加入我们[EB/OL].(2020-04-12).<https://www.qbitai.com/%E5%8A%A0%E5%85%A5%E6%88%91%E4%BB%AC>.
- [25] 招贤纳士[EB/OL].(2020-04-12).[https://mp.weixin.qq.com/s/cycegYdY\\_ny2CytO2VsSCA](https://mp.weixin.qq.com/s/cycegYdY_ny2CytO2VsSCA).
- [26] 成员招募[EB/OL].(2020-04-12).<https://neu-reality.com/recruit/>.
- [27] 陈杏兰.“媒体矩阵”建设中的三个思维误区[J].传媒,2020(11):65-67.
- [28] 2019哔哩哔哩产品运营分析报告[EB/OL].(2019-05-20)[2020-05-05].<http://www.opp2.com/134016.html>.
- [29] 用户运营分析-哔哩哔哩[EB/OL].(2019-11-17)[2020-05-05].<https://www.iyunying.org/yunying/cppy/179061.html>.
- [30] 弓建华,刘林真,李书宁.受众行为分析视角的图书馆微信运营策略[J].图书馆论坛,2019(3):91-96.
- [31] 孔薇.科技期刊微信公众号信息传播效果和运营策略研究[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9(7):745-753.
- [32] 艾媒报告|2020年中国知识付费行业运行发展及用户行为调研分析报告[EB/OL].(2020-02-24)[2020-05-31].<https://www.iimedia.cn/c400/69029.html>.
- [33] 李梦楠,周秀会.基于Kano模型的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服务内容分类和供给优先序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9(10):39-47.
- [34] 杨昕雅.知识型微信社群用户参与动机对参与行为的影响[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67-74.

**作者简介:** 牛晓菲, 硕士,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信息服务; 白雪, 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

**收稿日期:** 2021-07-05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工作研究 ·

##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研究\*

黄红梅<sup>1</sup> 盛思远<sup>2</sup> 任广慧<sup>2</sup>

(1.大连外国语大学图书馆 辽宁大连 116044)

(2.大连外国语大学软件学院 辽宁大连 116044)

**摘要:**“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前沿分析、学科竞争力分析、学科发展趋势分析、学术贡献率分析等逐渐成为学科服务新热点,学科服务更加注重学科服务流程的绩效管理。通过绩效计划、绩效调控、绩效实施、绩效反馈和绩效评价五个环节可视化学科服务绩效管理路线:从用户需求角度设计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目标,详细分析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实践内容并进行管理质量控制。在学科服务绩效管理路线中查找实际绩效管理状态与期望绩效管理目标之间的差距,定位影响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基本要素,借助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协同功能,结合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流程构建综合性的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模式。

**关键词:**“双一流”;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管理流程;协同功能

中图分类号:G252

文献标识码:A

##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Subject Service in the Context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new hotspots of subject service including subject frontier analysis, subject competitiveness analysis, subject development trend analysis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 rate analysi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Subject service has prioritized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the subject service process. The subject servic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route is visualized by designing the goal of subject servic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user demand, analyzing the practice content of subject servic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detail, and carrying out the management quality control through the links of performance plan, performance regulation, performance implementation, performance feedback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 comprehensive subject servic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odel is constructed by identify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eal performance and the expecte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goal in the subject servic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route, and locating the bas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bject servic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with the help of the coordination function of the subject servic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Key words** “Double First-Class”; subject servic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anagement process; coordination function

\* 本文系2021年度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新文科背景下研究生信息素养教育优化研究”(项目编号:YJG2021-16);2020年度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移动阅读推广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20lsktyb-024);2019年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重点课题“新时代移动阅读推广模式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019G03)的研究成果之一。

## 1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绩效管理内涵界定

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通知中,明确要求“加强过程管理,实施动态监测,及时跟踪指导”,在此背景下,学科建设、人才建设和学科评估为学科服务营造了新的学科服务环境,学科前沿分析、学科发展综合报告、学科竞争力分析、学科发展趋势分析、学术贡献率分析、潜力学科分析等逐渐成为学科服务新热点<sup>[1]</sup>。与传统学科服务相比,“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内容不再局限于文献资源提供服务,而是更加注重学科服务的分析能力,更加彰显了学科服务的智力性和能动性。为了充分发挥学科服务的智力性和能动性,近年来学科服务实践越来越关注学科服务绩效,越来越多的文献围绕学科服务绩效评价开展研究<sup>[2]</sup>,但学科服务绩效评价仅仅在学科服务的末端促进学科服务的能动性,而“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需要在其整个服务中不断提升智力性和能动性,对整个学科服务流程实现绩效管理。

学科服务绩效管理从本质上说是在学科服务的全过程中以服务目标为指导,通过对学科服务的目标分解,制定绩效计划,调控服务过程,并在调控过程中,利用反馈机制不断优化服务效果,最后辅之以科学的绩效考核可视化学科服务质量,即通过对整个学科服务流程的绩效控制实现学科服务的动态管理。因此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总体来看是一个完整的管理过程,通过管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信息反馈和绩效提升,实现整个学科服务的前瞻性。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外化表现是学科服务能够在全新的环境下,将可得信息的管理和分析做到最佳,并且知道如何有效解读和充分运用这些信息。

## 2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流程分析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绩效管理内涵界定揭示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核心是实现学科服务任务、学科服务馆员与学科服务过程的交互协同,在三

者的循环交互圈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科服务的智力性和能动性,因而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流程从学科服务任务分析出发,包括绩效计划、绩效调控、绩效实施、绩效评价和绩效评价五个环节。这五个环节在管理过程中随着服务目标与服务效果之间的不断反馈与优化形成循环动态管理,实现多维交互,从而保证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有效性(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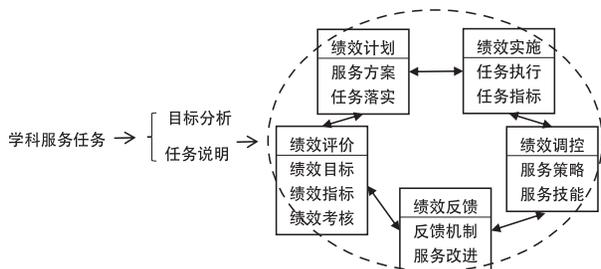


图1 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流程

### 2.1 绩效计划

绩效计划是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流程中的循环起点,在整个学科绩效管理流程中起着重要的衔接作用。绩效计划的制定需要在学科服务任务分解的基础上,明确绩效管理目标,因而绩效计划的制定是一个收集学科服务任务相关信息的系统性过程。通过服务任务分析明确服务目标,以服务目标为导向,确定与之相适应的服务内容、服务工具和服务方法,形成服务方案并落实任务分工。在服务方案形成的过程中,同时需要完成服务任务与馆员能力的匹配,即实现由工作任务到服务能力的无缝连接(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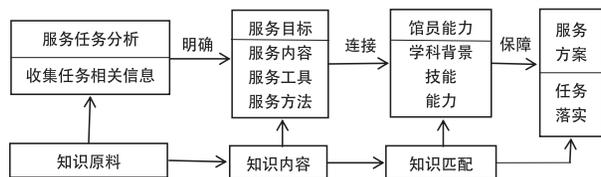


图2 绩效计划制定过程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绩效计划环节,在表层是学科服务任务与学科服务目标之间的匹配过程,而实质上是知识需求与学科馆员业务能力相连接的过程。在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在收集任务相关信息的基础上,以业务与知识关系为核心,首先明确学科服务需求内容、学科服务工具、学科服务方法,然后以此为切入点,寻找与之相适应的学科馆员背景知识、学科服务技能和能力、个性化特征,描绘出业务知识需求与学科馆员知识能力之间的相互关联,直观

地揭示业务知识需求与学科馆员知识能力之间的匹配关系,以此保障服务方案、任务落实的可靠性。

## 2.2 绩效实施

绩效实施的主要目的是细化任务落实,强化任务执行能力,绩效实施的细化手段通常采用任务指标的形式。任务指标的分解与细化既要根据学科服务任务的执行情况纵向分解任务目标,确定不同阶段的目标,还要根据学科服务目标横向分解各个子目标,确保学科服务任务责任明晰的同时又能促进学科服务任务落实过程中的协同合作<sup>[3]</sup>。因此学科服务绩效管理任务指标的设计思路和调查方法既要清晰,又要与绩效计划环节中收集到的信息相匹配,充分揭示学科服务任务目标,提炼实现目标的关键因素。关键因素的提炼要与服务能力相融合,充分揭示学科服务的专业知识、工作技能、专业经验和分析综合能力(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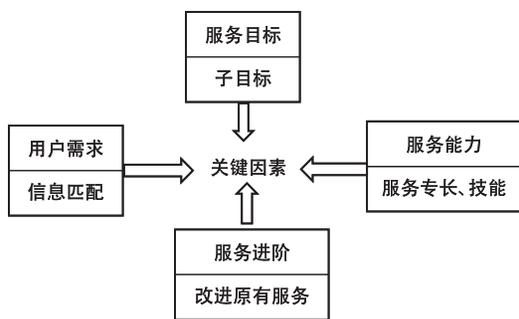


图3 关键因素提炼过程

在关键因素提炼过程中,用户需求分析的目的是明确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价值定位,即学科服务为用户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用户选择学科服务的原因及用户对学科服务的期望价值,以此确定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关键因素;子目标分解的目的是明确学科服务绩效管理到底需要实现哪些重要的服务任务指标,以及对这些子目标实施过程难度、工作量、条件支撑进行评估;服务能力和能力进阶则是根据用户需求和用户目标匹配与之相适应的学科馆员,并寻找出学科馆员服务专长与技能,解决用户无法解决的关键问题,并在关键问题解决过程中不断对原有的服务进行改进和提升,形成核心服务能力。

## 2.3 绩效调控

在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流程中,需要设置一个持续开放的沟通环节,以保证服务目标的明确性与一致性,即绩效调控。绩效调控强调的是沟通,而不是简单的任务管理,不仅强调结果,更加重视目标的实现

过程,强化服务目标达成共识。

为了保证达成目标共识,绩效调控首先需要围绕服务目标收集沟通资料、拟定沟通大纲,围绕沟通提纲共同分析服务目标实现的方法、步骤和阶段性目标的内容,并就已经开展的服务内容进行交流研讨,共同研讨服务方案的落实情况,持续改进服务方案<sup>[4]</sup>。研讨的方法可以采用协同研讨的方式,即在服务过程中随时交换信息想法,也可以采用迭代研讨的方法,即就同一个问题随着服务任务的推进和落实进行阶段性递进研讨。在研讨中不但要发现服务方案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服务策略,并提供服务技能培训支撑,还要对研讨中的意见进行总结,提供多途径输出,并及时进行贡献统计和回溯,即对发表的意见及采纳情况进行统计和回溯。

绩效调控的重点是围绕学科服务目标、服务方案内容、服务任务实施步骤及方法,通过研讨规范工作态度,提升工作能力、工作技能,就服务目标实现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进行讨论,以此提供服务方案的改进措施,调整学科服务阶段性目标,并通过贡献统计和回溯及时掌握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流程中学科馆员的工作表现和工作业绩。

绩效调控是提高学科馆员服务技能的重要环节,通过协同研讨、迭代研讨,不仅可以发现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流程中存在的问题,还可以了解、提升学科馆员的潜力,帮助学科馆员发现新知识或利用信息的新方法,使其适应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全新环境,并且帮助学科馆员将可得信息的管理做到最佳,知道如何最大化地应用可得信息实现学科服务任务。绩效调控既可以帮助学科馆员快速应对问题,协助学科馆员解决问题,又可以通过协同研讨或迭代研讨增加其技能学习机会,促进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期望目标的实现。

## 2.4 绩效反馈

绩效反馈是在学科服务绩效管理与用户之间建立沟通环节,确保用户可以及时接收到学科服务进展情况,对学科服务目标进行相关性、准确性判断,并提供建设性意见。在绩效反馈环节,双方沟通的首要原则是确保交流信息的易理解性,使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整个流程有效协同,将绩效管理的阶段性目标与学科服务目标结合起来,有效管控,以促进学科服务的不断改进。因而绩效反馈的核心任务是反馈机制的

建立和服务的不断改进。反馈机制的实施过程也是服务不断改进的过程,二者相辅相成。反馈机制的实施可采用多种方式同时进行:组建包括用户在内的学科服务绩效管理团队,强化团队反馈;在学科服务绩效管理过程中实现流程反馈;以服务结果为媒介,深化结果反馈(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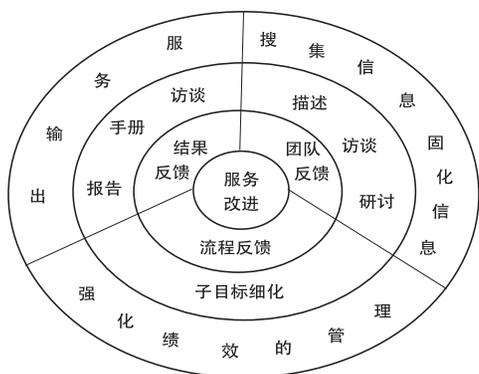


图4 反馈机制实施

## 2.5 绩效评价

绩效评价是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重要质量控制环节,规范了整个学科服务的绩效管理。在宏观上,绩效评价需要从绩效目标入手,通过绩效指标细化完成绩效考核,因此在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流程中要同时兼顾用户、绩效管理流程和服务改进。从多维角度细化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实现绩效考核的外因与内因平衡、结果与动因平衡、客观与主观平衡、长期与短期平衡。在微观上,学科服务绩效评价在本质上是对知识型团队的绩效评价,因为在整个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流程中,绩效管理的目标是不断提升学科服务的智力性和能动性,而实现学科服务智力性和能动性的核心要素是学科服务团队<sup>[5]</sup>。因此绩效评价指标既要有结果型指标、过程型指标,更要体现能动型指标,通过能动型指标的设定促进学科服务团队的知识专有性、知识互补性和知识创造性。绩效指标的设定在纵向上需要根据绩效目标和绩效管理流程的关键因素分出层次,同时还需要实现绩效考核的动态评价,使学科服务绩效管理评价不仅是对静态服务结果的评价,更要考虑动态服务流程的评价;在横向上既要反映整个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整体要求及长远发展,又需要反映学科服务绩效管理各个环节之间的关联,同时还要关注绩效管理赋能能力和服务持续改进。

## 3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绩效管理路线设计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绩效管理在本质上是对学科服务绩效实施流程规范管理,因而其管理路线具有可视化特征,可以依据其管理流程进行路线设计。学科服务绩效管理路线设计依据其管理流程,从学科服务目标分析和任务说明出发,首先需要明确用户需求,设计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目标;其次围绕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流程的五个环节,分析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实践内容;再次从绩效管理的内容出发进行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质量控制,并且从服务情景出发,宏观调控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各种要素,与实际的绩效管理状态进行结合,进一步规范学科服务绩效管理(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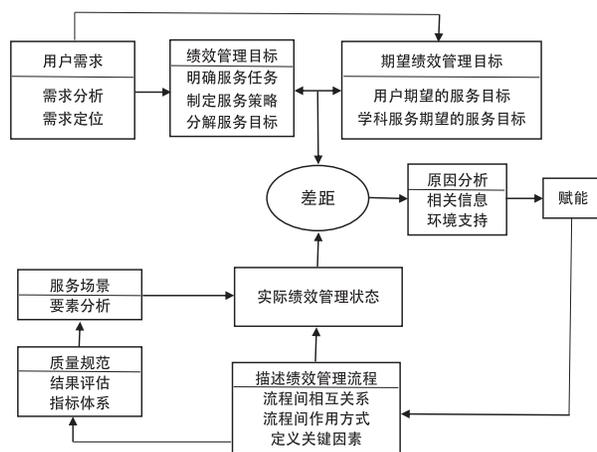


图5 学科服务绩效管理路线

### 3.1 从用户需求角度设计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目标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绩效管理需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明确用户需求,将用户需求作为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目标来源,制定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流程目标、行为目标和结果目标,并详细设定绩效目标的种类,形成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主线。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目标的设计通过将用户需求与绩效管理目标逐级分解,形成绩效管理流程中的各个子目标,建立目标链。在目标链中,子目标相互协调和统一,构成目标体系。目标体系以满足用户需求和实现学科服务绩效管理价值为导向,更加注重绩效管理结果,因而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目标设计过程以目标制定为起点,以价值实现为终点,将用户需求与学科服务绩效

管理目标相结合。在此过程中,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目标的设计需要基于学科服务绩效管理场景收集用户需求相关信息,包括用户需求背景分析、用户需求动因分析、用户需求现状分析和用户需求期望值分析,由此产生学科服务绩效管理实际状态的相关信息,包括绩效管理目的、任务、挑战和难度,并将其转化为服务技能和绩效指标,并通过绩效考核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验证(见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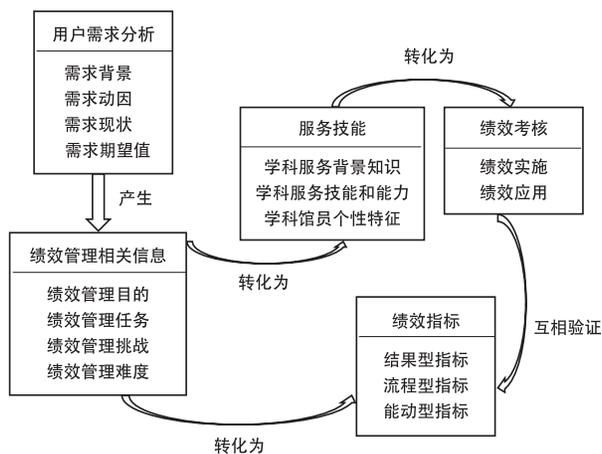


图6 用户需求与学科服务绩效管理之间相互验证

### 3.2 分析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实践内容

运用思维框架对绩效管理目标具体实践内容进行分析,基于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现有的服务内容、服务方法和服务工具,制定服务策略、分解服务目标、明确服务任务,对标用户期望的服务目标,寻找二者的差距,以此深入分析在用户期望服务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学科服务绩效管理应该采用哪些应当措施,为学科服务提供赋能支撑。“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赋能支撑需要在明确赋能范围的基础上,设计出实现服务目标所需要的服务方法,并提供服务方法实施所需要的技术支撑,为实现用户和学科服务所期望的绩效管理目标匹配相适应的服务能力,并以此为相关的学科馆员提供定向培训,完成赋能任务目标。同时,学科服务绩效管理实践内容的分析,还需要描述流程相互联系及其作用方式,定位绩效管理的实际状态,确定绩效管理差距。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流程相互联系及其作用方式的描述要抓住能反映绩效管理流程全貌的关键因素,并将所有的关键因素置于绩效管理流程价值链中考量,而不仅仅反映某个环节的情况,通过描述关键因素之间的协同关系,确定绩效管理流程的相互联系及其作用方式,通过有

效协调关键因素实现绩效管理流程的高效管理。

### 3.3 学科服务绩效管理质量控制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质量控制首先要遵循客观性原则,从用户、服务手段、服务内容角度进行质量规范,保证质量规范的全面客观。用户角度需要客观揭示用户需求,结合服务背景和分析工具定位用户需求;服务手段的运用要适合“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需要,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工具、方法;服务内容的提供既要保证内容本身科学性,也要保证内容提供方法的科学性,同时还要保证内容分析的客观性。其次要遵循及时性原则,嵌入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流程,增强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实时性。学科服务绩效管理规范的目的是分析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流程的质量,运用质量规范的分析方法查找学科服务绩效管理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实施改进。因而学科服务绩效管理需要建立符合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流程特征的绩效指标体系,对绩效管理结果进行有效评估。绩效指标体系的建立需要围绕学科服务管理流程,体现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整体要求,体现学科服务的能动性和智力性。同时,绩效指标的设计也要具有可衡量性,间接地显现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实时性和客观性,将结果评估与流程评估结合起来,在客观评价服务结果的同时全面分析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各个环节的服务职能与贡献率<sup>[6]</sup>,与用户期望的服务比较分析,通过服务情景和服务要素的进一步分析,客观评估实际绩效管理状态,找出绩效管理流程中存在的差距,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 4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模式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绩效管理强调学科服务流程的规范化管理,通过可视化学科服务绩效管理路线,明晰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基本影响要素,综合分析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基本影响要素,将“双一流”建设背景嵌入到用户需求分析、绩效管理协同功能中,构建综合性的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模式(见图7)。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模式中,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流程和路线要求学科服务绩效管理不但要强化学科服务绩效管理五个流程环节的规范,而且要充分体现其他要素的影响,提

升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能动性。因而,从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流程和管理路线出发,学科服务绩效管理需要定位影响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基本要素。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基本要素既有主观因素(服务需求),又有客观因素(知识、学科馆员、服务技术等),二者通过服务活动(场景)相互影响,作用于学科服务绩效管理五个环节。服务需求是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驱动要素,服务需求不仅包括用户提出的服务需求,还包括“双一流”建设环境揭示的学科服务需求。学科服务绩效管理要充分认识“双一流”建设环境揭示

的学科服务需求,将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综合起来,在学科服务流程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作用,不断提升学科服务绩效管理价值。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模式还需要通过不断缩小实际绩效管理状态与期望绩效管理目标之间的差距,通过差距的寻找将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内外部影响因素综合起来,实现服务协同、交互协同、知识协同和赋能协同。服务协同以服务场景为切入点,实现学科服务客观影响因素之间的协同,即学科服务背景知识、学科馆员个性化特征和学科服务技能与能力之间的协同;交互协同不但要保证绩效调控环节中的沟通协同,同时要保证绩效反馈环节中的沟通协同,实现绩效管理流程的交互功能<sup>[7]</sup>;知识协同需要基于用户需求、服务场景和学科馆员三者之间信息的综合考察,通过绩效管理的规范化控制实现三者之间的知识协同,以此保证用户期望服务目标与学科服务绩效服务目标之间的趋同性;赋能协同则是在服务协同、交互协同和知识协同的基础上,为弥补实际绩效管理状态和期望绩效管理目标之间的差距而提供的赋能支撑。借助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这些协同功能,促进学科服务绩效管理的规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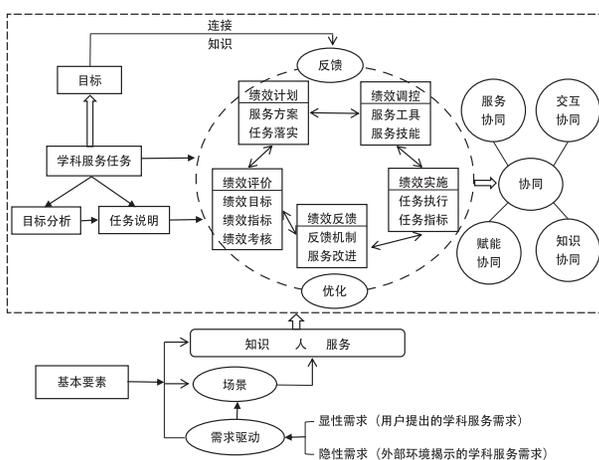


图7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服务绩效管理模式

## 参考文献:

- [1] 张海梅.“双一流”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探析[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1):97-101.
- [2] 魏佳.“双一流”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网络调查研究[J].图书馆杂志,2021,40(4):69-76.
- [3] 李文侠,崔光益,潘占峰.大数据环境下精准嵌入科研过程的学科服务案例分析[J].图书馆建设,2020(S1):173-176.
- [4] 栾庆玲,胡媛.“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转型发展研究[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1(3):77-80.
- [5] 罗秀娟,张志美.面向重点课题组的嵌入式学科服务实践研究:以南通大学专题研究室为例[J].图书馆,2014(3):139-140,143.
- [6] 黄红梅.学科服务知识管理方法与测评[J].图书馆论坛,2013,33(4):145-148.
- [7] 金小璞,徐芳.基于LibGuides的图书馆学科服务中的用户交互问题研究:以西交利物浦大学为例[J].情报资料工作,2014(2):57-62.

**作者简介:** 黄红梅,大连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学科服务、信息咨询、读者服务、阅读推广; 盛思远,大连外国语大学软件学院图书情报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 任广慧,大连外国语大学软件学院图书情报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21-10-13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智慧服务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流通馆员转型发展的实践路径

刘敏 王晓翎

(宿迁学院图书馆 江苏宿迁 223800)

**摘要:** 智慧服务是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的发展趋势和必然选择。流通馆员作为一线读者服务工作的实践主体,其智慧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智慧流通服务的质量和读者的服务满意度。高校图书馆流通馆员面临专业认可度低、职业形象“弱后”、自我价值难以实现等多重职业困境,寻求以智慧服务为导向的转型和发展是其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智慧服务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流通馆员转型发展的实践路径可以从五方面着手:以智慧化阅读推广工作为核心,兼职开展智慧参考咨询工作,承担大学生读者导读与教育培训,积极开展各类读者活动,主动参与智慧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 智慧服务; 高校图书馆; 流通馆员; 转型发展; 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G251.6; G258.6

文献标识码: A

## Path of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Circulation Librarian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Services

**Abstract** Smart service is a defining trend and an inevitable choice of reader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Circulation librarian is the practice subject of front-line reader service, whose smart service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intelligent circulation service and readers' service satisfaction. The circulation librarian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are faced with multiple professional dilemmas, such as low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weak and outdated professional images and difficulty in the realization of self-worth. Therefore, it is a must for them to seek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smart service to push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mart service, the practice path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librarian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can be approached from five aspects: take the promotion of intelligent reading as the core work, carry out part-time intelligent reference work, provide guidance and training for college student readers, actively carry out various reader activitie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rt libraries.

**Key words** smart service; university library; circulation librarian;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practice path

### 1 引言

在时代、行业、技术、需求等多重驱动力的推动下,图书馆的读者服务沿着文献信息服务→知识服务→智慧服务的发展路径演进,智慧服务已然成为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的趋势。图书馆的智慧服务本质上是基于图书馆员及其智慧的知识服务<sup>[1]</sup>,是馆员智慧的转化和应用。流通馆员作为一线读者服务工作的实践

主体,是图书馆智慧服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专业能力和智慧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智慧流通服务的质量和读者的服务满意度。增强流通馆员的业务能力和职业素养、流通馆员的专业化发展,是提升智慧服务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一线读者服务转型与升级的关键。流通服务队伍中的专业馆员(以下简称“专业流通馆员”)无论是学历层次、知识结构还是学习能力、读者服务能力都有别于一般流通馆员(辅助馆员),具有为读者提供深层次的、更具价值的服务潜

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专业流通馆员与大多数辅助馆员一样工作内容局限于传统借阅服务领域,为读者提供智慧服务仅停留在理念层面。在高校图书馆迈向智慧图书馆以及服务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专业流通馆员面临着服务角色转变、工作重心转移、专业知能更新升级、服务内容深化拓展等转型发展问题,寻求以智慧服务为导向的专业发展是走出目前流通馆员专业认可度低、职业形象“弱后”、自我价值难以实现等职业困境的必由之路。本文旨在探究高校图书馆专业流通馆员转型发展智慧服务的实践路径,以求能够为高校图书馆专业流通馆员的专业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 2 智慧服务驱动高校图书馆流通馆员角色转变

智慧服务环境下流通馆员的服务环境、服务方式、服务内容、服务重心相对传统图书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服务环境由以书为主体的物理图书馆转向“实体+虚拟”馆藏的智慧图书馆,服务方式由“坐等读者上门”的被动服务转向“深入用户环境”的主动服务,服务内容传统借阅服务转向多元化的知识服务和智慧服务,服务重心由文献信息服务转向专业性的知识服务。

总之,流通馆员需要尽快实现由传统“图书管理员”角色向智慧服务角色转变,努力成为集知识馆员、数据馆员、协同馆员、研究馆员等于一体的智慧馆员。①流通馆员应是知识型馆员。随着高校信息检索课程的普遍开设,大学生读者信息素养能力得以显著提升,以往依赖流通馆员的文献信息服务日渐式微,相反涉及知识与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和利用的知识服务需求与日俱增。流通馆员不应满足于做一名从事“借借还还”“整书上架”等“值守”工作的图书管理员,而应具备未来智慧图书馆所需的新知识、新技术(RFID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新设备(如自助借还设备、智能盘点设备、智能分拣传送系统等)的应用能力,成为一名具备快速吸收新知识、知识结构完备、能利用智能技术基于自身智慧为读者提供多重智慧服务的知识型馆员。②流通馆员应是数据型馆员。数据挖掘与用户行为分析是图书馆开展智慧读者服务的重要手段。智慧流通服务由于各种技术系统的应用会产生大量的信息和服务数据,

看似简单的数据背后往往隐含了读者的借阅规律、兴趣偏好、行为倾向和阅读需求。流通馆员应具备良好的数据意识和数据素养,掌握数据统计分析技术及相关工具软件,成为数据分析的行家里手,充分挖掘服务数据的潜在价值,为开展主动化、纵深化、个性化的读者服务提供精准“靶向”。③流通馆员应是协同型馆员。智慧图书馆是基于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型图书馆<sup>[2]</sup>,强调人技智慧协同,能够实现馆际互联、人人互联、人物相联和物物相联,服务项目涉及馆际协作、馆员协作、人机协作、馆读协作等多维合作,流通馆员必须具有协同合作的意识,通过优良的团队协作满足高校读者专业化、深层次的知识需求。④流通馆员应是研究型馆员。流通馆员要适应智慧服务环境下的读者服务工作,需要有意识地开展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有利于图书馆员的智力开发,促进图书馆员勤于思考,善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提高创新能力<sup>[9]</sup>。流通馆员需要与时俱进地研究与图书馆智慧服务体系相适应匹配的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的新模式、新内容、新方式,探索新时期读者服务的有效机制。

## 3 实践路径

教育部2015年12月31日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sup>[4]</sup>把图书馆馆员分为“专业馆员和辅助馆员”。馆员分类管理制度为专业流通馆员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法理依据,为专业流通馆员集中精力专注知识服务创造了可能。从知识结构和 Service 能力的角度来看,专业馆员应具备一定的学科专业背景和职业素养,比较全面地掌握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承担较高水平与层次的知识化、学科化服务<sup>[5]</sup>。专业流通馆员要真正发挥专业馆员的作用,实现目前多重职业困境的突破以及社会和自我价值认同。首先,应树立智慧读者服务的新理念,工作角色应从目前“劳动密集型”的流通阅览服务向“知识密集型”的智慧服务转变;其次,需要从立足一线读者服务、拓展服务范围、融入智慧图书馆建设等方面对自身的工作职能和服务内容作一些探索和思考,能够根据读者服务的新需求开展各类智慧服务项目,适应智慧化的服务和管理,力求在智慧图书馆建设和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笔者以为,高校图书馆专业流通

馆员转型发展与智慧服务的实践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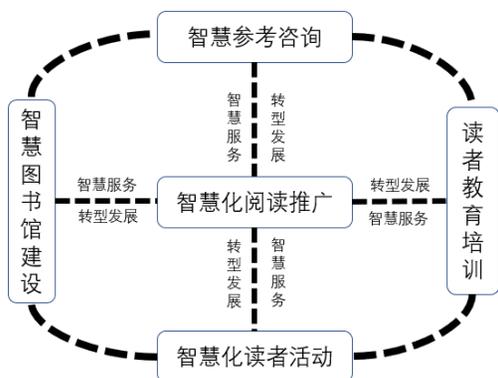


图1 高校图书馆专业流通馆员转型发展与智慧服务的实践路径

### 3.1 工作重心转移：以智慧化阅读推广工作为核心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图书馆专业服务可划分为三方面内容:文献服务、信息服务、阅读推广。阅读推广可以说是集文献服务和信息服务之大成,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和手段将文献服务和信息服务送到读者身边<sup>[6]</sup>。在社会倡导全民阅读的大环境背景下,阅读推广已经发展为一种自觉的、普遍的、不可或缺的图书馆服务<sup>[7]</sup>,高校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阅读文化氛围、大学生阅读素养都需要通过阅读推广工作来促进实现。智慧图书馆背景下高校阅读推广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为读者提供智慧化的阅读推广服务,是高校智慧图书馆建设的根本目标之一<sup>[8]</sup>。然而,由于高校图书馆馆员人力资源普遍匮乏,作为高校图书馆主流业务的阅读推广工作通常由馆员兼职开展。流通馆员作为与读者“零距离”接触的服务提供者,对读者的阅读心理、阅读需求和阅读状况最为了解,有利于从贴近读者的视角围绕馆藏文献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是承担阅读推广职能的绝佳人选。专业流通馆员应具备阅读推广的意识和能力,将阅读推广行为内化为一种服务自觉,将智慧化阅读推广作为知识服务工作的重心:

(1)在日常读者服务中做好最新图书推荐、专业图书推荐、专题阅读推广、新媒体阅读推广等阅读推广工作。①通过设置专门书架、宣传展板以及举办展览等传统阅读推广手段向读者推荐图书或相关书目。②利用各种新媒体技术平台(如图书馆网站、微信/短视频公众号、OPAC系统、移动图书馆APP等)及时将图书馆最新的文献资源信息推送给读者,做好馆藏揭示与文献宣传工作。③依托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活动

开展专题阅读推广,如在入学季、毕业季、建党一百周年等节点分别开展新生阅读推广、毕业生阅读推广活动、党史学习专题阅读推广活动。

(2)以阅读数据驱动精准化、智能化的阅读推广服务。读者阅读数据是其阅读需求的显性体现,流通馆员可以对读者的空间/资源访问、借阅历史、检索/荐购记录、活动参与等海量的服务数据进行精细化分析,借助图书管理系统和电子资源管理系统重点对流通数据开展深度挖掘,应用频数统计、聚类分析及自动推理等方法,将大量数据中隐含的信息挖掘出来,准确把握读者的阅读兴趣<sup>[9]</sup>,精准预测读者的阅读趋势和行为倾向,在此基础上利用计算机系统自动生成个性化的读者阅读报告,一方面帮助读者全面了解自身的阅读状况(如阅读数量、阅读频次、阅读兴趣/偏好、阅读广度、阅读活动参与);另一方面为读者推荐关联图书和资源做好智慧个性化推荐服务,从而实现以数据挖掘技术精准驱动的阅读推广服务。

(3)在读书节、读书月活动期间做好阅读需求调研、活动方案设计与数据管理工作。读书节、读书月活动是大学生阅读推广的常态手段,阅读需求调研、阅读推广方案设计、阅读推广效果评价是支撑活动开展的重点环节。智慧化的阅读推广应充分调研读者的阅读需求与活动建议,流通馆员可以利用与读者直接接触的便利条件向读者发放调查问卷以及进行深度访谈,也可以通过各种工具平台(如QQ、微信、微博、问卷星、图书馆APP等)投放问卷或在线交流详细了解读者对阅读推广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设计以读者需求为导向的阅读推广方案,从而克服传统阅读推广“自上而下”基于营销思维导致脱离读者真实需求的积弊。此外,读书节、读书月等大型阅读推广活动通常涉及“图书借阅排行榜”“最受学生喜爱的X本书”“读者之星”“优秀读者评选”“读者座谈会”活动效果评价等“必选动作”,相关的数据分析挖掘、数据管理工作必不可少。

### 3.2 从常规咨询到专业咨询：兼职开展智慧参考咨询服务

开展参考咨询工作能力与水平的高低,是衡量馆员读者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的重要标志<sup>[10]</sup>。由于高校读者的信息需求具有复杂化和个性化的特点,高校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工作既有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咨询、专业咨询,也有涉及信息检索等常规咨询和生活咨询服

务等一般参考咨询。学科咨询和专业咨询对馆员的专业学科背景有较高的要求,非专业馆员一般难以胜任。专业流通馆员可以把学科专业参考咨询和一般参考咨询结合起来,在做好指导读者使用图书馆各种资源与服务,为读者提供本馆资源导航,将馆藏资源目录进行组织与整理,满足读者个性阅读需求提供书目指导等一般参考咨询的同时,可以兼职开展学科参考咨询服务——利用自身所学专业借助专业学科背景和掌握的图书情报知识开展与自身专业对口的学科咨询工作,搜集、整理、编制学科专业资源指南,围绕专业相关的课题研究开展针对性的专题服务和参考咨询工作,通过提供综述、述评、专题研究报告、动态分析、社会预测等三次文献,为确定科研课题、技术攻关方案等提供决策依据<sup>[11]</sup>。通过把专业服务与传统的读者服务结合起来,不但能使读者更全面地获得图书馆服务,而且可以及时了解读者需求,更有利于提升学科服务的实际效果<sup>[12]</sup>。

### 3.3 教育与教学并举:承担大学生读者导读服务与教育培训

目前读者教育培训通常是由参考咨询部、信息技术部等所谓图书馆的核心业务部门来实施的。实际上,由与学生接触最密切、交流最频繁、最了解读者在利用图书馆资源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哪些问题的流通馆员来开展读者教育与阅读指导是最恰当的。

(1) 专业流通馆员可以承担起新媒体环境下的新生入馆教育工作。新时代大学生喜好利用手机、PAD等移动设备作为学习工具,喜好利用微信、微博、微视频等新媒体获取资讯和社交互动,因此充分借助新媒体技术创新新生入馆教育是提高入馆教育效果的关键之举<sup>[13]</sup>。流通馆员应充分利用新颖有趣的新媒体技术手段,将新生入馆教育的内容(图书馆概况和规章制度、馆藏结构与分布、图书分类及检索方法、图书借阅规则和流程、获取参考咨询的途径、移动图书馆的使用、智慧服务系统的应用等读者在利用图书馆方面密切关注的问题)制作成动画、短视频或微课,发布在图书馆网站、微信公众号、移动图书馆等“新生专栏”频道供新生以可视化的方式自主学习,在线自助式入馆教育“混合”线下传统入馆教育,使大学新生初步具备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的意识/能力。

(2) 在关注读者阅读习惯和阅读需求的基础上开展导读服务,可以围绕创新导读方式、编制资源服

务导航、提供个性化阅读指导等方面实施。①利用智能终端数字化学习是当代大学生读者的显著特征,开展大学生导读服务应充分考虑这一特点,创新导读的方式方法。如宁波大学图书馆创新性地以“微书阅读”的模式开展导读活动,以音视频、动画和文字相结合的“微书”呈现导读内容,用户可以直接查阅图书馆微书进行听、阅,也可以通过馆藏目录查询图书,在导读页中进行微书阅读<sup>[14]</sup>,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提高了导读效果。②通过编制资源/服务导航(如各类推荐书目、专业期刊导航、图书馆资源服务宣传片、VR图书馆导览系统等)积极引导读者利用图书馆的资源服务,如图书管理系统、OPAC系统、移动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图书馆自建的各类数据库以及图书馆收集整理的学科教学网站等数字资源,实现资源和服务的有效融合。③通过面对面的智慧沟通与交流深入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及其阅读需求,鼓励学生进行经典阅读、深度阅读,结合馆藏为其定制个性化的阅读指导方案和阅读资源。

(3) 开设面向专业领域的信息检索智慧课堂。为学校的教学与科研提供智慧服务是智慧馆员责无旁贷的任务,智慧馆员应与高校教师一起承担起智慧教学的重任<sup>[15]</sup>。信息检索课程是学生信息素养培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学科门类越来越精细化的趋势下,面向所有学生的通识教育性质的信息检索“知识课堂”无法满足学生的专业学习需求。信息检索智慧课堂应以有效促进学生智慧能力生成和专业信息素养培养为目标。专业流通馆员可以与专业教师一起开设与自身专业背景相同或相近专业的信息检索智慧课堂,协同开展教学设计,结合学生专业学习内容和信息需求,如教师布置的作业、课程论文、专业论文撰写、科研项目申请等讲授学科信息检索策略,重点教授图书馆订购的数据库资源和网络专业信息资源的检索方法与技巧,将信息素养教育与学生的专业教育有机融合。

### 3.4 角色转变:积极开展各类读者活动

读者活动是图书馆在为读者提供文献与信息借阅行为之外的服务补充与服务扩展<sup>[16]</sup>,是图书馆服务创新的重要媒介,对馆藏资源揭示、阅读氛围营造、读者服务深化、校园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图书馆读者活动可以分为专题活动(如读书征文、专题

书展、摄影展、知识竞赛等)和主题系列活动(如读书节/读书月系列活动、读书分享交流系列活动、系列讲座等)。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对流通馆员(主要是辅助馆员)存在只能从事事务性工作的刻板印象,以致流通馆员在各类读者活动中往往承担附属角色,创造性和潜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实际上,专业流通馆员“经过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或系统培训”,完全有能力胜任各类读者活动的开展,自身要主动由附属角色向主要角色转变——专业流通馆员既可以作为活动的领导者组织、策划大型读者活动,如各类竞赛、展览活动;也可以作为活动的实际参与者实施小型读者活动,如读书分享交流会、经典朗读、馆员荐书、阅读需求调研等。

### 3.5 跨越藩篱:主动参与智慧图书馆建设和发展

流通馆员应具有大局意识,将自己的工作置于整个图书馆的发展愿景之下。在做好流通岗位工作的同时,应紧密结合学校的学科专业建设以及图书馆的发展战略,跨越流通部门的藩篱,以“全科馆员”和“智囊支持”的角色形象主动介入图书馆的各项建设和智慧服务项目。

(1)以读者需求为导向的文献采访与资源建设工作。智慧图书馆以便利、高效地满足读者需求为核心目标,文献采访工作要切实把握读者的阅读需求,要求采访工作由“单向性”转向开放性、全面性<sup>[17]</sup>,由资源建设馆员转向全体馆员和用户。①流通馆员作为以读者和馆藏资源为直接工作对象的一线服务人员,非常清楚文献资源的馆藏及利用情况,能够在为读者服务的过程中获取到读者文献信息需求的第一手资料,将其有效传达反馈给图书采访部门,以此作为文献采购决策、馆藏资源调整、读者服务优化的参考依据。②流通馆员也可以作为图书馆采访推荐小组的成员直接参与图书采购和荐购工作,如参与采访部门组织的图书现采活动,挑选符合读者需求的图书,提高图书文献的采购质量<sup>[18]</sup>。③流通馆员也可以在流通服务中引导用户(读者)直接参与资源建设,如读者荐购、“你选书我买单”等读者决策采购活动。

(2)利用专业背景跨部门协同工作。专业信息服务是智慧服务的重要标志,可以充分发挥专业流通馆员的专业背景和优势特长,让他们同时在不同部门或不同岗位工作<sup>[19]</sup>,例如有教育学背景的流通馆员,可以让其同时参与教育类图书的采访工作、教育类研究

课题的情报咨询工作、教育类图书的专业阅读推广工作等。另外,专业流通馆员还可以深入院系、学科、课堂、课题等全方位的用户空间环境,充分发挥专业馆员的学科服务功能,了解师生读者教学、科研、学习等方面的学科信息需求,承担对口院系的图书馆业务联络、分馆或院系资料室的文献服务指导、教学参考资料的精准推荐以及专业精品课程共建、研究课题定向服务甚至以课题组成员形式合作开展研究等嵌入式服务工作。

(3)学生馆员培训工作。为了节约图书馆用工成本,缓解流通人力资源不足的压力,学生馆员成为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力量的有益补充,与辅助馆员一起承担图书上架、整理、阅览室管理等事务性工作。为了帮助学生馆员快速适应岗位,保障工作质量和效率,需要对他们事先进行岗前培训和业务指导,专业流通馆员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该培训工作,向学生馆员详细介绍岗位要求、岗位所需知识和技能(如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等图书分类知识、图书排架规则、OPAC检索技巧等)以及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文化,保障常规流通阅览服务正常有序开展。

(4)立足于读者服务领域的学术研究工作。学术研究是图书馆员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馆员专业化的重要标志。图书馆员的服务必须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没有研究就没有服务<sup>[20]</sup>。智慧服务背景下新理念、新技术、新需求的不断涌现推动变革读者服务的工作理念、工作内容和模式,流通服务工作应根据智慧图书馆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需要流通馆员结合图书馆的发展态势和工作实践进行系统思考和深入分析,研究智慧服务环境下读者服务工作的特点规律和业务内容,实施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引领业务发展——一方面有助于流通工作实践,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馆员自身的专业成长。

## 4 结语

专业流通馆员由传统服务转向智慧服务是图书馆读者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专业馆员的专业性质和读者的服务需求变化决定的。专业流通馆员要顺应时代和行业发展的要求,突破传统读者服务格局,重新进行角色定位,选择专业发展方向,向阅读推广馆员、参考咨询馆员、协同馆员、研究馆员、信息素养

教育专家、读者活动策划专家等智慧馆员角色转变, 驱动力消解目前不断被边缘化的职业困境, 实现智慧服务背景下的业务转型和专业发展。

#### 参考文献:

- [1] 赵苹.基于“互联网+”的高校图书馆智慧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以39所“985工程”高校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5):42-48.
- [2] 高岩,景玉枝,杨静.智慧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143.
- [3] 孙金华.信息时代图书馆员角色的十大转换[J].现代情报,2003(12):172-174.
- [4]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EB/OL].[2021-07-05].[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736/s3886/t201601/t20160120\\_228487.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736/s3886/t201601/t20160120_228487.html).
- [5] 周久凤.专业馆员视角下高校馆员的专业化发展及转型[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7(2):49-52.
- [6] 惠涓澈.图书馆员阅读微推广:主体要求、客体需求和内容追求[J].图书馆论坛,2015(10):39-42,67.
- [7] 范并思.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40(5):4-13.
- [8] 吴源渊.智慧图书馆背景下高校阅读推广特征及发展趋势探析[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2):118-122.
- [9] 赵彦辉.基于流通数据挖掘的读者阅读兴趣本体模型构建[J].图书情报工作,2012,56(3):121-125.
- [10] 程应红.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1.
- [11] 陈文莉.新时期参考咨询服务漫谈[J].图书馆学研究,2002(12):48-50.
- [12] 郝朝军,王均玲,李增义.我国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在流通阅览一线部门发展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0(4):1-5.
- [13] 孙玉燕.新媒体环境下新生入馆教育的调查与分析:以“双一流”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学研究,2019(15):75-83.
- [14] 豆洪青,刘柏嵩.“互联网+”高校图书馆传统借阅服务探索:以宁波大学“智慧图书馆”APP应用为例[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3):53-58.
- [15] 侯明艳.智慧图书馆环境下高校馆员的角色转变[J].现代情报,2015,35(5):165-167.
- [16] 王旭明.国内图书馆读者活动的研究及思考[J].图书馆,2013(2):98-102.
- [17] 罗影.智慧图书馆环境下读者服务工作的思考[J].兰台世界,2017(3):60-62.
- [18] 汪伟,耿晓红.从采访视角看图书馆流通馆员[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7,25(2):47-49.
- [19] 马景娣,缪家鼎.高校图书馆人员发展的几大趋势[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1(2):89-91.
- [20] 初景利,赵艳.图书馆从资源能力到服务能力的转型变革[J].图书情报研究,2019,63(1):11-17.

**作者简介:** 刘敏, 硕士, 宿迁学院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与读者服务; 王晓翎, 宿迁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与服务。

**收稿日期:** 2021-07-28

**本文责编:** 王学思

## 美国公共图书馆课后服务实践调查及启示

邱景怡

(深圳市龙岗区图书馆 广东深圳 518000)

**摘要:** 文章基于网络调研法调研了美国公共图书馆课后服务实践,结合我国现状认为,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课后服务一是要推动设立多边课后服务协调机构,深化馆校合作;二是实施最近邻学校课后服务示范,探索解决馆校距离问题;三是将图书馆“课后服务”信息嵌入智慧城市公共服务平台,吸引公众注意力;四是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增强馆员课后服务协同组织能力。

**关键词:** 课后服务; 公共图书馆; 中小學生; 美国

**中图分类号:** G259.712;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 Investig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After-School Services of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twork research,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ractice of after-school services in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the author of the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viewpoints for Chinese public libraries to carry out after-school service. First, the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titutions for multilateral after-school service coordination and deepen library-school cooperation. Second, the libraries should implement the after-school service demonstration for the nearest neighbor school, and explore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istance between libraries and schools. Third, it is necessary to embed the library's "after-school service" information into the smart city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to attract public attention. Fourth, we should optimize talent pool and enhance the collaborative organization ability of librarians' after-school service.

**Key words** after-school service; public librar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American

####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新变化,生育水平逐年走低。2018年和2019年我国的生育率分别为1.495和1.47,面临低生育率陷阱风险。我国学者从社会、经济、文化、生育政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探讨生育率的影响因素。住房和教育成本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sup>[1]</sup>。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我国家庭教育负担率平均为12.9%;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校外支出占比较高,近40%的中小學生参与校外补习<sup>[2]</sup>。育儿成本高,幼儿无人看护和过度消耗精力,压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我国

亟待建立社会化、普惠性的养育支持系统来缓解这一困境<sup>[3]</sup>。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实施“双减”政策,是党和政府坚持教育事业公益性,着力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制止逐利性教育行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大举措。“双减”政策的要点在于,削减校外学科类培训,明确课堂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主阵地,着力提升中小学课后服务水平。

开展中小學生课后服务,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家长解决孩子接送困难的重要举措。课后服务不仅具有解决小学“三点半难题”的本体价值,还具有预防校园欺凌、践行素质教育、保证教育公平的育人价

值和增加人民幸福感、缓解社会矛盾的发展价值<sup>[4-5]</sup>。要加强学校中小学课后服务,同时保障教师的休息权,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指出,“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比如激活当地博物馆等社会教育资源,引导社会公益机构参与”<sup>[6]</sup>。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生命力在于不断根据社会的趋势变化变革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水平。在当前的形势下,作为公共教育资源,图书馆理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中小学生学习课后服务。这是图书馆价值和作用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迎合社会需要的服务创新。

美国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也曾遇到“三点半”难题,在解决中小学课后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课后教育服务中,图书馆也占得一席之地。据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的调查数据显示,早在2013年就有约36%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提供课后幼儿照护项目<sup>[7]</sup>。2017年,美国课后服务联盟(Afterschool Alliance)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约有3/4的课后服务项目有图书馆的参与<sup>[8]</sup>。在美国,图书馆开展学生课后服务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本研究旨在通过调研美国公共图书馆的课后服务实践,为我国广大图书馆提供经验借鉴。

## 2 研究方法与信息来源

本研究主要采用网络调研法,采用由面及点的方式进行调研。面调研,指采用搜索引擎进行关键词调研。关键词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课后服务,如Afterschool Services、Out of School Time Services等;第二部分是限定图书馆类别为Public Library。点调研,主要从面调研中选取美国著名的代表性公共图书馆,进入其官方网站进行调研。本研究点调研的对象包括纽约州立图书馆、纳什维尔图书馆、费城自由图书馆、芝加哥图书馆、休斯敦公共图书馆、丹佛图书馆共6家公共图书馆,调查时间为2021年9月1日—2021年9月15日。调研内容如表1所示。

## 3 美国公共图书馆的课后服务实践

从调研情况看,美国的课后服务具有公益性,由

表1 主要调研对象列表

图书馆名称	服务项目名称	服务内容
纽约州立图书馆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NYPL After School	为6—12岁儿童提供家庭作业帮助、阅读推荐、趣味写作、STEAM教育以及休闲零食
纳什维尔图书馆 Nashville Public Library	Nashville After Zone Alliance (NAZA)	为5—8年级学生提供家庭作业帮助,开展从自行车修理到时装设计、艺术和机器人技术等丰富的课程
费城自由图书馆 Free Library of Philadelphia	Literacy Enrichment Afterschool Program (LEAP)	为6—18岁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家庭作业帮助、信息素养培育甚至是职业技能发展服务
芝加哥图书馆 Chicago Public Library	The After School Matters	开展GALLERY37、TECH37、SPORT37、WORDS37、SCIENCE37系列课后服务项目;向青少年提供实习机会,为大学或就业做准备
休斯敦公共图书馆 Houston Public Library	After School Zone	面向7—18岁提供家庭作业帮助、视频游戏、动手实操STEAM活动
丹佛图书馆 Denver Public Library	After school is cool	面向儿童提供艺术表演、STEAM教育、工艺美术、游戏、技术训练营等活动

政府主导协调,多方共同参与的特点。2019年,至少有27个州通过预算资助中小学生学习课外活动。资金的使用形式灵活,或直接拨款,或通过助学金计划或特定计划项目拨付,有时也作为大型青少年发展计划的子计划实施<sup>[9]</sup>。公共图书馆在政府协调下与学校结盟。以芝加哥The After School Matters项目为例,合作者包括芝加哥市、芝加哥公园区、芝加哥图书馆、芝加哥校区,形成“一学校一公园一图书馆”的协作模式<sup>[10]</sup>。Nashville After Zone Alliance项目的承担者包括了纳什维尔市、纳什维尔图书馆和纳什维尔大都会公立学校。

美国公共图书馆在开展课后服务方面具有覆盖面广、服务内容丰富、性价比高的优势。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统计,美国每一万人就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纽约州立图书馆在纽约市三个区共20家分馆开展课后服务,纳什维尔图书馆、休斯顿公共图书馆、费城自由图书馆开展课后服务的分馆分别为21家、15家和50家。中小学生对形式僵化的讲授式课堂教学缺乏兴趣,图书馆有激励、个性化、有实操的活动项目更

受中小學生歡迎。美國圖書館分布廣泛，深入街區，與學校距離較近，步行和定點巴士是解決學校到公共圖書館的主要方式，如哈佛公校和哈佛圖書館之間就有課後巴士穿梭<sup>[11]</sup>。

美國圖書館開展課後服務獲得了社會力量支持。圖書館向社會徵聘大量志願者。芝加哥圖書館的The After School Matters通過多種類型的项目招募不同級別的實習生，14歲以上的青少年可以通過擔任志願者發展社會技能<sup>[12]</sup>。2018—2019年，費城自由圖書館各分館開展的LEAP项目均有一名兼職課外引導員或LEAP創客導師和三名青少年助理引導員主持。這些助理引導員均為高中生，每周工作4—10個小時，在費城自由圖書館館員的指導下開展工作<sup>[13]</sup>。通過參與LEAP项目，青少年助理引導員獲得了圖書資源相關知識，增長了協作和團隊意識，促進了他們自信心的建立。在布魯克林圖書館，志願者來源多樣，有學生、在職家長、退休教師、商務專家，16歲以上的志願者可擔任課後家庭作業助手<sup>[14]</sup>。

美國圖書館課後服務的開展受益於智慧城市建設。北卡羅來納州建立了North Carolina CAP (Center for Afterschool Programs) : Statewide Afterschool Dictionary，聯通所有的課後服務點，公眾可檢索、瀏覽轄區內所有圖書館課後服務项目的服務內容、地點、對象。科羅拉多州課後聯盟實施了CAP Data Mapping Project，通過地理信息系統對外展示課後服務项目分布情況。費城建有課外活動數據管理系統(Philadelphia OST Participation Data System)。城市級、社區級的数据管理系統有益於課後服務資源的規劃、管理、共享<sup>[15]</sup>。

多方的互動也促進了美國課後服務的規範化發展。2006年，一個主題為“在圖書館學習”的課後服務計劃研討會順利召開。會議的共識是“公共圖書館可能是最初的課後服務提供者，但是如果他們要成為快速發展的課外活動提供者必須加緊努力”<sup>[16]</sup>。自此以後，圖書館加強了與其他課後服務提供者的互聯互通。2013年，美國青少年圖書館服務協會(Young Adult Library Services Association, YALSA)舉辦了旨在擴大青少年課後及暑期在圖書館學習機會的會議，與會者匯集了來自教育、科技、圖書館、青年發展、研究、課外活動等領域的個人。同年，美國城市圖書館理事會和科學技術中心協會主辦了類似會議，來

自美國全國範圍的圖書館和博物館學習實驗室的代表參加了會議。這些會議促進了多邊的交流，知識共享，有利於凝聚共識和形成服務的規範性文件。美國圖書館青少年課後服務具有專門的服務指南，並接受服務協會的統一指導<sup>[17]</sup>。相關部門也根據地區情況發布相關指南，如*Afterschool Program Start-up Guide*, *After School Programs Operations Manual*, *Indiana Afterschool Standards*, *Minimum Standards for School-Age and Before or After-School Programs*, *Afterschool Materials Guide*等，覆蓋到課後服務项目的開辦、運作、最低質量標準。城市級的課後服務管理系統為課後服務项目的績效評估提供技術支撐。許多地區會定期進行課後服務项目評估，並對外發布評價報告。

#### 4 我國公共圖書館中小學生課後服務現狀

我國公共圖書館的開放時間不一。當前受疫情影響，開放時間也隨時下的防疫態勢變化。相當一部分公共圖書館閉館時間在下午18:00以後，部分延長至晚上20:00。但是我國公共圖書館參與中小學生課後服務的報道並不多見。深圳、武漢、南寧等城市曾開展了類似課後服務活動探索<sup>[18]</sup>。長春市圖書館開展了“長圖小樹苗16點課堂”。該活動以長春市圖書館的青少年讀者服務部為主要陣地，于每周一至周五的16:00—19:00舉行，開展的課程包括少兒閱讀、公益課堂等。

對標美國，我國公共圖書館開展課後服務主要面臨以下障礙：

(1) 圖書館數量不足，館校距離遠。截至2019年，我國有公共圖書館3 196家，每43萬人才有一家圖書館。課後服務的主要目標對象群體，如低收入家庭、新移民家庭，通常居住在郊區。我國大型圖書館多數分布在城市中心，社區圖書館應該更多地成為課後服務的客體，但是事實上，社區圖書館仍然數量不足。以廣州市白雲區為例，全區共有35家社區圖書館，每家圖書館的服務範圍為22平方公里，絕大多數中小學生無法以步行的形式到達社區圖書館；也缺乏合理的館校責任機制來確保學生轉移安全，客觀上阻礙了圖書館課後服務的開展。

(2) 圖書館與學校的合作層次較低。我國公共圖

图书馆与学校的合作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公共图书馆充实学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通过流动借书点、移动图书馆等方式主动将服务延伸至学校,如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将部分少儿图书馆藏移至周边小学进行开架借阅。二是学校图书馆引流公共图书馆。学校组织学生办理公共图书馆借阅卡,不定期到公共图书馆参观、借书或者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三是建立联合图书馆模式。学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通过建立联合图书馆或者分馆的模式开展合作尝试,如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在长乐区设立首家幼儿园分馆。这些分馆的设立仍然是传统的图书资源共享行为。图书馆员辅助教师教学、辅助幼儿完成家庭作业、开展信息素养教育仅仅是零星发生,图书馆与中小学的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还有待挖掘。

(3) 图书馆教育资源匮乏,吸引力不足。在美国,公共图书馆课后服务广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图书馆的STEAM资源丰富,并非只有图书借阅。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开放时段即使覆盖到课后时间,也因为缺乏有吸引力的活动项目而难以获得青少年的青睐。据笔者对北京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STEAM教育活动的调查,活动基本在周末举行,工作日课后时间几乎没有安排。经费投入所限,是STEAM只在周末开展,无法在工作日课后开展的一大原因。另外,社区图书馆的配置较低,除了场地、网络、少量图书,服务无特色,不能满足青少年当下的需求。

(4) 图书馆员能力不足,服务水平待提升。图书馆工作人员相当部分来自各种专业背景的非专业人员,未接受过系统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培训。图书馆员对图书馆在非正式教育中的作用缺乏认识,知识和技能更新步伐慢,不能适应当前的教育形势变化。从部分社区图书馆举行的STEAM活动来看,与第三方合作开展STEAM活动较多,较少凭借自身力量<sup>[9]</sup>。

## 5 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中小学生学习课后服务建议

2017年3月,教育部率先印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学习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课后服务内容主要是安排学生做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开

展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提倡对个别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给予免费辅导帮助”。这些内容绝大部分在公共图书馆的能力范围之内。图书馆具有儿童和青少年所需的教育资源和服务基础,是中小学课后服务的潜在合作伙伴。借鉴美国的发展经验,我国公共图书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部署。

### 5.1 推动设立多边课后服务协调机构,深化馆校合作

学校图书馆属于教育部门,而公共图书馆属于文化部门,因为隶属不同行政单位主管,不存在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所以导致在合作实践中,合作双方更多从自身利益得失角度进行考虑,缺乏通盘思考,各自情况和诉求不一,难以产生深度合作。应倡议设立多边课后服务协调机构,统筹教育机构、公共文化设施、公益性社会组织等所有课后服务提供者。图书馆界应该积极主动参与到课后服务的讨论和建设实践中,通过与教育界的沟通交流,形成良性互动。双边的论坛,短期有利于课后服务实践中痛点难点的解决,长期有利于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 5.2 实施最近邻学校课后服务示范,探索解决馆校距离问题

图书馆为学校提供课后服务,从宏观上讲,图书馆的公益性符合广大学生的利益,也符合学校的利益,也是图书馆要彰显社会价值的举措和任务,符合图书馆的利益。在微观上需要解决馆—校之间的距离问题。初期可面向周边距离最近的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示范,在步行距离范围内探索吸纳志愿者维持秩序的模式解决馆校一公里问题,在1—2公里范围内的安排定点巴士;或者由图书馆员对学生提供到校现场服务,尤其是低幼学生的STEAM活动可以选择简便的、有趣的活动内容。

### 5.3 将图书馆“课后服务”信息嵌入智慧城市公共服务平台,吸引公众注意力

为了支持社会化的普惠性抚养,全国各地母婴设施纷纷通过整合进入信息平台彰显其公共性。在我国公民常用的高德地图、百度地图中,图书馆还仅仅停留在有名称、开放时间的程度,应该加强信息披露和宣传,向社会公众普及图书馆的资源、活动,彰显自身特色,提升社区的图书馆利用意识。图书馆开展课后服务,极有可能改变当前图书馆无人问津的状况。

### 5.4 优化人才队伍结构,为课后服务提供人力保障

开展课后服务的图书馆的关键优势是公益性和

性价比,这就要求图书馆开展丰富活动的同时,更多依赖自身的力量。图书馆一是要优化馆员结构,配置具有学科背景+教育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二是加强馆员继续教育培训,尤其着重馆校沟通、读者沟通、信息素养等基础能力的发展;三是倡导开放式学习,构建学习型图书馆,营造馆员服务创新氛围。

#### 参考文献:

- [1] 林宝.“生育焦虑”从何而来[J].人民论坛,2018(31):60-61,115.
- [2]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教育财政[EB/OL].(2020-04-27)[2021-09-09].<https://ciefr.pku.edu.cn/images/cbw/kyjb/2020/09/03/C373773C09899BD5036394382BB47135.pdf>.
- [3] 施芸卿.抚育私人化困境及社会化公共养育探索[J].学术论坛,2021,44(1):84-94.
- [4] 康丽颖.促进儿童成长:课后服务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探讨[J].中国教育学报,2020(3):22-26.
- [5] 刘宇佳.课后服务的性质与课后服务的改进:基于我国小学“三点半难题”解决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2020(1):45-51.
- [6] 唐琪,焦以璇,刘博智.课后服务如何实现多方共赢[EB/OL].(2021-03-04)[2021-09-09].[http://www.jyb.cn/rmtzgjyb/202103/t20210304\\_406000.html](http://www.jyb.cn/rmtzgjyb/202103/t20210304_406000.html).
- [7] FERNANDEZ G.Establishing the public library as an out-of-school partner in stem/ steam education[EB/OL]. (2020-12-09)[2021-09-09]. <https://scholarworks.lib.csusb.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269&context=etd>.
- [8] Library and afterschool partnerships[EB/OL].(2021-09-09).[https://afterschoolalliance.org/documents/LibraryPartnershipsSurvey\\_ALA\\_June2017.pdf](https://afterschoolalliance.org/documents/LibraryPartnershipsSurvey_ALA_June2017.pdf).
- [9] National Conference of national legislatures.State and Federal Investments in Afterschool Programs[EB/OL].(2019-12-06)[2021-09-09].<https://www.ncsl.org/research/education/state-and-federal-investments-in-afterschool-programs.aspx>.
- [10] After school matters.Sport37 Application Request[EB/OL].(2010-05-03)[2021-09-09].[https://www.youthservices.net/web/gms/binn/asm/2010/docs/cpd\\_sports/rfp.pdf](https://www.youthservices.net/web/gms/binn/asm/2010/docs/cpd_sports/rfp.pdf).
- [11] Hartford Public Library.Hartford Public Library & Hartford Public Schools After School English Program[EB/OL].(2021-09-09).<https://tap.hplct.org/wp-content/uploads/2020/01/Next-Steps-Permission-slip-for-website.pdf>.
- [12] After school matters.Programs[EB/OL].(2021-12-09)[2021-09-09].<https://www.afterschoolmatters.org/teens/programs/>.
- [13] RUSSELL C A,MEREDITH J.Literacy Learning in drop-in library programs[EB/OL].(2021-09-09).<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605324.pdf>.
- [14] Brooklyn Public Library.VOLUNTEER OPPORTUNITY #9[EB/OL].(2021-09-09).[http://www.bths.edu/intern/2013-2014/VOLUNTEER/Volunteer\\_9.pdf](http://www.bths.edu/intern/2013-2014/VOLUNTEER/Volunteer_9.pdf).
- [15] Data Use in Afterschool Systems.Connecting the Dots[EB/OL].(2021-09-09).<https://www.wallacefoundation.org/knowledge-center/Documents/Connecting-the-Dots-Data-Use-in-Afterschool-Systems.pdf>.
- [16] JACOB B R.The Overlap Between Public Libraries and OST Learning[EB/OL].(2021-09-09).[http://niost.org/images/afterschoolmatters/asm\\_2021\\_spring/Mind\\_the\\_Gap.pdf](http://niost.org/images/afterschoolmatters/asm_2021_spring/Mind_the_Gap.pdf).
- [17] 林莉.美国图书馆青少年放学后服务实践研究[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8,224(4):92-95.
- [18] 罗博.美国图书馆为放学后青少年服务的实践[J].图书馆杂志,2016,35(2):75-79.
- [19] 满天星公益.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社区图书馆2019年度工作总结[EB/OL].(2019-12-27)[2021-09-09].<https://www.starscn.org/Uploads/file/20210325/605c4d76ac7ce.pdf>.

作者简介: 邱景怡, 深圳市龙岗区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读者服务、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 2021-10-13

本文责编: 孙晓清

· 异域采风 ·

## SCCR 报告对完善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立法的启示\*

高可淼

(四川省图书馆 四川成都 610015)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条例并无图书馆文献传递例外的直接规定,因此图书馆该项服务面临侵权风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对此展开了各种讨论,各国立法也有不同规定。文章借鉴国外相关讨论与规定,提出为文献传递设置类似“首次销售原则”限制,设置法定许可平衡公众利益与私利,设置禁止规避技术措施的建议。

**关键词:** SCCR报告;图书馆;文献传递;版权;立法

**中图分类号:** G259; G252.62      **文献标识码:** A

### The Enlightenment of SCCR Report on the Improvement of Library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 Legislation

**Abstract** Copyrigh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related regulations of our country have no direct provisions on the exception of library document delivery, so the library service faces the risk of infringement.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of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has had various discussions on this issue,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provisions in the legislation of various countries. Based on the relevant discussions and regulat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setting up restrictions similar to the "first sale principle" for document delivery, setting up legal permission to balance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and setting up anti-circumvention of technological measures.

**Key words** SCCR report; library; document delivery; copyright; legislation

#### 1 引言

不同国家的版权例外规定不同,针对图书馆版权例外也在不断调整,我国于2021年6月正式施行的最新著作权法将2013年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的《马拉喀什条约》视障阅读者无障碍出版物出版列入版权例外,但对公共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的立法诉求,仍没有太大改观,公共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服务仍

暴露在侵权风险之下。

目前,我国图书馆仅限于陈列或保存版本目的合理使用版权作品,白俊勇通过解读SCCR(Standing Committee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和档案馆限制与例外的非正式表格》,提出为图书馆研究和跨境使用目的完善合理使用制度的建议。吴高、卢纯昕、李静静、蒋瑛认为我国可参考他国法律,构建我国图书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版权例外<sup>[1-3]</sup>。吉宇宽论述了图书馆直接适用版权法定许可规则的现实需求和法

\* 本文系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2018—2020规划项目“图书馆著作权‘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制度分析及相关立法建议”(项目编号:WHTTSXM[2018]06)阶段性成果。

理依据<sup>[4]</sup>。WIPO下属的SCCR是为研究版权及相关权领域的实体法和协调问题设立的,各国立法是其重要的信息来源,其讨论结果是WIPO大会和外交会议缔结或修改条约的依据。从2013年开始SCCR就针对公共图书馆的版权例外开展了系列讨论,图书馆跨境获取信息的重要性以及困难是2020年SCCR第40届会议讨论的重点。无论是跨境使用还是国内文献传递都是更好帮助读者使用作品的方式,需结合复制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外才能达到此目的,同时SCCR的报告也提到平衡版权所有者的利益是需要供立法者考虑的因素,法定许可相较于合理使用可以更好地协调二者关系。而目前我国文献传递服务仍然需要合同许可,而且公共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因第三方资源商提供的链接含有侵权作品被判侵权的案件也已出现,因此笔者就此提出为公共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设置法定许可的立法建议。

## 2 SCCR 最新讨论评述

### 2.1 信息跨境获取成为关注重点

相较于之前会议多次对图书馆保存、复制例外的讨论,第40届会议召开前的三次区域研讨会以及一次国际会议上各方代表就图书馆跨境获取版权保护作品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加拿大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表示许多国家已颁布法律,确保本国的文化和历史记录得到保护,这些国内法律缺乏承认数字信息跨境使用部分,如果这部分存在,那么国内法律便会迈出坚实的一步。拉丁美洲知识产权研究公司提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图书馆的例外至关重要,尤其是在跨境领域,需要为信息跨境扫清障碍。非洲集团、墨西哥代表提出因为各国法律的不同信息在跨境层面有很大挑战,并且影响了权利人和用户需求的协调。库克群岛代表认为,尽管没有图书馆在跨境使用方面的例外规定,南太平洋大学已经从跨境访问作品中获益。

### 2.2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是否更新国际条约仍然存在争议

虽然各国代表基本认同信息跨境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价值,但在是否修改相关国际条约的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差别仍然很大。克罗地亚与欧盟代表团认为现行国际版权框架允许各成员国推出并更新例外以应对各国的本地需求,

SCCR工作的目标应该是在国内法律中落实国际条约,没有必要为此拟定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欧洲作家委员会也建议探讨许可解决的方案,其支持为便利视力障碍者获取出版作品提供例外的《马拉喀什条约》,但不建议为版权例外缔结更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非洲与伊朗代表则认为由于不同国家对例外的处理不一致且无法预知,各国法律在版权例外方面的差异必然会阻碍知识的流动。对于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所有参与者而言,更新条约虽然为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sup>[5]</sup>,我国著作权法在适用国际条约时通常会吸收相关规定另行立法加以适用,但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仍然有很大差别,因此短期内缔结条约尚有困难。

## 3 我国文献传递活动的法律风险与各国法律在文献传递方面的立法现状

### 3.1 我国文献传递活动的法律风险及立法现状

2017年原告某出版社登陆“全国联合咨询与文献传递网”后点击读秀公司提供的链接,可全文在线和离线阅读、下载和打印超星提供的未经其合法授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该出版社认为中山图书馆作为“全国联合咨询与文献传递网”的主办单位,读秀公司为链接提供者,超星公司为内容提供者共同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中山图书馆辩称图书文献传递是文化部鼓励的,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联盟是一个平台而不是内容提供商,其提供的仍然是图书馆的功能,只是从物理空间变成互联网方式,仅限在IP范围内并结合文献传递20天内只允许打开20次的服务模式,不会起到替代作用,不会给涉案作品版权所有者的造成经济损失,虽然网站备案是在中山图书馆名下,但图书馆联盟的模式是谁有资源谁提供,具体由谁来提供无从得知。该案的审判法院认为,中山图书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仅是该网站备案主体,涉案作品并非其发送,而是由联盟成员发送。通过读秀公司设置的指向涉案作品的链接,说明读秀与全国联合咨询与文献传递网存在合作关系,读秀公司、中山图书馆未经原告许可,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共同提供涉案作品,使公众能够在其选定的时间、地点获得涉案作品,侵害了原告对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构成共同侵权,最终中山图书馆被判与读秀公司共同承

担5 000元的连带赔偿责任。案例的判决结果说明目前公共图书馆的电子文献传递只能通过授权许可的方式进行,如与公共图书馆合作的第三方数据库中含有侵权或已过授权使用期限没有及时删除的作品,公共图书馆容易因为给读者提供该类作品文献传递服务被诉侵权。文献传递因读者可阅读、下载、打印,相较于单纯的链接提供还有区别,属于内容提供的范畴,不能援引针对链接服务提供者的避风港规则进行抗辩,但要求公共图书馆逐一审查第三方数据库商提供的作品是否具有合法授权不具备可能性,因此如果能够借鉴国外法律给予公共图书馆文献传递法定许可的例外,不经版权所有者许可直接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文献使用费,可兼顾效率与利益平衡<sup>[6]</sup>。

无论是纸质文献传递还是电子文献传递都需要考虑是否有复制权的例外,如需通过网络传播电子文献还需要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外。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针对版权所有者的复制权例外仅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目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6条第3款规定合理使用的目的仅为教学和科研,都没有以文献传递为目的的例外,因此可以说未经许可的文献传递仍然属于侵权行为,但该项服务最终关系到公众信息获取,因此有必要为公共图书馆的文献传递设置一定例外,从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来说,1992年我国成为《伯尔尼公约》的签约国,《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成员国可以制定法律在某些特殊且不影响著作权人利益与作品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复制版权作品,但是否制定这种规定的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各国立法机关,并且这一规定也并未将适用主体明确指向图书馆<sup>[7]</sup>。1994年围绕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产生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协定与《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一脉相承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差别,TRIPS协定第13条与《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关于版权的例外都采用先要求必须规定版权例外,接着又对例外作出限制的表述,但《伯尔尼公约》只是将版权例外局限于版权作品的复制行为,TRIPS协定允许将版权例外适用于所有的版权专有使用权,而不仅仅是复制权例外,此外《伯尔尼公约》只要求各国将三步检验法附条件体现,而TRIPS则要求

以强制性条款的形式体现在各国法律中。最新修改的《著作权法》落实了我国近来加入国际条约中的义务,但遗憾的是《伯尔尼公约》与TRIPS协定都没有将适用版权例外的主体指向图书馆,借鉴SCCR的讨论成果提出设置我国文献传递版权例外的立法诉求成为解决公共图书馆该类服务面临法律风险的可行路径<sup>[8]</sup>。

### 3.2 SCCR 文献传递的提案以及各国文献传递立法现状

2013年第26次会议,非洲集团提出只要符合国内法的规定,应准许图书馆向另一图书馆提供本馆合法获得的任何作品或受相关权保护的资料的一份复制件,以便后者提供给任何用户。巴西、厄瓜多尔、乌拉圭在非洲提案的基础上提出除馆际文献提供外,在向用户传递文献时应作出研究、私人学习或教育为目的的限定并符合《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巴基斯坦和墨西哥则提出应就使用目的和合法获得方式作更为全面的阐述<sup>[9]</sup>。

在SCCR第40届会议召开前的国际会议上, Kenneth D. Crews指出促进境内和跨境访问至关重要,目前公共图书馆版权例外规定主要有三种情况:①没有为图书馆规定例外;②有非常一般性的规定,但是没有为这些机构具体活动规定例外;③规定了具体活动例外的国家主要关注的服务包括数据挖掘、研究、保存。规定了专门例外的国家多数属于英联邦法律体系或欧盟、《班吉协定》区域体系。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2019年委托Kenneth D. Crews出具的《关于图书馆和档案馆版权限制与例外的研究报告》显示<sup>[10]</sup>,虽然著作权法允许图书馆制作作品的复制件并将其提供给其他图书馆使用或应要求向用户提供的情形并不是很普遍,但仍然有22个国家允许文献提供,有9个国家允许馆际互借。欧盟《信息社会著作权指令》指出成员国可为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实施的特殊复制行为规定例外,以追求研究和(或)教育的目标,当然,欧盟成员国在规定一种例外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应向作者付酬,在没有例外的情况下适用许可制度。多数欧盟成员国的版权法中允许图书馆出于研究目的复制例外,但多数成员并没有明确规定,图书馆可将为研究目的制作的复制件提供给读者<sup>[11]</sup>。葡萄牙立法沿用欧盟《信息社会著作权指令》图书馆可

以为满足机构内部需求而不是公众需求复制已发表的作品,机构复制必须支付通过与作者和出版者协商确定的报酬,权利人与使用者之间订立的合同不得与法律规定的例外相冲突,但该条款也未指出能否在复制后向其他图书馆或者用户传递。

《德国著作权法》因2018年《教育与科学发展需要法》的生效导致基于教育与科学目的对版权权利人之权利限制体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德国著作权法》第53a条第1款规定,准许以邮寄或者传真的方式复制并传送在报纸或者杂志上出版的文章以及出版作品中的小部分;公共图书馆在不出于营利目的为教学或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前提下,通过电子形式传递杂志上单个文章的图片文件也是被允许的;当公众不可以明显地在其选定的地点或者时间根据合同约定以合理的条件获取文章或者作品的一小部分时,通过电子形式的复制和传送才是允许的,另外根据第53a条第2款的规定,作者对复制和传送享有只能由版权管理协会主张的合理报酬请求权<sup>[12]29</sup>。

在另外28个通过类似法律的国家中,有11个国家不属于欧盟。《美国著作权法》第108条(d)款和(e)款是馆际互借请求文献的复制例外规定<sup>[13]</sup>:(d)款规定用户可从图书馆或从另一个图书馆通过文献传递请求复制期刊或汇编作品中的一篇文章或一个部分,或者其他受著作权保护作品的一小部分制作一份复制件或录音制品;(e)款规定图书馆通过合理的调查认定无法以合理的价格购买版权作品的复制件或录音制品,可对其藏品的全部或大部分内容进行复制。这两种复制方式都需要图书馆履行一定的义务,图书馆需要在接受订单的地点,显著地放置与版权局局长在条例中要求一致的版权警告,并在订单上也附有同样的版权警告。《加拿大著作权法》第30.2条5.02款规定图书馆或者受其管理之人,可向另一图书馆提出请求的人提供数字形式的复制品,只要其采取措施防止该请求人:(a)制作该数字复制品,包括纸质复制品;(b)向任何其他他人传输该数字复制品;(c)自其首次使用该数字复制品之日起,使用该数字复制品超过5个工作日<sup>[14]</sup>。《英国著作权法》第38、39条允许读者基于研究和学习的目的复制一份期刊中的一篇,对于文学、戏剧或音乐作品,请求者只能请求同一材料的一份复制件或请求不超出该作品合理使用部分的复制;第41条规定,图书馆员在不侵权的前提下,可向另

一指定的图书馆提供(a)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或(b)已出版文学、戏剧或音乐作品之全部或部分<sup>[14]</sup>。《澳大利亚著作权法》第50条规定,经过合理调查后不能以合理价格在合理时间内获得作品电子版权的,图书馆可以为文献传递制作期刊上的一篇文章、已出版作品的全部或部分,在复制件被提供给另一个图书馆后,应尽快销毁为提供目的制作的复制件<sup>[14]</sup>。

## 4 SCCR 报告及各国法律对图书馆文献传递的立法启示

SCCR于2019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38届会议的第七项议程讨论了关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限制与例外,法学与哲学博士肯尼思在会议上做了关于《图书馆的限制与例外:类型学分析》的报告,报告首先对各国法律中针对图书馆工作的例外情形,包括保存作品、替换作品、为学习与研究的目的复制作品,图书馆馆舍内获取作品,出借纸质文献、电子文献等进行定义,并从图书馆活动的类型、涉及版权所有者的权利、法定例外的要素、供立法者审议的要点四个方面分别对每一种例外情形进行分析。文献传递虽然没有单独被列入一种例外情形,但该报告在为学习和(或)研究目的的复制中提到立法者仍然需要考虑复制与文献传递或馆际互借的关系以及获取作品是否需要得到授权、是否准许使用技术手段、是否准许向馆外用户传递文献、是否准许就同一文献的多次请求、是否批准跨境传递的问题。

### 4.1 设置类似“首次销售原则”的限制

Kenneth D. Crews在《图书馆的限制与例外:类型学分析》报告中提出纸质文献的借阅首先需要确定是否将“首次销售原则”明确为法律条文,此原则是指作品的复制件在首次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转移所有权后,版权所有人就无法控制该作品的流转<sup>[10]</sup>,在一些国家以法律惯例的形式被适用,一些国家以法律条款的形式被明确,《德国著作权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如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经发行人同意已经通过欧盟境内投放市场,许可其继续流转<sup>[12]77</sup>。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发行权是以“出售”或“赠与”的方式转移实体物物权的权利,数字作品非发行权客体,因此首次销售原则是否应用于数字作品尚不明确<sup>[15]</sup>。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将首次销售

原则延伸到网络传播中,将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产生冲突<sup>[16]</sup>。这种情况的存在导致版权人在处分作品时多采用“许可”而非“转让”的形式实现作品的流转,意味着公共图书馆每一次的文献传递都必须经过版权人的同意,丧失构建法定许可的基础。王迁认为,机械地认为“首次销售原则”只适用于有形载体的发行,必然会得出该原则不适用于网络环境的结论<sup>[17]</sup>。法律规则的形成除了立法者的主动意愿外,更重要的是现实对法律规则的需求。即使承认“首次销售原则”无法直接适用于网络环境,立法者仍然应该回答:

“既然版权人有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通过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版权法是否应当对这一专有权利施加类似‘首次销售原则’的限制,以达到版权人与公众利益的平衡”,一些国家已经鉴于公共图书馆对作品销售的影响而在《著作权法》中创设“公共借阅权”以补偿版权人的损失,如公共图书馆将获得合法授权的作品通过技术手段限制读者的继续传播,在此基础上观察和评价传递数字化作品对版权人的影响,设置类似“首次销售原则”的限制,从保护版权人的利益与保障公众的信息共享权的角度平衡利益,完全取决于立法者的考量<sup>[18]</sup>。对于第二种观点,赵加兵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不能完全规制网络环境下的作品利用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核心是他人“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行为具有交互性,数字图书馆将作品放在局域网中供读者浏览,而非公众选定的时间或地点都能够获得作品<sup>[19]</sup>。重新探索“首次销售原则”的内在价值,有助于为公共图书馆的文献传递夯实基础。

#### 4.2 设置法定许可平衡公共利益与私利

2020年SCCR第40届会议召开前国际会议图书馆小组的讨论中,图书馆界代表再一次重申了图书馆为各社群利益服务的核心使命,同时许多参会代表也认为针对图书馆的例外并不总是等同于免费使用,将例外与报酬相结合,也是可以探索的路径之一。芬兰图书馆代表认为北欧国家树立合同与例外并存的良好典范,图书馆向利益相关方提供补偿金的制度正在为每个人创造新的价值,其他益处包括降低盗版率。

版权是版权人享有的私权,从私权自治的基本原则出发,公权一般不限制私权,但由于市场失灵、公共利益需求等理由,当介入的理由“正当且充分”

即符合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且限制程度具有均衡性时,版权限制制度可协调信息共享与版权私权的冲突<sup>[20]</sup>,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法定许可是指依照《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不必征得权利人同意使用他人作品但需向其支付报酬的一种法律制度,是协调二者关系的路径之一,法定许可争议的核心是在私法自治的原则下,应当基于何种理由对版权行使何种程度的限制,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对于文献传递的立场是,“信息资源满足了读者的信息需求,图书馆向以研究、学习需要的用户提供版权作品的服务,应被著作权法允许”。但与此同时,出版商认为,“文献传递是出版商提供的基本服务之一,不受限制地传输版权作品违反了著作权法”。价值优先性确定了法定许可制度构建的正当性,允许图书馆文献传递法定许可制度具有降低作品使用成本,提高文献传递效率,保障公众信息获取,版权人获取合理报酬的价值优先性。比例原则保障正当性的实现,我国法定许可多是移植国外经验,葡萄牙、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的版权法都对文献传递需求引发的复制规定了类似法定许可的可量化的、合比例的操作细节,如果未得到版权所有者的许可,读者复制文献,版权所有者的利益必定会受到影响,因此立法者需要平衡版权所有者的利益与公共利益,明确图书馆文献传递例外允许复制的使用目的、允许复制作品的类型,根据不同的使用目的,对允许复制的数量、比例,复制手段作出详细规定。

#### 4.3 设置禁止规避技术措施例外

技术保护措施是权利人利用技术手段保护自身权利以防止他人侵权的私力救济手段,是线上提供图书的必要先决条件,但法律禁止规避技术保护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未经许可的侵权使用,以保证版权人的利益而非阻止公众的信息获取,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有必要对技术措施设置合理的界限<sup>[20]</sup>。由于目前技术保护措施不区分合理使用与非法使用,著作权法赋予图书馆的权利因技术措施的存在而难以实现。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7条规定,允许图书馆向馆舍内的服务对象提供合法收藏的数字作品<sup>[21]</sup>。但第12条规定的可以避开技术保护措施的四种情形并未涉及公共图书馆的业务,这将影响图书馆界数字资源的保存、开发、利用,有必要充分考虑平衡公共图书馆与权利人利益,为公共图书馆文献传递规定禁

止规避技术措施的例外。

1996年颁布的WCT(《WIPO版权条约》的简称)第11条规定,缔约各方应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或者法律规定,禁止规避权利人实施的技术保护措施<sup>[22]</sup>。

《欧盟信息社会著作权指令》规定权利人没有采取自愿措施的情况下,成员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权利人让受益方从国内法规定的例外中受益<sup>[23]</sup>。《美国著作权法》与《澳大利亚著作权法》都允许图书馆为作出采购决定对版权作品进行技术措施规避,不同的是对规避后可实施的行为,《美国著作权法》允许复制

一份作品,只要保存的时间不超过做出该善意决定必要的时间,也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当图书馆向公众、图书馆附属机构研究人员、专业领域研究人员提供信息且不知道或者没有理由知道他们侵犯了技术保护措施时,免负任何刑事责任。《澳大利亚著作权法》则不允许复制且没有免责条款。除此之外,美国还有更新机制,国会图书馆与商务部相关部门可通过三年一次的协商建议给予某类作品用户豁免,条件是这些人在今后三年可能因禁止规避影响对这类作品的非授权使用。

### 参考文献:

- [1] 吴高.国外文献传递版权法规立法现状与启示[J].图书馆建设,2015(4):25-29.
- [2] 卢纯昕.图书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版权例外的立法构建[J].图书馆杂志,2016,35(5):26-31.
- [3] 李静静,蒋瑛.国际版权制度变化对我国文献传递版权立法的启示[J].情报探索,2017(7):19-24.
- [4] 吉宇宽.图书馆直接适用著作权法定许可规则的现实需求和法理依据[J].图书馆学研究,2019(1):88-93.
- [5] Standing Committee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Thirty-Ninth Session Report[EB/OL].[2021-03-15].[https://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477830](https://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477830).
- [6]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与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EB/OL].[2021-03-16].  
<https://www.pkulaw.com/CLL.C.97443442>.
- [7] 杨卉卉.论图书馆版权限制与例外制度的立法演变[J].法制与社会,2015(29):37-38.
- [8] Report on Regional Seminars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mitations and Exceptions[EB/OL].[2021-03-15].[https://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515597](https://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515597).
- [9] Working Document Containing Comments on and Textual Suggestions Towards an Appropriate International Legal Instrument on Exceptions and Limitations for Libraries and Archives[EB/OL].[2021-03-15].[https://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242388](https://www.wipo.int/meetings/en/doc_details.jsp?doc_id=242388).
- [10] Copyright Limitations and Exceptions for Libraries:Typology Analysis[EB/OL].[2021-03-15].[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opyright/en/sccr\\_38/sccr\\_38\\_4.docx](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copyright/en/sccr_38/sccr_38_4.docx).
- [11] 黄国彬.世界性、地区性著作权条约中适用于图书馆的例外的发展演变[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12):5-10,13.
- [12] 莱特.德国著作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 [13] 杜颖.美国著作权法[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23.
- [14] 黄国彬.图书馆可适用的复制权例外的若干情形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1,31(6):122-126.
- [15] 马驰升.数字环境下首次销售原则适用的困境与突破[J].知识产权,2016(3):88-93.
- [16] 焦和平,马治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发行权的冲突与协调[J].法学杂志,2010,31(9):61-63.
- [17] 王迁.论网络环境中的“首次销售原则”[J].法学杂志,2006(3):117-121.
- [18] 杨惠玲,冯涛.论技术措施权利的法律保护及其例外[J].知识产权,2011(9):70-73.
- [19] 赵加兵.论版权权利穷竭原则在数字环境中的适用及其考量因素[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4(1):37-41.
- [20] 付继存.著作权法定许可的立法论证原则[J].学术交流,2017(9):157-164.
- [21]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13修订)[EB/OL].[2021-05-06].<https://www.pkulaw.com/CLL.2.194533>.
- [2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1996)[EB/OL].[2021-03-15].<https://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CWGB200701012.htm>.

[23] 蔡丹琪.技术措施保护与终端用户合理使用的冲突与协调[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9.

**作者简介:** 高可淼,四川省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著作权问题。

**收稿日期:** 2021-07-15

**本文责编:** 孙晓清

(上接第37页)

- [5] 刘建一,李丹阳,朱慰慈,丁柯口述抗战时期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文艺活动[M]//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482.
- [6] 吴笛.浙籍翻译家翻译艺术[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32-33.
- [7]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人物辞典:下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1066-1067.
- [8] 罗未央.浙江革命(进步)文化历史文献选编[M].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64
- [9] 佚名.浙东敌后记者补行“九一”纪念会 热烈讨论国际形势 举行各地报纸展览[N].时事简讯,1943-09-11(2).
- [10] 林积昌.刀尖 浙东劲旅英雄事迹纪略[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4.
- [11] 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03-204.
- [1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重庆市委.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大后方工作文献选编:一[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9:455.
- [13] 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宁波文史资料:第14辑 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M].宁波:[出版者不详],1993:135.
- [14] 杨福茂.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东抗日根据地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295.
- [15] 《浙江省新闻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新闻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17.
- [16] 宁树藩.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665.
- [17] 浙东抗日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编纂委员会.浙东抗日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下[M].金华:[出版者不详],1992.
- [18] 栗花落岩.欢迎新同志岩冈文雄君[N].新浙东报,1945-06-13(4).
- [19]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浙东游击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458.
- [20] 中共余姚市委党史研究室.红色四明:中共余姚历史一卷专题集(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丁若时,宁波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创新服务、馆外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 2021-05-14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文献学研究 ·

## 《四库》本《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校勘探微

徐梦瑶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曲阜 273100)

**摘要:**元汪克宽撰《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是后世研究胡安国《春秋传》及《春秋》学的重要著作,其以胡氏为宗,兼采诸家传注之长,疏于其下,为后学所重。此书今存版本可知者有二,最早的版本为元至正八年(1348年)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刻本,其次为《四库全书》本,其中《四库》本源于元建安本,但《四库》本对元建安本有校改,二本异文颇多。《四库》本改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因素,且讹误颇多,远逊于底本,多被后世诟病,但亦有校正底本之功,故不可忽视《四库》本的校勘价值。

**关键词:**《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四库全书》;版本;校勘

**中图分类号:** G256.23      **文献标识码:** A

### A Study on the Emendation of *Chun Qiu Hu Zhuan Fu Lu Zuan Shu* based on *Si Ku Quan Shu*

**Abstract** *Chun Qiu Hu Zhuan Fu Lu Zuan Shu* composed by Wang Kekuan of the Yuan dynasty is vital to the study of Hu Anguo's *Spring and Autumn Biography* and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 book, based on Hu's research and absorbed merits of other researche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following studies. There are two versions of the book, the earlier one is block printed by Liu Shujian of Jian'an Rixintang in the eighth year of the Zhizheng period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other is the one based on *Si Ku Quan Shu*,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Jian'an version. The two versions vary greatly for the later one collated the earlier one. *Si Ku* version has a strong political presence. It is criticized by the following generation as it includes more mistakes. However, we should not neglect the value of collation created by the *Si Ku* version.

**Key words** *Chun Qiu Hu Zhuan Fu Lu Zuan Shu*; *Si Ku Quan Shu*; version; collation

#### 1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概述

胡安国《春秋传》是《春秋》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据《元史·选举制》,元延佑二年(1315年)定科举新制,胡《传》被立为学官,成为开科取士的标准,尊崇胡《传》成为元儒研治《春秋》学时的一种风尚。元末学者汪克宽<sup>①</sup>的《春秋胡传附录纂疏<sup>②</sup>》(以下简称《纂疏》)以阐发胡氏之说为主,兼采诸家传注,疏于其下,是研究胡《传》的重要资料。汪氏自称:

“《春秋》传注无虑数十百家。至子程子始求天理于遗经,作传以明圣人之志,俾大义炳如日星,微辞奥

旨,了然若视诸掌。胡文定公又推广程子之说,著书十余万言,然后圣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于后世……元统甲戌(1334),教导郡斋,讲劄之暇,因阅诸家传注,采摭精语疏于其下,日积月羨,会萃成编。”<sup>[1]8</sup>此书始撰于元统二年(1334年),前附至元四年(1338年)汪泽民<sup>③</sup>序、至正元年(1341年)虞集<sup>④</sup>序,故汪克宽历经七年定著此书。汪克宽在自序中明确了编纂此书的目的:“详注诸国纪年谥号,而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而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说而裨胡《传》之阙遗,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庶几初学者得之,不待遍考全书,而辞义粲然,亦不为无助也。”<sup>[1]9</sup>由此可知,汪氏详注

纪年、谥号等客观事实，列经文同异，于胡《传》基础上，取诸家学说之所长，以使后学明其历代见解，考究经文。

关于其学术价值，《四库全书总目》谓其“然能于胡《传》之说，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于一家之学，亦可云详尽矣。明永乐中，胡广等修《五经大全》……乃全剽克宽此书，原本俱在，可以一一互勘也”<sup>[2]</sup>。此书援引丰富，内容详尽，是研究胡说必不可少的资料，亦为后修《五经大全》提供依据。汪泽民序曰：“遍取诸说之可以发明胡氏者，疏以成编。观其取舍之严，根究之极，明永乐亦精于治经者欤？尝病世之学者，剿尘腐，矜新奇，窃附作者之列奚可哉？德辅学有原委，而纂集之志，思欲羽翼乎？经传可尚也。”<sup>[12]</sup>虞集又序曰：“能取胡氏之说，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类例之始，发而尽究其终，谓之《春秋纂疏》。”<sup>[13]</sup>其门人吴国英称：“先生手编《胡氏传纂疏》，虽一以胡氏为主，而凡三传注疏之要语暨诸儒传注之精义悉附著之，且《胡传》博极群经子史，非博洽者不能知其援据之所自与音读之所当。先生详究精考，一一附注。于是读是经者，不惟足以知胡氏作传之意，而且趋流寻源，亦可识圣人作经之大旨矣。”又称：“不惟诸生获春秋经学之阶梯而凡学者开卷之余，不待旁通远证，事义咸在。是则先生纂疏之述，有功于遗经，而有助于后学，岂曰小补之哉？”<sup>[13]</sup>由此观之，此书详究精考，参酌众说，可窥胡《传》一家之旨，学界对其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故此书在《春秋》学史上尤其在对胡《传》的研究中有独特地位。

对于这样一部重要的著作，学术界却至今没有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本文探讨《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的版本与文字校勘问题，是对该书进行研究的一个尝试。

## 2 《四库全书》本及底本来源

《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本”）《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每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小注双行，字数同，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鱼尾上题“钦定四库全书”，鱼尾下题书名、卷次、叶次。卷首将汪泽民序和虞集序合并，首行顶格题“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原序”，序文顶格。序后有先儒格言、凡例

及汪克宽识语、引用姓氏、卷首（《春秋胡氏传》序、进表、述纲领）。首卷首行顶格题“钦定四库全书”，次行低一格题“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一”，尾题同，第三行低十三格题“元汪克宽撰”，春秋白文顶格起，注文低一格以示区别。

《春秋胡氏传纂疏》<sup>⑤</sup>的最早刻本为元至正八年（1348年）建安刘叔简日新堂<sup>⑥</sup>刻本（以下简称“元建安本”）。今著录为元建安本者有七，经比对，版式行款皆同，实为同版。其一为国家图书馆藏本（A01146），残存14卷，存卷1—6，卷9—14，卷19—20。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小字双行，字数同。“疏”字以墨盖子白文别出，版心小黑口，双鱼尾（鱼尾相随），中间记书名及卷次，下方书叶次。首卷首行顶格题“春秋胡氏传纂疏第一”，卷末尾题“春秋卷第一”，次行低十格题“新安汪克宽学”。卷首汪泽民序有缺损，凡例后镌有“建安刘叔简刊于日新堂”牌记，先儒格言后有吴国英《跋》，吴《跋》落款为“至正八年（1348年）岁在戊子正月人日，紫阳吴国英再拜书”。其余卷首内容与《四库》本同。其二为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藏本。其三为宫内厅书陵部藏本。其四为京都府立综合资料馆藏本。其五为尊经阁文库藏本。其六为2007年北京德宝拍卖有限公司藏本。其七为2018年夏季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藏本。关于是本原委，汪克宽《环谷集·答刘叔简启》中书曰：“愿安承教，用底成功，守约信于末域，有如皦日；寄抄眷之善本，期以明年。”<sup>[4]</sup>表明汪氏与刘叔简定有刻书契约，并望双方信守其约，吴《跋》及“建安刘叔简刊于日新堂”牌记可证双方遵守约定，完成了此书的刻梓，即至正八年（1348年）戊子，此书才得以付梓版行，故此本当为是书初刻。

关于《四库》本底本来源，据《四库全书总目》，《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为“浙江吴玉墀<sup>⑦</sup>家藏本”。考之《四库采进书目》，仅有浙江吴玉墀家进呈过此书，著录：“《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元汪克宽著，二十九本。”<sup>[5]85</sup>又检《四库采进书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载曰：“《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天一阁藏刊本），元新安汪克宽撰。”<sup>[5]242</sup>更检《新编天一阁书目》，《天一阁进呈书目校录·春秋类》著录曰：“《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元汪克宽撰。版本失载。薛编天一阁进呈书目据浙江书录补。”<sup>[6]</sup>由此可知，浙江吴玉墀所呈《春秋胡传附录纂

疏》可能是天一阁藏刊本。今未见天一阁藏刊本，但此书版本可知者有二，一是初刻元建安本，二是《四库》本，故吴玉墀藏本与天一阁藏刊本皆渊源于元建安本，底本当是。

### 3 比勘

今将《四库》本与元建安本（今国家图书馆藏本）<sup>⑧</sup> 文本内容比勘，《四库》本《纂疏》与元建安本异文有370多处，情况复杂，现通过校勘实例说明之。

首先是更改“华夷之辨”内容。“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儒家的基本政治思想，历来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极力推崇，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严格执行，根深蒂固。清朝时，满族统治中原，汉族“攘夷”思想依旧存在，局部的反清活动时时有发生，对政局的稳定并不友好。对此，清代统治者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多采取民族政策，文化上，《四库全书》的编纂亦是其中一项重大文化政策，不仅贯彻了清代民族和睦的理念，也对钳制汉族反抗意识有一定作用。胡《传》充满了浓厚的攘夷思想<sup>⑨</sup>，清代皇帝致力于消除“华夷”的心理隔阂，促进民族团结与统一，巩固统治。四库馆臣编修《四库》时不惜大量篡改原文，该书因其改动高达一百六十余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词语的改动。如“夷狄”改作“外寇”“远人”“外域”“蛮荆”等，具体改动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四库》本《纂疏》将带有“夷”字的词语进行大量改动，以此打压汉族中心主义思想，宣扬满洲取得政权名正言顺，以稳固政局。

二是句子的改写。如《四库》本《纂疏·春秋胡氏传序》第六叶上半叶：“使祸乱相仍莫之”，元建安本作“使夷狄乱华莫之”。《四库》本《纂疏·春秋胡氏传序》第十四叶上半叶：“纵至四边纷扰”，元建安本作“纵至夷狄乱华”。《四库》本卷一第三十二叶下半叶：“中国而自外则外之”，元建安本作“中国而夷狄则狄之”。《四库》本卷一第三十三叶下半叶：“轻信外蕃”，元建安本作“夷狄豺狼”。《四库》本卷一第三十四叶上半叶：“盟逮戎世变之”，元建安本作“戎狄变夷之”。《四库》本卷一第三十四叶上半叶：“不罪乎戎也，其不罪戎者。”元建安本作“不罪夷狄也，不罪夷狄者”。《四库》本卷十一第二十八叶上半叶：“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桓公救中国。桓

表1 “华夷之辨”词语改动详表

元建安本	《四库》本	次数
夷狄、华夷、蛮夷	蛮荆、荆蛮	15
夷狄、戎狄	外域	11
夷狄、华夷、蛮夷	楚人	9
夷狄、华夷	中外	7
夷狄	楚、强楚、吴楚	7
夷狄	狂僭、僭乱	4
夷狄、戎夷、外夷	狄人、戎人	4
夷狄	外寇	3
夷狄、四夷	外寇	3
夷狄	荆楚	3
夷狄	简书	2
夷狄、夷夏	列国	2
夷狄	中夏	2
夷夏	天下、内外	2
夷狄	楚子、君子	2
狄	外	2
四夷	四远、其国	2
夷狄、蛮夷	南蛮、蛮荒	2
夷狄	微国	1
夷狄	僭窃	1
夷狄	外国	1
外夷	外蕃	1
夷狄	远人	1
夷狄	羌氏	1
夷狄	蕃服	1
夷	荆	1

公救中国，而卒帖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元建安本与《公羊传》文本同曰：“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元本保留《春秋》中带有贬斥“夷狄”的句子，《四库》本对其径改，或有删漏，句意稍有不同，或感情色彩有异，与《春秋》之法谨严的一面相悖。类例颇多，不尽举。

三是大段的删减。如《四库》本卷二第四十五叶上半叶删掉了原本中：“啖氏曰：‘公羊曰：“其曰伐大之也，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其书戎狄侵罚城入，岂皆是之乎？穀梁曰：“戎者，卫也。”若实卫伐改曰戎是为卫掩恶，何以惩劝乎？’”啖氏认为少数民族侵占中国一事有违“春秋大义”，应当批判，元本保留此说，不仅是遵从《春秋》之本意，亦是个人感情色彩与态度的体现。《四库》本此处大段删减，丝毫不见底

本原貌，虽在版本学上犯了大忌，却正是清代统治者宣扬政权合法性，消弥汉人反清情绪的体现。

以上改动主要出于政治目的，《四库》本在编纂时刻意消除旧有典籍中任何对少数民族特别是满族不利的因素，此书之删改颇为明显。

其次是异体字或通假字，如伯通霸、觉与竟、举与举、辞与辞、虫与虫、鄱阳与番禺<sup>⑩</sup>等。由于时代相差，同字异体也是正常的。

最后是刊刻疏忽之误。《四库》本《纂疏》错误百出，讹误、倒文、衍文、脱文上百处，今通过校勘实例分析《四库》本的误脱衍倒等问题：

(1)《四库》本讹误。《四库》本讹误有八十余处，今举数例以明之。

①《四库》本卷一第二十一叶下半叶“五命以申天子之禁”之“申”字，元建安本作“备”。据《春秋谷梁传》：“为见天子之禁，故备之也。”<sup>[7]</sup>当以“备”为是。

②《四库》本卷一第二十四叶上半叶：“武帝令助谕南越，王还，又谕淮南王与之相结而还。”“王还”，元建安本作“助还”。按：此句源自《汉书·严助传》中严助谕意淮南王一事，先闽王伏辜，后南越被泽。大意为：汉武帝命令严助到南越传达天子旨意，严助回来后，又命令严助向南越王传达与其共同返回的旨意。“王还”文义不通，当依元建安本作“助还”。

③《四库》本卷五第十九叶上半叶：“委裘，若容衣，太子幼，未坐朝。”“太子”，元建安本作“天子”。按：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委裘，出自《吕氏春秋·察贤》：“天下之贤主，岂必苦形愁虑哉？执其要而已矣……故曰尧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sup>[8]</sup>指君主任贤举能。除此之外，“委裘”还有以下两种解释：一是旧谓帝位虚设，唯置故君遗衣于座而受朝。二指幼君在位。因幼君不胜礼服，坐朝则委裘于地。此句显为幼君在位之意。以等级论，古代天子和太子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天子是皇帝的称谓，太子是皇帝继承人的正式封号，二者不可混淆。“坐朝”意为君主临朝听政，太子虽为储君，却非正式君主，不能“坐朝”，当依元建安本作“天子”为是。

④《四库》本卷六第三十二叶下半叶“如商鞅立二丈之木于国都南门”之“二”字，元建安本作“三”，今检《史记·商君列传》原文为：“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之南门。”<sup>[9]</sup>当以元建安本作“三”，《四库》本作

“二”乃形误。

(2)《四库》本倒文。《四库》本卷二第一叶上半叶：“诸侯土地有所受伐之，其罪大矣，而夺取其土。”元建安本书曰：“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夺取其土。”按：成书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的《春秋大全》与元建安本同，又据其文义，“受之伐”中的“之”字作代词为宜，《四库》本作“伐之”，属于倒文，当据元建安本乙正为“之伐”。且《四库》本倒文的同时，误把“其罪”衍作“其罪大矣”。

(3)《四库》本衍文。《四库》本衍文三处（含上文提“其罪大矣”一例）。现举其余二例于其下。

①《四库》本卷一第三十二叶上半叶：“先君征戎而已，乃与之歃血约盟，可谓宜乎？”元建安本无“血约”。

②《四库》本卷六第四十四叶下半叶：“讨贼之责不在于鲁也。”元建安本无此句。

某些衍文不影响义，归入下文“妄加润色”部分。

(4)《四库》本脱文。《四库》本脱文近十处，今举三例以明之。

①《四库》本卷二第二十四叶下半叶：“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祭享之所。”“祭享之所”下，元建安本有“孔氏疏”三字。

②《四库》本卷二第三十七叶下半叶：“其不名公羊，谓微国也。”“微国也”下，元建安本有：“穀梁谓狄道也，按附庸及真夷狄皆有名况”十七字。

③《四库》本卷十二第四十一叶上半叶“《公羊传》”下，元建安本有“孰执之？楚子执。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二十一字。

(5)《四库》本妄加润色。《四库》本妄加润色三处，今列于其下。

①《四库》本卷一第六叶下半叶：“定之比宣，则又有间焉矣。”元建安本无“焉”。

②《四库》本卷一第十二叶上半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者也。”元建安本无“也”。

③《四库》本卷十三第二叶上半叶“或陆氏曰”，元建安本无“或”。

以上诸例，另有类似情况近十处，不尽举。此部分对原本文句稍加润色，虽不改文义，确是古籍整理所不允许的，当遵原本。

值得注意的是，《四库》本虽讹误颇多，但也有厘正之处，这是四库馆臣的校勘贡献，当加以珍惜。据统

计,《四库》本校改元建安本二十余处,今举例说明之:

①《四库》本卷二第三十五叶上半叶:“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一”,元建安本作“二”。据《春秋公羊传》原文,当作“一”;且此句反映的是春秋战国的“媵妾制”,诸侯一聘九女,据史亦从“一”,当依《四库》本作“一”。

②《四库》本卷四第三十八叶下半叶:“秦始皇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驰骋弋猎之娱。”元建安本无“百”。据《汉书》:“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sup>[10]</sup>当依《四库》本作“千八百国”为是。

③《四库》本卷十三第二叶上半叶:“其以嘉服见,则丧礼未毕。其以丧服见,是重受吊也。”“礼”,元建安本作“服”。检《左传》原文,当作“礼”。此处为馆臣改正底本之误。

当然,亦有元建安本与《四库》本各异且讹者,如

《四库》本卷五第二十三叶上半叶:“杜氏曰:‘穀国在南乡宜阳县北。’”“宜阳”,元建安本作“统阳”。检之杜预注,作“筑阳”,又考之地理,亦从,故“宜阳”“统阳”皆误。这一情况显示了版本校勘的复杂性。

#### 4 结语

综上,今存《纂疏》版本有二,元建安本刊刻时间最早,其后有出自元建安本的《四库》本,二本异文较多。《四库》本受政治因素影响,有目的地对建安本“华夷之辨”内容进行大量改动,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词语的改动,二是句子的改写,三是大段的删减。《四库》本讹误颇多,包括讹误、倒文、衍文、脱文、妄加润色,多被后世诟病,但对元建安本有所校正。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对《春秋》学研究和胡《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却没有一部校注本,无不是一缺憾。对于古籍整理工作者来说,如整理、研究《纂疏》一书,《四库》本是不能不校的。

#### 注释:

- ① 汪克宽(1301—1369年),字德辅,号环谷,祁门县城南乡桃墅(今属塔坊)人。元末明初理学家、教育家。著有《环谷集》《诗集传音义会通》《程朱易传义音考》《春秋经传附录纂疏》等。
- ② “纂疏”是以某一经为主,荟萃诸家之言,并附以己意。“附录纂疏”就是“先把朱熹文集、语录中涉及经学的文字附录在相关经文之下,然后把诸儒之说之合于朱子的纂疏于附录之后,使后学能轻松得窥朱子与历代学者的见解与心得……元代新安经学家最擅长此种体例。详见刘成群:《“附录纂疏”体经学著作与“四书五经大全”的纂修——以元代新安经学为叙述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3期。
- ③ 汪泽民(1285—1355年),字叔志,江西婺源人。宋端明殿学士汪藻七世孙。延佑五年(1318年)登进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累官至礼部尚书。汪泽民为汪克宽祖叔。
- ④ 虞集(1272—1348年),字伯生,号道园,世称邵庵先生。祖籍成都仁寿(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临川崇仁(今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人。元朝官员、学者、诗人,南宋左丞相虞允文五世孙。
- ⑤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元本书名与汪泽民序称其《春秋胡氏传纂疏》,卷次部分皆称为“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二者皆可。且《四库全书》改书名情况较为常见,不足为疑。
- ⑥ 刘锦文,字叔简,元代建阳人。日新堂是刘锦文的书坊名,为建阳刻书名坊。自元迄明代中叶,刻书甚多,有宋王宗传《童溪先生易传》30卷,元赵沔《春秋金钥匙》1卷等数种。
- ⑦ 吴玉璠(1737—1817年),字兰陵,号山谷,清浙江钱塘人。清藏书家。乾隆庚寅(1770年)顺天举人,历官贵阳府长寨同知,家富藏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诏征遗书,他检“绣谷亭”“瓶花斋”所藏图书进呈,计经部图书90余种,史部20余部,子部30余部,集部305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其家藏152种。
- ⑧ 元建安本《春秋胡氏传纂疏》卷9—10、卷19—20多有漫漶,暂不计入。

(下转第96页)

· 文献学研究 ·

## 方苞集外诗文六篇考释\*

任雪山

(合肥学院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

**摘要:**《方苞集》出版以来,学界不断有集外诗文发现。今在前人增补之外,发现六篇佚文。通过文献考辨,确定为方苞所撰,并可与方苞生平资料相互补充印证。其内容涉及曾巩、方以智、姜櫛、宋廷魁、尹会一等人,对于研究方苞的人生游历、理论观点和思想主张都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方苞;佚文;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G256.3 **文献标识码:**A

## A Textual Research on Six Articles of Fang Bao besides Fang Bao's Collected Works

**Abstract** Since *Fang Bao's Collected Works* was published, new articles have been found by scholars. In addition to the previous supplement, six articles have been discovered. After literature research, it is sure that the articles were written by Fang Bao. The six articles can be mutually supplemented with materials about Fang Bao's life. The content involves, among others, Zeng Gong, Fang Yizhi, Jiang Su, Song Tingkui, Yin Huiyi. They are critical for the study of Fang Bao's life, theoretical views and ideological propositions.

**Key words** Fang Bao; lost article; Tongcheng School

方苞(1668—1749年)为桐城派三祖,清代著名文学家,理学名臣,其学精于《三礼》《春秋》。由于各种原因,方苞不少文章没有收入其诗文全集,殊为遗憾。笔者近来查阅清代文献资料,发现方苞佚文六篇,为刘季高校点的《方苞集》、徐天祥和陈蕾点校的《方望溪遗集》、彭林和严佐之新编的《方苞全集》所未收,也与学界新发现的佚文不同<sup>①</sup>。内容涉及曾巩、方以智、尹会一、姜櫛等人,对了解方苞、桐城派以及清代文学发展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现叙录如下,并加以考释,以备研究之用。

## 1 隐玉斋

前贤读书地,古迹久湮埋。空过中禅寺,谁知隐玉斋?

径荒碑复没,地胜境仍佳。经眼重新日,游观澹客怀。

这首五言律诗见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杨受廷修、马汝舟纂的《如皋县志》卷二十一《艺文志二》,题名“隐玉斋”。隐玉斋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1019—1083年)的读书旧地。宋明道元年(1032年),曾巩之父曾易占出任泰州如皋知县,14岁的曾巩随父至如皋,在中禅寺寄读。多年之后,曾易占幼子曾肇知泰州,来到如皋中禅寺,触景生情,题字“隐玉斋”,寄托对亡故父兄的深情。方苞何时到中禅寺,已无从知晓。但曾肇对父兄的感情,以及曾巩古文,一定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方苞与清代学术研究”(项目编号:20BZW1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方苞年谱长编及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9YJA751032)的研究成果之一。

都曾在方苞心中掀起波澜，不能看出，方苞对唐宋八大家之曾巩的推崇。

该诗的另一层意涵或与明遗民有关。隐玉斋并非一处独立所在，而是位于如皋水绘园内。水绘园始建于明万历年间，为如皋冒氏别业，后经冒襄修整完善。冒襄（1611—1693年），字辟疆，号巢民，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明末四公子”，入清不仕，长期隐居故园，同遗民诗酒唱和。方苞之父方仲舒，一生不仕清廷，亦与遗民常相往还，方苞耳濡目染，“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sup>[1174]</sup>，因此在《方苞集》中，提到冒襄时多有推崇之意，在《释兰谷传》中更言及冒襄结社之事。此外，与方苞家族三代关系密切的遗民杜濬，与冒襄颇有往来，并有多首诗描写水绘园。因此，方苞途径此地，其心中的“前贤”与“胜境”，应该不止是遥远的曾巩，还有眼前的冒襄，以及江南遗民往事。

## 2 方以智小传

先叔祖文忠公，讳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前明崇禎庚辰进士。弱冠负盛名，与云间陈子龙投分最久，复社诸公皆以声气名节相推尚。释褐时，贞述公抚楚，忤时相，被逮下狱，具疏请代。上称其孝，冤明白。甲申南奔，仇慙柄国，遂流离岭表，出世外。尝被縶，环以白刃，终不屈。晚乃遁迹匡庐、青原间，从游士称无可大师，更号药地。叠逢患难，谈笑自如。卒于万安，归葬浮渡。所著有《通雅》、《炮庄》、《物理小识》、《鼎薪》、《浮山》诗文集数十种行世。谥文忠。江子长先生尝称为“四真子”云，盖谓真孝子、真忠臣、真才子、真佛祖也。此幅乃为摄山山峰张白云先生作也，笔墨高古绝伦，藏之名山，得垂不朽，亦幸矣哉。康熙壬午秋日，族孙苞谨识。

方以智（1611—1671年），字密之，桐城人，“明季四公子”之一，明遗民的标志人物。此文为方苞给方以智《无可和尚截断红尘圆轴》的画外题跋。画作见于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至乐楼藏明遗民书画》中。此文创作时间为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方苞时年34岁。方苞与方以智同属于桐城桂林方氏，而且崇禎七年（1634年）桐城民变之后，方以智与方苞曾祖方象乾等迁往南京，两家时有往来。

表面上看，此文只是题跋，实则为一篇完整的方

以智小传，叙述了方以智传奇的一生，表达了方苞对方以智声名气节的推崇，有着极重要的学术价值。余英时在《方以智晚节考》中曾提及方苞此文，他主要是以方苞与方以智家族的亲近关系来辅助论证“方以智病死说”之不可信<sup>[2]</sup>。任道斌在《方以智年谱》也提及此篇题跋，他认为方苞“年青时颇具反清思想”<sup>[3]</sup>。饶宗颐素重方以智，在撰文讨论遗民画时，专门考证此跋语：“白云即张怡，字瑶星，张大风即其仲也。怡与程端伯书尝言及《白云砦图》事迹。望溪集卷八有《白云先生传》。”<sup>[4]</sup>三位先生在论及方苞题跋时，皆关涉明遗民问题，由此观之，此文不仅揭示方苞与方以智的关系，也表现了方苞对明遗民的文化认同，对于评价方苞的出处态度及其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皆有启示意义。

## 3 琅屿姜公传

公讳宗吕，太原保德人，赠特进荣录大夫，右都督讳名武之子也。都督以武功显于边疆，而使公治文术。颖悟绝人，受书一见，辄了大意。沉毅有干略，自都督及旅属、乡人、宾客，见者皆谓于世将有大造也。方是时，贼势益张，内外以文法相遁，而武臣拥劲兵者，多放鹜持两端。都督平居慨慷，誓致死礼以报国。公常泣谏，以谓一人致死不足以支国势之倾坏，而诸季方稚弱，世乱将何依。都督曰：“吾自计已审，且汝在，吾何忧。”崇禎十五年春，保定总督杨公文岳，部诸将会援开封。朝命尚书侯恂驻河上，以致左良玉诸镇兵皆壁朱仙镇。良玉夜半放兵大噪，诸营皆溃。都督血战力尽以死。时公年二十有二，闻变，独身前求父尸。既至，无息耗，遂诣阙上书请恤。或自贼中来言，都督被执，骂贼不屈，至柳树坡齧磔以死，公闻复往。先是贼决河水灌开封，城尽没，白骨被野，聚落无鸡鸣，而公往返数四无所怖。公干躯伟杰，膂力过人，善骑射，督帅杨公奇焉，欲疏请以公续父职，公以母老弟弱力辞不就。于杨公所得都督故衣，招魂以还。而前上书所得恤典，不应法，复诣阙上书以讼，未得命，闻贼警遽，归视母弟，甫至家，而太原等郡邑已陷矣。逾月国变。公家居，诵书史，课群季。戊子举于乡，而其冬姜襄反大同，州守备牛化麟杀守，据城以应之，与官兵相持逾年。而公在危城中，贼以公为州人之望，屡为卑礼甘辞以致公，公不为动。久之贼怒，一日坐泽宫，陈剑铍阶除下，迫

公与孝廉陈大谟、诸生王宗本、张射斗。至盛怒，将加害。公前诘之，气扬扬如平常。贼忽阻丧，手足动摇，口啜嚅不能出声，久之曰：“无他事，军无粮，欲与诸君共计之耳。”公遽率众以退。越日，贼独召张，杀之。贼校有妖言以媚贼者曰：“吾梦神人告我，城中有三直臣，得之大事可济。”贼曰：“必某也。”因就公强受职。公曰：“神有命，宜卜于神。”使贼遍书邑中士人名数十，告于神，而筮取之，所得乃庸妄。贼遂止。及兵渡河，城破论罪，凡受伪职及乡兵从吏令者，皆坐诛。而公与陈、王诸族，独得免。陈、王每语人曰：“方陷贼中，吾曹实不知所为？恃姜君多智略，与为向背，今得全宗党，皆姜君力也。”或问：“何恃不恐？”公曰：“吾料避就皆死，义不可昧，而贼无定情，悦以赂遗，御以术数，或可于死中得生，故也。”由是，征西大帅无不啧啧奇公才，州人与守丞皆重焉。每编审及州郡有大事，必咨于公。公开陈，悉得其条理。以己亥成进士，丙午当选期，丁母忧。己酉授潍县令，未之官竟卒。公爱诸弟，同居食，食口数十人。辛卯岁大寝，戚属贫无依者，皆待公举火。先业荡尽，是后常客游，或贷于州人以治饘。及公之歿，遗负数千金，而家居与诸弟未尝有一食之离也。公未举进士时，就教石楼邑子弟，经公指画，文章皆有法度。诸弟及子未尝有师承公之学，皆以文艺知名于时。公为文淳古朴厚，得汉人气体。其请都督恤典前后二疏，皆卓然可传久远。有《癯癯斋文集》十卷藏于家。

赞曰：百年之木，必于牺尊。天能生材而不能使之不枉，岂非理之不可诘者欤！观公之蒙难艰贞，履虎尾而不啮，以当天下国家之变，其功谋可胜道哉。然竟不得效于一官以死，惜也。古人有言，颜子终日不违如愚人，未尝施于事，多见于言辞，而自古以为不可及。然则公之逾远而存者，何必以功名显哉！

此文见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王克昌修、殷梦高纂的《保德州志》卷十《艺文上》。文中所言“琅屿姜公”，即姜宗吕，字琅玕，山西保德人，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年）进士，康熙八年己酉（1669年）授潍县知县，未赴任卒于家。其父姜名武，字我扬，天启二年（1622年）科举武举人，授大同威远守备，累迁通州副总兵。崇祯十五年（1642年），随杨文岳援开封，与李自成军激战，不屈而死，赠特进荣禄大夫、右都督。姜名武有四子：宗吕、祚吕、师吕、述吕，宗吕为其长。姜宗吕有子栩、櫛、榛，姜櫛为方苞乡试座师，此传应受姜櫛所请而作。

此文创作时间，并不言明。按，方苞与姜櫛结识的时间，据《吏部侍郎姜公墓表》记载：“余始见公于督学宛平高公使院”<sup>[1][34]</sup>，而高裔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督学江南，可知二人结识应当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之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姜櫛为江南乡试副考官，方苞中举为解元，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姜櫛去世。因此，此文最有可能在康熙三十八年与四十三年之间（1699—1704年）。又按，姜櫛当年亦请万斯同（1638—1702年）、王源（1648—1710年）为其祖姜名武作传，万斯同、王源皆为方苞好友，或许他们在大致相近的时间接受姜櫛之请，因此可以推断，方苞此文写作时间当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前后。

此文的意义，一方面固然是表达方苞与座师姜櫛的师徒感情；另一方面也表达对明末战争以及明朝灭亡的看法。方苞在多篇文章讨论明亡问题，认为其最主要原因是奸臣当道、忠臣搁置和良将败死<sup>②</sup>，而此文写的姜名武正是明末的一位忠臣良将，参与多次大的战事，尤其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明军与李自成的开封之战。与其他文章不同，方苞此文认为明军失败主要是因为“武臣拥劲兵者，多放鹜持两端”，具体来说，就是总兵左良玉心持两端，不肯作战，终致败绩，这与好友万斯同、王源为姜名武作传时所持观点一致，可见为时人比较普遍的看法。此外，文章还对李自成军掘开黄河、水淹开封的后果进行了生动描述：“先是贼决河水灌开封，城尽没，白骨被野，聚落无鸡鸣，而公往返数四无所怖”，对其给百姓造成的伤害持批判态度。

从文章写作技法来看，此文亦为方苞义法理论践行的典范。方苞所言“义”就是言有物，“法”是言有序，其中“义”是基础，“法”随“义”变，同时对“义”也产生反作用。苞文中抒写姜宗吕天生之才而不能用的悲壮，文章通过其在两次战乱中的不凡表现，彰显其优于常人的卓越才华与能力，本应大展抱负用于世，不料想未赴任而卒，让人感叹唏嘘。更为悲壮的是，姜氏一家三代，几乎都是如此命运，从姜名武到姜宗吕再到姜櫛，概莫能外。虽然原因有所不同，但皆才华出众，英年早逝。本来这类事情的解释，极易落入怨天尤人或宿命论的漩涡，但方苞却给以积极的回应，以颜回超越事功、立于言辞的范例予以开解，既表现他作为士人受儒家淑世情怀的影响，也表

现他作为文学家以辞章立命的抱负。

#### 4 介山记序

向尝职掌翰林院，时文之暇，未尝不课及于诸君子之诗词曲调，而无如其气骨之不古朴，词义之不新惊也。至欲求其以风华之笔，发潜德之光，而且出入于骚人韵士之心坎间者，益空谷足音矣。盖近日非无院本，而其中无一段精光不可磨灭之气，是犹取隔宿之尘羹，以充新饥者之空腹，鲜有不出吐者。偶值三晋松崖世兄以其夙搆之诗词，请质于余，余亦嫌其陈腐。而世兄遂道及三晋有《介山记》之一书者，乃西河竹溪氏宋子所作也，大义阐介推之廉静，而绘以新声，“此从未经人道者也，先生岂犹以陈腐目之耶？”余闻其名、想其义，不禁改容曰：“此书之号果新惊矣。但恨未窥半豹。子归，为余购访之。”乃世兄还定羌，不数月而已登鬼录。呜呼！《薤露》《蒿里》倏忽百变，故人长逝可胜浩叹！因想前言，不禁出涕。然言虽在耳，料其付之东流矣。不意余解组后，卧泣西风，而忽来世兄之遗札，并所称《介山记》全稿以惠余，余始知世兄之不寡信轻诺，而种意骚坛也。睹物怀人，苍凉何似第。余病沉疴，不能仰视，因命书奴为余朗诵，则见其修词立格，亦不出元明诸家之藩篱。而其词义新惊，则实是有一段精光不可磨灭之气。余因口跋数语，命童子录之，并回札附去，一以答泉下人依恋之意，一以鼓后进者激昂之才。虽余墓木将拱，不及见此书之流传海内也，而亦何伤焉。古吴方苞望溪氏题于集贤斋之东轩。

此文见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刻本《介山记》之首，署名方苞望溪序。据文中“向尝职掌翰林院”“不意余解组后”等数语，可推此文作于方苞致仕之后，查苏惇元《方苞年谱》知，方苞于乾隆七年（1742年）四月辞官归金陵，因之，此文应作于乾隆七年（1742年）或稍后。

《介山记》为清代一部优秀的传奇剧作。作者宋廷魁，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山西介休人，少有隼才，未获功名，著有《竹溪诗文集》。《介山记》为其代表剧作，时人称赞“卓乎其关（汉卿）汤（显祖）之再生，而不朽之慧业也”（卷首李文炳序）。该剧以春秋名士介子推为原型，书写了介子推随晋文公重耳出亡十九年，后协助其灭奸复国，最终隐居绵山的故事，着重歌颂了介子推忠孝廉义、不慕名利的高贵节操。

从现有文献看，方苞与宋廷魁并无直接往来，从文中信息可知，主要是通过“三晋松崖世兄”相识。

“三晋松崖世兄”为何许人？在《介山记》卷首，有署名“定羌姜基松崖氏拜题”的题诗一首，由此可知，“三晋松崖世兄”即山西定羌（保德）人姜基。关于姜基与方苞的关系，有人称姜基为姜櫛的族人<sup>[5]</sup>。姜櫛（1647—1704年），字仲端，号昆麓，山西保德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为江南乡试副考官，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工部右侍郎迁吏部左侍郎，未几病卒，方苞撰有《吏部侍郎姜公墓表》。古代一般称主考官为座师、同考官为房师，而座师、房师之子为世兄。姜櫛为方苞乡试座师，松崖世兄姜基应为其子，但从《方苞集》《介休县志》《保德州志》《山西通志》等文献未发现直接证据。方苞的《吏部侍郎姜公墓表》和仇兆鳌的《姜昆麓先生墓志铭》都提及姜櫛有一子姜宏焯，不知与姜基是否为同一人，抑或有其他子，皆未详。

赵景瑜称方苞“不完全重视小说、戏曲的作用，因而评价未能批郢导窾，抓住要害”<sup>[6]</sup>，此言不确！方苞序文明确称其“未尝不课及于诸君子之诗词曲调”，只是方苞文名太盛，而戏曲方面留下的文字又少，但不难因此就推论方苞评价未能“抓住要害”。其实，此文的学术价值，除了体现方苞的人生与交游而外，恰恰在于，它是方苞现存的唯一戏剧评论，表现了方苞的戏剧理论。方苞称该剧“其修词立格，亦不出元明诸家之藩篱。而其词义新惊，则实是有一段精光不可磨灭之气”。这里方苞提到两个戏剧评价标准：一是“修词立格”；二是“精光不可磨灭之气”，前者属于言语层面，后者属于意蕴层面，特别是以气论文，尤为重要，它是对前人相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明代公安派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评徐渭：“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sup>[7]</sup>唐宋派古文家唐顺之在《答茅鹿门知县二》一文提出，宇宙中之绝好文字莫不出于“本色”，本色之文“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sup>[8]</sup>。由此可见，“精光”与“不可磨灭之气”正是前人论文之法，尤其是方苞推崇的唐宋派古文家的创见。方苞的意义在于，把两者结合，用来评价戏曲，并作为艺术的最高标准，而实现这一标准的方法，即“以风华之笔，发潜德之光，而且出入于骚人韵士之心坎间”。可以说，“神气”论是方苞“义法”论之外的又一贡献，并且

在桐城派得以发扬光大,后来刘大魁、姚鼐等人皆有相近主张。

## 5 致尹嘉铨书

贤尊年谱,汎览一过。付儿兴,授以指意,使删截大体不失。乃命孙辈,别录一稿。老生再阅读一过,又截去字句冗设者,可以信今传后矣!大概此本所删,原本中更无应补,如论学语,当入语类,不宜多入谱也。闲尊孝德纯全,居官多善政而无过行。虽未尝特治一经,以精神日力为官事所夺耳。前年过我,告以功令不得与绅士见曰:“某计之熟矣!万一有弹奏,则某明奏愿罢官,从先生学礼。”此种心胸,非今人中所有贤。若能以老生所阅定制仪礼注疏,并所学析疑抄本,编为一书,择贤尊所订丧祭之礼纂入,与安溪、高安、张尔岐、李耜卿之说并存,乃继志述事之大者。愚自入夏,气息奄奄,念惟贤性质笃厚,可读古圣贤书,老生未竟之业将有望焉。乾隆十四年四月十七日期望溪笔。

此信见于《尹健余先生年谱》之首。该年谱为光绪五年(1879年)谦德堂刻《畿辅丛书》本,后来的版本将这封信移除了。尹嘉铨(1711—1782年),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尹会一之子。尹会一(1691—1748年),字元孚,号健余,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历任吏部主事、扬州知府、河南巡抚等职,乾隆十一年(1746年)授工部侍郎、督江苏学政,十二年(1747年)造访方苞,执弟子礼。

方苞与尹会一皆为清代著名庙堂理学家,二人晚年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尹会一早方苞一年去世,这封信为方苞去世前几个月而写,主要讨论尹会一年谱的编修以及从学三礼等问题。方苞的意见应该很重要,年谱出版时署名方苞审定。

从信札可以看出,方苞与尹会一家族两代人的深厚情谊,同时还揭示了方苞对清初礼学的观念,他希望自己的三礼学作品,能够与“安溪(李光地)、高安(朱轼)、张尔岐、李耜卿(李光坡)”诸人之说并列于世。

## 6 尹太夫人年谱序

自古非常之人,元德、显功、奇节见于本传,未尝别有谱。盖德与功惟要其成,节见于一时一事,欲编年

而谱之,无以举其辞。下逮唐宋诗人文士之尤著者,后人好其文辞,就集中所云,按其身所经历,序次其年月,而于人心世教非有所关,则其于言也为赘矣。惟伊川程子、考亭朱子历年多而或出或处,一言一动皆可为学者法。故伊川则朱子谱之朱子则蔡仲默谱之义法,盖取诸孔子世家而可以兴起乎百世者也。自古女妇,虽有圣德,列于风雅,播诸乐歌,用之闺门、乡党、邦国,以化天下,而未尝特为记传。盖以阴德女教,具载内则,虽善尽美备,而辞事皆同。故韩欧诸家,凡志妇人,第条次、族姓、生卒,及夫与子仕隐、学行,而约略其风徽,以为之铭。若志稍详,则铭更略,此立言之体要也。博野尹副宪会一之母李太夫人,为女为妇为嫠笃孝苦节,既可为女妇师。而自会一贵盛守官行政弥珍济艰,凡大事太夫人必为经画,授以节制,其禄赐非请命子妇不得取锱铢,而办尽于官中,以恤军振穷,建桥梁设津渡,为民长利,半以付族姻且义仓义学,以裕乡人,教邑之子弟。凡所为皆士大夫之事,而非女妇之事也。又其高识远见,更有士大夫所不能及者。故其生也,余既以入闻见录,卒铭其墓。而会一谱之,以质于余。以志与录皆举其大略,不能每事而详之也。事有古人未尝有而可以义起者,其此类也。夫故特为序论,兼著传、谱、志、铭之源流,俾士大夫据高位、持厚禄以终其身,而无一可称,其子孙徒志其官阶、锡命、恩赐以为荣,或构虚述、饰浮言,以益人之诟病者,知所愧耻,岂唯女妇宜闻而兴起与?乾隆十年冬十有二月桐城方苞撰。

此文见于《尹太夫人年谱》之首,署名方苞。该年谱与《方望溪先生年谱》一起收录在1999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9册,之前学界罕有提及。

尹太夫人为尹会一之母,此文作于乾隆十年(1745年),为方苞致仕以后,属于晚年作品。尹会一曾就家谱之事求教于方苞,方苞建议其母亲之事不宜详载家谱,“而仆谓宜为年谱者”<sup>[9]</sup>。古代为女子作年谱,实属罕见,方苞此举有开创意义,后来尹会一采纳了方苞的意见,确为其母作年谱,请方苞为之序,也就再顺理成章不过了。序文内容对了解中国古代年谱理论与女性的关系,以及方苞对女德女教的看法,皆有一定价值。此文后世颇有影响,被节选收录在民国《嘉业堂丛书》所收蔡显的《闲渔闲闲录》卷三。蔡显(1697—1767年),字景真,号闲渔,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雍正七年(1729年)举人。《闲渔闲闲

录》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刻成,蔡氏因记载南山集案、钱名世案等被告发处斩。该书多记传闻,而此信却为作者亲见。

在该年谱方苞序之后,还附录了方苞一篇短文《论编年谱书》,其内容如下:

得手教,一切具悉。为母编年谱,古未之有;而太夫人志事与贤士大夫略同,乃妇女中特出之人,不惟今世希闻,即在古亦罕见。则孝子创例以为世法,播流海内,可兴可观;人不能訾也。如苦窳艰时事,皆琐细不可条举。则总计家道息耗、人事凶吉改移,或数年或十数年而括之曰:太夫人于是年几何矣。此史记、孔子世家义法也。略者略之,详者详之,唐宋名贤年谱多如此,

不必以前事简略为嫌也。望溪方苞白。

此文在恩露所藏方苞逸文集名为《答尹元孚》,后收录在戴钧衡编纂的《方苞集·集外文》。综合这两篇文章,结合上一篇《致尹嘉铨书》,可以大致见出方苞的年谱理论,即:一是以义法为指导。二是注重人心世教。三是年谱与传铭、语类不同,传铭举其大,年谱叙其详,语类重其学。四是男女两性平等。年谱内容只看事迹,不唯性别。当然,方尹两家关系好、彼此了解也是写作的基本背景。

综上所述,通过方苞的六篇佚文,展示了方苞人生与文章的不同方面,对于了解方苞的家族关系、人生游历、文章创作和理论主张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注释:

- ① 比如:钟扬,顾海.则桐城《戴氏宗谱》中戴名世、方苞佚文两[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2):37-40;袁麟.方苞佚札六通考释[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9(1):104-109;朱春洁.稀见明清诗文辑考六则[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50-56(内含一篇方苞逸文)。
- ② 《方苞集》中讨论明代灭亡问题比较集中的篇章,比如《书卢象晋传后》《书杨维斗先生传后》《书泾阳王金事家传后》等,基本观点如是。

#### 参考文献:

- [1] 方苞.方苞集[M].刘季高,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2]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M].北京:三联书店,2012:103.
- [3] 任道斌.方以智年谱[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288.
- [4] 饶宗颐.至乐楼藏明遗民书画[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75:简介.
- [5] 杨挺.清宋廷魁《介山记》传奇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2:45.
- [6] 赵景瑜.宋廷魁及其《介山记》[J].山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79(4):27.
- [7] 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M].钱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16.
- [8] 唐顺之.唐荆川文集:卷七[M].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刻本.明万历.上海涵芬楼藏.
- [9] 方苞.方望溪遗集[M].徐天祥,陈蕾,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4:58.

作者简介:任雪山,合肥学院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清代文学与文献。

收稿日期:2021-10-28

本文责编:李芳

· 书评 ·

## 信息分化研究的新图景：评《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与分化研究》的研究贡献

刘姝贤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南开大学樊振佳副教授所著《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与分化研究》一书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了当今社会的信息不平等和分化现象。作者基于整体性、以人为核心和关注效益的视角探究信息分化实质，构建了富有创新性的信息能力的概念、框架以及信息能力一般模型，提出了具有自主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能力改善对策，拓展了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信息能力和信息分化研究的理论空间，既为信息分化治理提供了新的应对思路，也为信息分化研究描绘了新的图景。

**关键词：**信息分化；信息能力；新生代农民工；书评

**中图分类号：**G202；G250      **文献标识码：**A

### New Prospect of Digital Divide Research: Comments on the Contribution of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Digital Divide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bstract**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Digital Divide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ritten by Associate Professor Fan Zhenjia from Nankai University, take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information inequality and digital divide in today's society.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essence of digital divide from a holistic, human-centered and profit-focused perspective, constructs an innovative concept, framework and general model of information capability, and puts forward independent,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capabil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is book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space of the research on information ability and digital divide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It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way to deal with the resolution of digital divide, but also creates a new prospect for digital divide research.

**Key words** digital divide; information capability;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 book review

信息社会的各种问题是图书馆学情报学(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简称LIS)学科一大研究重点与热点,其中对信息分化和贫困问题的关注始于信息社会发展初期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长期的研究中被赋予了非常丰富的内涵,“信息分化”和“信息贫困”成为“表达人们在信息拥有(包括信息内容和信息设施的拥有)、信息查询、信息吸收和利用等方面综合差距和匮乏状态的概念”,并与“信息控制”“信息剥夺”“信息平等”“社会公正”等概念在语义上有

着紧密关联<sup>[1]</sup>。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对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有着关键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蕴含着代际概念之外,还包含‘农民工’这一社会阶层概念的限定性,是阶层群体+年龄群体的概念。”<sup>[2]</sup>这一群体无论是从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来审视,还是从代际差异的角度来观察,都具有“信息分化”的特征。《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

展战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sup>[3]</sup>等战略规划都强调了对信息社会中的弱势与边缘群体的关注和普遍服务的强化,提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的获得感不断被提上新的战略高度,解决城乡间信息分化问题成为了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

南开大学樊振佳副教授所著《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与分化研究》一书即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对信息不平等和分化现象进行深入探索的成果。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通过文献调研与综述研究、田野调查、扎根理论研究、问卷调查、深入访谈等方法,重构了信息能力的概念、框架以及信息能力一般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信息分化类型、信息能力改善相关对策。从研究视角的维度考察,该书采用了整体性的研究视野剖析信息分化问题;从理论的维度考察,该书创新并完善了信息能力概念相关学术理论;从解决策略的维度考察,该书提出了具有包容性且意义深远的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能力改善对策。这三个维度既是全书的总体架构,也全面且有力地回应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信息分化问题及解决策略。笔者有幸拜读此书,受益匪浅,特从上述三个维度详细评析该书的研究贡献。

## 1 整体性视角探究信息分化实质

该书的一大贡献在于其研究视角与逻辑出发点的革新。作者基于整体性、以人为核心、关注效益的视角分析信息能力的内涵和外延,为信息分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逻辑出发点。

这一视角的提出源于作者对该领域的现实及理论背景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反思。目前有关研究主要着眼于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信息和通信技术)和信息资源在社会层面的不均衡分布现象,提出了“信息贫困”“数字鸿沟”“数字不平等”“信息不平等”“信息分化”等概念。最初,数字鸿沟被定义为“能够使用数字信息通信技术的人与无法使用数字信息通信技术的人”之间的差距<sup>[4]</sup>。随着互联网连接率达到高水平,对数字鸿沟研究的大量关注已从与互联网接入有关的指标(第一级数字鸿沟)转移到互联网技能和使用相关指标(第二级数字

鸿沟)<sup>[5]</sup>。近年来,对互联网使用的结果或实际利益的关注有所增加,这一问题被称为第三级数字鸿沟<sup>[6-7]</sup>。简言之,尽管当前对数字鸿沟的考察已形成了ICT接入 (ICT access)、ICT使用 (ICT use) 和ICT结果 (ICT outcomes) 三个不同层级的研究,但是现有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前两级,即如何推动ICT为广大数字群体所接收和利用,对于第三级数字鸿沟尚未有充分的揭示<sup>[8]</sup>。尽管目前对第三级数字鸿沟的研究较少,但一些学者已经主要在个人层面衡量了第三级数字鸿沟,如考虑经济结果、学习结果、社会结果和制度结果<sup>[9]</sup>;或是通过经济属性、教育机会、文化认同、政治网络、电子政务和自我实现来衡量ICT的效益<sup>[8]</sup>等。

三级概念层次的形成与发展引发了学界对数字鸿沟问题现有研究的反思。如作者曾指出,“在传统数字鸿沟特别是城乡数字鸿沟研究的话语体系中,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往往被视为关键内容”<sup>[10]</sup>。因此,以往数字鸿沟的研究对信息主体信息能力的关注度较为匮乏,由此提出的信息化建设对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信息主体从信息化工作中获得的真正的福祉。与此同时,研究思路的转变对数字鸿沟问题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扩大了多学科理论融合的空间,如本书中作者参考的可行理论<sup>[11]</sup>、“个人信息世界”概念<sup>[12]</sup>等。视角的多元和理论的综合使得当前信息社会问题特别是信息分化领域研究越来越表现出整体性的研究取向<sup>[13]</sup>,对信息分化问题的根源的探索逐渐从个人与社会、结构与主体能动性、客观与主观的交互作用入手。

信息分化现象为一个与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紧密交织的复杂的社会现象正是本书的底层思路。那么,如何才能还原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本书中,作者选择了信息能力作为信息分化研究的立足点。不同于以往多数研究将信息行为视为相对独立的过程,以及以信息利用和知识吸收为最终效用,作者明确了现实生活中的信息行为是一个与具体的经济、社会、政治需求相交互的动态的实践过程,并从结构因素和能动因素两个方面同时对信息能力进行考察。

在整体性的宏观视阈下,作者实现了信息能力和信息分化的理论衔接。由此,对信息分化现象的认识从信息获取和ICT使用的差异扩展到信息与社会、主体与环境的交互关系上,对信息分化问题的探究也突破了关注技术本身的视野的局限。信息分化研究应

与对象群体所处的社会经济状态和发展目标结合起来考察,有必要强调信息对信息主体的实际意义和效用,而不仅仅是ICT的使用和信息资源的分配。结构因素和能动性因素纳入一体的整体性视角无疑为信息获取与分化的研究开拓了思路,也为进一步提升信息分化的描述和解释力理清了方向,是信息分化问题研究视角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完善。

## 2 创新性理论重构信息能力概念

已有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信息行为的研究大多从相对宏观的视角探析整个群体的信息分化现象,得出结论如新生代农民工对互联网功能的认识仍有局限性<sup>[14]</sup>,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是一种个体、信息源、环境因素的交互影响的复杂的行为活动<sup>[15]</sup>,教育程度、工作环境和性质等外部结构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利用互联网实现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应当增强这类群体互联网使用能力建设<sup>[16]</sup>等。上述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信息分化的表现、原因以及解决措施等作出了群体画像与共性归纳,以结构因素和能动因素为逻辑出发点的研究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但仍未完全回应下疑问: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定群体而言,ICT设备和信息资源拥有的多少是否一定对应信息富裕或贫困?信息富裕或贫困是否与信息主体的主观感知一致?如何剖析并解释这一群体内部存在着的不同的信息分化状态?这些问题都指向对信息分化问题及其根源的纵深认知,也是本书一直尝试回答的问题。

要系统地回答上述问题,无疑需要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和方法。本书中,作者整合了可行世界理论、信息世界理论、效用主义哲学、意义构建理论、赋权理论五个理论,并结合此前观察和访谈研究材料,对信息能力概念框架进行了梳理、总结与扩展,并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结构因素、能动性因素和情境因素的信息能力模型。作者构建的信息能力概念框架与信息能力一般模型充分考虑主客观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并将个体信息体验一并纳入考查范围,具有视野更加宏观和抽象、注重个体发展和信息的实际效用的取向、重视与信息主体生活世界衔接等特征,使得信息能力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丰富和拓展。

此前,对信息能力的相关概念如信息素养的内涵

与语境的扩展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A. Lloyd的观点。借鉴实践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现场本体论等理论,A. Lloyd指出信息素养是一种复杂且全面的社会文化实践,既体现了人们的理性和工具能力,也是对社会语境中全方位信息体验的呈现<sup>[17-18]</sup>。

A. Lloyd及相关学者的观点推动了信息素养研究从教育领域向工作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等各种复杂语境的拓展<sup>[19]</sup>。本书对于信息能力概念的诠释同样强调信息行为的宏观场景和具体语境因素,并更加突出其功能的现实指向,将信息能力提升到了“信息自由”的层面,信息能力的概念即发展为“信息主体为了满足某种自身信息需求的实质自由”<sup>[20]</sup>。

在本书第五章,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能力的关键关联因素和修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能力模型,作者对新生代农民工信息分化类型作出了新的解读。这一分类如一面透视镜,不仅精准揭示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信息分化层次,有助于理解那些特殊和看似矛盾的信息分化状态及其真正原因,如作者在调研中遇到的母女信息效用的不同情况,以及部分对智能手机和上网热情较低的个体等,也让读者在阅读中反思自身并倍受启发,例如,目前具备的信息能力是否与自身信息需求相匹配?当下进行的信息行为能否真正促进自我发展?应怎样改善自身信息能力?由此可见,该概念框架和一般模型对信息能力和信息分化问题的描述、解释和决策依据功能均有明显的提升,是整体性视角下重新界定信息能力概念的重要进步和理论创新。除此之外,信息能力一般模型也在修正过程中表现了较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无论是模型本身还是作者修正模型的方法和步骤,都能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或问题领域的信息能力研究提供有效的新的思路。

## 3 包容性路径指引信息普惠前景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能力模型和分化类型,作者分析了不同信息分化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能力改善需求,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能力改善的外力赋权对策和内力赋权对策。前者以政府机构、信息服务公益组织等为主体,通过信息能力普惠保障机制、信息能力可持续发展机制和信息能力关联发展机制来实现;后者主要分为能力培养、信息互助、个人发展三个层面,并由“规划—行动—反思”

三个主要阶段贯穿，不同信息化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自我赋权的层次上应结合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自我赋权起点。

赋权(Empowerment)，近年来也被称为“赋能”，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与心理学、政治学、公共政策、组织行为、健康、教育、经济学和许多其他研究领域相关<sup>[21-22]</sup>。赋能的过程和结果大多是在个人层面上观察到的，主要指个人获得或加强必要资源的过程，这些资源将促进个人决策、批判性思维<sup>[23]</sup>、掌握必要活动<sup>[24]</sup>，从而实现目标<sup>[22]</sup>，有关研究主要关注自我知觉、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sup>[25-26]</sup>。目前，“赋能”概念体系已在改善贫困或弱势群体境遇的有关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sup>[27]</sup>。21世纪以来，新媒体技术如手机、互联网等极大地拓展了赋能理论的运用空间<sup>[28]</sup>，在此理论框架下相应衍生出三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取向：在促进人类平等发展这一框架内的新媒体赋能实践（即“以发展为目标的信息与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简称ICT4D）、关注集体行动抗争政治取向的新媒介赋能实践以及文化取向的新媒介赋能研究<sup>[29]</sup>。

在本书中，引入赋能理论提出对策首先回应了赋能实践中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即ICT被接收和利用是否真的有助于信息化问题的解决？纵观以往研究，这一假定其实长期存在于对信息化问题解决对策的探讨中。由此提出的策略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的实践意义，但往往默认信息主体处于“等待救济”的被动的地位，暗含着ICT工具主义、技术决定论等倾向。而如前文所述，解决信息化问题应强调ICT对信息主体的实际意义和效用，因而，这一发展路径应当以人为中心，其实质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促进社会包容的进程。具体来说，对于政府及相关政策制定者而言，应积极转变信息能力改善工作的理念和优化方法，不仅要提升信息基础设施等信息化硬件指标，还应重视“软性指标”，即充分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具体信息需求和目的，采取针对性、差异化的信息服务措施，促进信息主体充分利用信息解决实际问题；对于个体而言，信息主体的行动者角色得到了强调，新生代农民工应主动地、创造性地参与和掌握自身信息能力提升过程，实现个体在信息社会中的能动性发展。

本书提出的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能力改善对策探

索的是一条具有自主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数字平等实现路径，通向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普遍享受信息福利的前景。一些对其他特殊群体数字鸿沟问题的研究也体现了相似的追求，如一项对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研究提出，应始终遵循以人为本和技术效率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奉行参与式治理、包容性治理、全方位治理、可持续治理的理念<sup>[30]</sup>。在十四五时期“适应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新趋势，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行方式创新，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sup>[31]</sup>的发展目标下，该路径无疑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和实践价值。而这也让人不禁思考，除了解决特殊群体在信息社会中的发展困境，基于赋能理论的ICT发展路径是否还有着更加广阔的意义与未来？放大到全球后殖民语境和信息技术“去殖民化”的思潮下来看，这一路径同样契合探寻符合地方性需求与文化特征的包容性发展方式的追求<sup>[32]</sup>。由群体，到地区，再到国家之间，ICT的共同发展与平等互惠应当是学术研究与社会各界的共识、信念与齐心奋斗的方向。

如今，5G网络、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正深刻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新一轮技术革命正推动着社会步入“智慧社会”发展新阶段。而在我国，目前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还未接入互联网<sup>[33]</sup>，信息化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数字出版物价格偏高和公民数字技能较低等问题加剧了社会弱势与边缘群体在融入数字生活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使得数字鸿沟问题日益成为我国乃至全球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sup>[34]</sup>。弥合数字鸿沟、促进数字包容、保障社会信息公平日益引起党和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与分化研究》一书积极回应了信息社会中社会弱势群体信息分化治理议题和弥合数字鸿沟的现实诉求，为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运用ICT实现自我发展、参与和融入社会中的难点提供了应对思路，也为相关政策体制的改进与完善提供了创新性的参考与启发。同时，基于融合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认知理论等多学科的广阔视野，该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能力和信息化问题作出了全面而细致的剖析，并拓展了对当今社会不同社会群体的信息能力和信息化研究的理论空间。综上所述，该书既具有较高的科学理论价值，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是群体信息能力及信息化问题研究领

域的一个创新成果和重要探索。

(致谢: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肖鹏对本

文的题目确定、文章写作以及修改完善都给予了宝贵

的协助和指导,在此向肖鹏副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

#### 参考文献:

- [1] 于良芝.理解信息资源的贫富分化:国外“信息分化”与“数字鸿沟”研究综述[J].图书馆杂志,2005(12):6-18,37.
- [2] 李培林,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J].社会,2011,31(3):1-23.
- [3]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EB/OL].(2016-07-27)[2021-08-01].[http://www.gov.cn/xinwen/2016-07/27/content\\_5095336.htm](http://www.gov.cn/xinwen/2016-07/27/content_5095336.htm).
- [4]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divide[EB/OL].(2001-01-01)[2021-08-01].[https://www.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understanding-the-digital-divide\\_236405667766](https://www.oecd-ilibrary.org/science-and-technology/understanding-the-digital-divide_236405667766).
- [5] HARGITTAI E.Second-Level Digital Divide: Differences in People's Online Skills[EB/OL].(2002-04-01)[2021-08-02].<https://doi.org/10.5210/fm.v7i4.942>.
- [6] VAN DEURSEN AJAM,HELSPER E J.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Internet use and non-use among the elderly[J].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5,30(2):171-187.
- [7] WEI K-K,TEO H-H,CHAN H C,et al.Conceptualizing and Testing a Social Cognitive Model of the Digital Divide[J].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11,22(1):170-187.
- [8] SCHEERDER A,VAN DEURSEN A,VAN DIJK J.Determinants of Internet skills, uses and outcomes.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second- and third-level digital divide[J].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2017(7):1607-1624.
- [9] VAN DEURSEN A JAM,VAN DIJK JAGM.Toward a Multifaceted Model of Internet Access for Understanding Digital Divide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15,31(5):379-391.
- [10] 樊振佳,程乐天.可行信息能力:一个信息分化问题学术概念的构建与阐释[J].图书情报工作,2017,61(13):19-30.
- [11] SEN A.Capability and well-being[M]//NUSSBAUM M,SEN A.The quality of lif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30-53.
- [12] 于良芝.“个人信息世界”——一个信息不平等概念的发现及阐释[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39(1):4-12.
- [13] 于良芝,刘亚.结构与主体能动性:信息不平等研究的理论分野及整体性研究的必要[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36(1):4-19.
- [14] 何晶.互联网对于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意义探询[J].新闻大学,2015(2):81-87.
- [15] 程淑平,孟令杰,程业炳.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行为关键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11):103-110.
- [16] 何晶,晏齐宏.互联网使用与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发展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3(4):45-65,127.
- [17] LLOYD A.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context[J].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2008,40(1):3-12.
- [18] LLOYD A.Information literacy landscapes: an emerging picture[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2006,62(5):570-583.
- [19] 彭立伟,高洁.国际信息素养范式演变[J].图书情报工作,2020,64(9):133-141.
- [20] 樊振佳.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与分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87.
- [21] BERTON M.Relating competence-promotion and empowerment[J].Journal of Progressive Human Services,1994(5):27-44.
- [22] HUR M.H.Empowerment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Exploring a typology of the process and components across disciplines[J].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2006(34):523-540.
- [23] WALLERSTEIN N.Powerlessness, Empowerment,and Health: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s[J].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1992,6(3):197-205.
- [24] BANDURA A.Human agency i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J].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1989,44(9):1175-84.
- [25] AMICHAH HAMBURGER Y,MCKENNA K Y A,TAL S A.E-empowerment: Empowerment by the Internet[J].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08,24(5):1776-1789.

- [26] BARAK A, BONIEL NISSIM M, SULER J. Fostering empowerment in online support group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8, 24(5):1867-1883.
- [27] 肖鹏, 赵庆香, 方晨. 从“赋能”到“技术赋能”: 面向新发展阶段的图书馆(学)核心概念体系[J]. 图书馆建设, 2021(2):43-49.
- [28] 冯剑侠. 全球南方视角下的ICT赋权与乡村妇女发展: 以孟加拉国“信息女士”项目为个案[J]. 妇女研究论丛, 2019(4):39-48.
- [29] 黄月琴. 新媒体技术视野下的传播与赋权研究[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3(6):140-145, 164.
- [30] 陆杰华, 韦晓丹. 老年数字鸿沟治理的分析框架、理念及其路径选择: 基于数字鸿沟与知沟理论视角[J]. 人口研究, 2021, 45(3):17-30.
-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 (2021-03-13)[2021-08-02].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 [32] 何祎金. 反向叙事与数字他者: 后殖民视阈中的信息通信技术实践[J]. 探索与争鸣, 2021(2):117-125, 179-180.
- [33] 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全文)[EB/OL]. (2020-09-29)[2021-08-16]. [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9/content\\_5548176.htm](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9/content_5548176.htm).
- [34] 饶权, 麦肯齐, 莱特纳, 等. 弥合数字鸿沟 促进数字包容: 信息社会中图书馆的新使命[J]. 图书馆杂志, 2021, 40(2):4-19.

作者简介: 刘姝贤,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本科生。

收稿日期: 2021-08-06

本文责编: 郑秀花

(上接第84页)

- ⑨ 胡安国处于两宋之交, 目睹北方国土沦丧, 徽、钦二宗被掳, 有切肤之痛, 故而对“攘夷”一义反复申述, 这就招致了后来清朝统治者的厌恶。乾隆怒批道:“胡安国华夷之见, 芥蒂于心……诚所谓胡说也。”并谕令纂修《御纂春秋直解》以驳斥胡传。相应地, 馆臣对元明两代“《春秋》学”著作的褒贬, 基本是根据对《春秋传》的依违来展开, 不主胡传的学人著述得到馆臣认可, 以胡传为皈依的书籍则多被贬入“存目”, 态度鲜明而决绝。详见唐海韵:《论〈四库全书〉对清代民族和睦理念的贯彻与裨益》,《民族学刊》2021年第4期。
- ⑩ 鄱阳自夏至周均称“番邑”, 秦称作“番县”, 西汉改“番易”, 新莽时一度改称“乡亭”, 东汉时期, 将番易左右加“卩”旁, 遂有“鄱阳”之谓。尽管“番易”这一名称只有在西汉时使用过, 但它在后来还偶有出现。

#### 参考文献:

- [1] 汪克宽.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M]//纪昀, 等.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65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 [2] 永瑆, 等.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纪昀, 等.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569.
- [3] 章锐华. 汪克宽研究[D].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 2015.
- [4] 汪克宽. 环谷集: 卷七[M]//纪昀, 等.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集部五: 第1220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717-718.
- [5] 吴慰祖. 四库采进书目[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
- [6] 骆兆平. 新编天一阁书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188.
- [7] 谷梁赤. 春秋谷梁传[M]. 顾馨, 徐明, 校点.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42.
- [8] 高诱. 吕氏春秋[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277.
- [9]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202.
- [10]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2332.

作者简介: 徐梦瑶,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

收稿日期: 2021-10-09

本文责编: 李芳